

黑色文库 第十四集



曾石荣 著

赤海漂零记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十四集

赤海漂零记

曾石荣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6

目 录

出版缘起	7
生若蝼蚁死亦哀 （序）	廖天琪 11
自序	19
我的家乡和家庭	21
受欺凌父母议建新居	26
雁初父子遭绑架	32
盖新屋被烧	38
“镇压反革命”廖先生蒙难	44
斗“地主”学求与保伦等遭殃	48
重建新居我家被划富农	56
厄运频频降临	62
反右整风运动	69
人民公社与大炼钢铁	75
追缴黑仓闹饥荒	80
经济困难怨天尤人	84
初恋婚姻遭破坏	89
搞社会主义教育闹笑话	93
参加“四清运动”	98
背井离乡	104
外逃做工遭追捕	112
亲人受害写反书	122
镣铐入狱受逼供	125
狱中生活与被判徒刑	130

送进劳改农场	134
白医生自言自语骂奸雄	139
遭诬陷控诉潘队长	142
“一打三反”运动	148
生命如草芥	152
反虐待冒险越狱	155
刑满出狱再离乡	159
路线教育与学大寨	166
四·五运动再逃难	172
被逼夜上梁山	177
四人帮垮台与公社瓦解	182
土匪欺善怕恶抢民财	186
中年娶妻与慈母逝世	191
平反冤假错案	196
不正之风与六四运动	202
欺骗与掠夺	205
附录一：连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211
附录二：广东省连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13



曾石荣和妻子



作者1986年复职后和子女
摄于大湖林业中学



作者全家福。摄于1989年东莞某中学。



作者近照



作者年轻时代的照片



作者全家出游时的留影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过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

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

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6 年于华盛顿

生若蝼蚁死亦哀（序）

廖天琪

二十世纪的两件政治大灾难——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肆虐人类社会，造成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受到严酷摧残的人类心灵，在痛定思痛之后，却绽放出了艺术和文学的奇苞。从时间的跨越上来看，上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消亡时间不算长，其席卷的地域面积也相对来说不算广被，从它发端的老巢意大利，到德国纳粹和亚洲日本，法西斯真正荼毒人类的规模和时间都远不如共产主义来得深远。然而综观它对人类精神上所撞击出来的火花，确实是空前灿烂的。不提二战之后关于纳粹罪行的文学作品可以车载斗量，时至今日，当代文艺的创作中，以纳粹法西斯罪行为背景描述受难者的作品还源源不绝。像刚刚问世的美国作家尹迪安那的《通往厄尔尼的桥》（L. E. Indianer, A Bridge to Elne: Epic Novel of French Resistance to the Nazi Occupation）就是以法国南部家庭在纳粹占领时期，勇敢对抗的真实故事为背景的小说。这类的文学作品，其受欢迎和接受的程度，时值法西斯已经消亡了半世纪的今日，还历久不衰，证明这个主题已成为人类普世的、痛苦却又丰富深蕴的宝藏。

反观以共产极权制度对人类所造成的伤害为题的文学作品，从质量和数量上来看都远远落后于前者。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政治“解冻”，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所发表的鞭尸斯大林的“秘密讲话”，揭开了苏联内部的破除偶像、批判斯大林暴政的序幕。这个秘密讲话保密时间极短，它迅速传到西方世界，共产阵营的内部已经开始墙角松动的讯息立刻不胫而走。

接着不久帕斯特纳克的《齐瓦格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

学奖，若说该书由于也涉及了战争主题，不完全是鞭鞑斯大林暴政的话，随之而来的索尔尼辛的巨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病房》、《第一圈》和稍后的《古拉格群岛》可就是名副其实的揭发苏联劳改营中真实情况的纪实文学了。索尔尼辛因此于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文学迅速大量地在西方世界发行流传，对于瓦解专制体制起到了精神上的鞭策作用。

暴君毛泽东死后，中共内部有一场恶斗，1977年随着邓小平的再度上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说法被提到台面上，中国的“解冻”比苏联虽晚了二十多年，却毕竟姗姗而来。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为文艺“松绑”，这就带来了八十年代在中国一般被称为“小阳春”的较宽松的创作氛围，有了从维熙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描写前所未有的有关监狱的所谓“大墙文学”。后来又有张贤亮的描写劳改生活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作品为“劳改文学”打下了基础。然而中国半世纪以来的劳改制度下所制造的百万千万受害人，他们的痛苦和无助，实在不是这种以小说体裁的文学创作所能表达万一的。

《黑色文库》创建于2001年，这部以劳改犯人的传记为主体的出版系列，为在中国的劳改炼狱中活着出来的人提供了一个记录个人悲剧生涯的平台，它所反映的却不仅仅是个人命运中的悲欢离合，而是整个时代光怪陆离的侧影。人类历史有时很难以捉摸，共产主义这个怪胎很早就被人识破，它被世界绝大部分曾经沧海的国家摒弃也有十来年了，其幽灵却依然徘徊于世界各地，十三亿中国人至今摆脱不了这个梦魇，而支撑这个制度的镇压工具——劳改制度也还依然存在。浏览《黑色文库》中的每本书，读者心中都会产生无尽的疑问，这些故事怎么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它的受害人也都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辈甚至同龄人。反右、大饥荒、文革固然是历史的遗迹，但是六四却是活生生发

生在我们眼前的血的事实，奥斯威辛在中国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

历来人们把一切政治运动、整党整风、滥杀滥捕的恶行都归罪到中共政权的残酷本质，往往把人性的阴暗面、甚至中国传统劣质文化中的因素忽略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赤海漂零记》所叙述的是早期的农村土改、反右整风和四清等运动。作者曾石荣刻意要表现中共制度和政策的非人性，却从字里行间清晰地将中国农村人民的真实面貌展现在读者眼前。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勤劳、节俭自爱的面具被戳穿了，愚昧无知、贪婪好利、欺软怕硬、助纣为虐是农民们的另一种素质。这种狭隘的地方宗族主义和共产党文化里强调的政治仇恨和阶级斗争互为表里，一拍即合，把人性阴森角落里面最卑劣邪恶的部分释放出来，恶之华席卷中华大地，生灵涂炭，万劫不复。

作者曾石荣 1938 年出生于广东的九连山区，父母为家道中落的农民，靠着一些生意头脑和刻苦辛勤，以生产米粉丝的小本买卖攒集了一点儿产业，遭到同族一些赖人的眼红。共产党一来，赖民流子跟政治土匪一结合就把个和平宁静的乡村搅得鸡飞狗走。曾石荣家被划为富农，从此成为政治贱民，一介草民却连一个养家糊口的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也被剥夺了。

很多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被禁锢封口了二十年，于七十年代末获得平反之后，犹对党的“宽大为怀”感激涕零，重表对党的忠心说：“五十年代共产党来时，我们可是敲锣打鼓欢迎的。”其实，共产党夺取政权、进入农村后，就开始了铁血镇压，滥杀无辜。所谓的“土改”、“镇反”都是血流成河的一笔笔烂帐。不知这些老右派们是牢底坐穿后成了软骨动物了呢，还是真老糊涂了，当年的血色记忆已经退色。作者在书中以平实的文字描写共产党如何进行绑架勒索当地大湖乡的乡长二人，并将失去利用价值的人当废品处理，读来令人认为是什么描述土匪

作案的小说，事实上这是“伟光正”的共产党干的事儿：

“雁初父子被绑到青州白坭坑之后，没多久，当局认为在他们身上所要勒索的钱粮已弄到手，再榨也没有多少油水了，留着他们已经没有价值，只有白赔米饭，而且还要派人看守，很不合算。因为他们是地主恶霸，又是当权者，所以决定处死他们。如何处死？枪毙的话，当时子弹紧缺，很金贵，故不想浪费几粒子弹。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山边挖个深坑，夜晚把他们绑好，蒙上眼睛，把他们父子押到深坑边，用锄头把他们打死，推下坑，就让他们父子同埋在一个坑穴中。”（P. 37）

要说斯大林的暴虐统治阴森恐怖，让人们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那么中共的统治方式刚好相反，在中国杀人要明火执仗、锣鼓喧天，老百姓要围观鉴赏，甚至直接参与。中共统治者善于绑架人民，大家都在贼船上，从道德上和精神上先让人们缴械，成为党的同谋共犯。难怪到今天“忏悔”“反思”这类词汇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没有任何分量，人们只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绝不承认自己也是帮凶或加害者，原因就这此。让我们来看看共和国下一代的孩子是如何接受党的阶级教育的：

“四月，在绣缎墟公开宣判曾守正与曾培其等五名‘反动恶霸地主’时，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去参加了宣判大会。枪毙他们时，我也站在街口观看公安人员在对面的小山岳上枪毙那几个人，我感到有些害怕。

接着在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又在绣缎宣判‘反动恶霸地主’曾保权等七人死刑，并立即执行。我们学校也停课去参加了宣判会。我们远远地看着县公安人员把带着脚镣并双手靠背绑着的犯人押到小山丘上，喝令他们跪下，然后开枪将他们打死。

公安人员走后，一个中年大汉，手里拿着大刀，凶狠狠的走到已经被打死的犯人身边，认定那个叫保权的死尸，将死尸翻正仰天，手抡大刀，将死尸剖开，挖出一副心肝来，大声说：‘这下子我可报了你的仇！我要把你的心肝取回炒酒吃！’接着又将保权的头割下，将手和脚斩断，大声骂着说：‘我还要叫你死无全尸哩！’然后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取出的那副心肝，飞也似地跑回家去。”（P. 46）

这是 1951 年在广东县城乡下所发生的事。“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青少年在启蒙时期受到的是这种教育，他们稚嫩的心灵早早就被暴力、不公和恐惧所盘踞。今天中国社会上的贪官腐吏、大款富豪、作奸犯科的暴民，绝大多数是成长于这样的无序、无法、无礼、无德的生态环境，我们还能寄望这些同胞们成为“胸怀世界”、“热爱和平”的世界公民吗？才十来岁的作者曾石荣才在惊魂不定，又听到对面山上的枪响，原来是九名“反革命分子”被处决了，其中包括他很喜欢的一位青年老师。事实上，这些人都是冤枉的，在镇反的乱抓乱杀中，往往随便什么人怀有私仇的指控，就能置人于死地。事实上，1987 年这九名死者都得到了所谓的“平反”。毛泽东当时的确说过，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韭菜割了可以再长，人头落了就长不回来了。这种土匪哲学和思维比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更恶劣，其造成的影响更坏。因为人们死得莫名其妙，死得毫无意义，因此不成为悲剧，凝聚不了哀思，悲情被稀释冲淡了，像清晨的薄雾，太阳一出来就散开，不留下踪影痕迹。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杀害六百万犹太人令人类至今犹有余痛，不断反思，而中国人在共产极权统治下死了几千万，但是中国人自己并不在乎，还居然能高声唱和共产党的“盛世和谐”歪论，这不是一出荒诞绝伦的闹剧么？所有忝为演员的中国人，

谁能笑得出来？谁又能哭得出来？

作者在书中作了一个推演，“一个小小的乡，在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被杀掉了二十多人。连平县是一个小县，有十多个乡，就被杀了三百多人。若以中等县来计算，平均每个县被杀的按它四百人算，一个广东省有一百多个县，全国大约有三千多个县，加上各大中小城市，则全国在这次运动中被杀的人就有百万以上。”除了滥杀无辜之外，霸占民房、抢夺民财也是新来的政权的“政绩”，这些土匪做法都是结合了地方上的一些痞子无赖完成的。到了农村推行农业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时，这种抢夺强占的政府行为就更是名正言顺了。结果是杀鸡取卵，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

作者的家庭几经折腾，已贫困不堪，却依然支持他学习，虽然因出身不好，考试不公平，曾石荣还是考入广州师范学院物理系，他于1964年毕业后，天真地听从了党的话，回到家乡的连平山区，原以为可以当一名教师，却被卷入四清运动。在往后的几年里，他辗转流离，外出打工，跟一些同乡的青年人在一起，由于生活无着，前途渺茫，愤而写信给台湾的国民党，诉说个人受到的迫害和歧视。这样一来就被判刑七年，先关在看守所中，后分派到英德劳改农场。在狱中他亲见难友被折磨成残废或冤屈而死，自己也被铐上脚镣，苦不堪言，苦病交加，曾经一度神经失常。他忍受不了折磨也尝试越狱逃跑，但是天网恢恢，又被送回。

当作者刑满出狱返回家乡时，发觉父亲已逝，母亲靠着弟第一家吃饭，他回去之后，没有家，连个锅碗瓢盘的吃饭家伙都没有，生产队也不给他分配工作。他竟然哭着要求重返劳改队去就业。然而劳改队不接受他，曾石荣于是往返于家乡和劳改队之间，只希望找到一个栖身之处，结果兄弟反目成仇，他流落到看守所，当了小偷，在看守所中进进出出，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死亡，两年后全国的平反潮把他从社会的最底层又翻了上来，他先在生产

队当了无线电修理员，1986年终于得到“平反”，并当了一所中学的物理教师。

曾石荣的一生平凡卑微，性格软弱，缺乏主见，这就注定他的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连在农村平安地当个农民，过上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淡生活也不能够。一辈子被共产党欺骗，受尽邻里小人的算计和排挤，到了晚年他竟然再次上当，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送入公安局的虎口，以为行为不端的十八岁青年到了警察手中，吃点苦头就会改好，结果孩子被栽赃为吸毒犯，不但被公安当局敲诈了许多钱财，还差点断送了孩子的小命。

作者曾石荣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中的一员，他经历的时代虽然在历史长河中算是非常时期，但是他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却很能代表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虽然没有特殊的天赋和才能，也不追求什么高超的理念，却是个勤劳诚实的公民，具有谦卑的最低生活要求，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理应都可以享有平静安逸的日子，然而在故乡中国的广东省，他这辈子却走过一个看不见曙光的暗夜，生存的标准跌落到了人所能忍受的底线，被乡人排挤，受亲人遗弃，任何一个政府的干部可以驱赶遣散他，随便一个狱吏就能鞭打侮辱他，饥饿、疾病、无奈、绝望缠绕了他的一生。曾石荣是中国当代一介草民的缩影。中国的13亿人口中，曾石荣至少能代表那几亿农村贫苦的人民和他们所走过的炼狱。为此这本朴素无华的自传就有了它的分量，作者所受的苦难也因此有了代价。

自序

我不是作家，也不想为了当作家而写作。我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的退休物理教师，我在高中毕业时的理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从事物理学的工作。但是在中国大陆，由于政治因素，我的理想破灭了。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身经历了许多苦难，我又亲眼目睹了千百万善良的中国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无数美好的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千千万万的人死于非命。一幕幕悲剧，一段段惨痛的人生经历，让我记忆犹新，使我永远不能忘怀。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是我眼见自己人民的血和泪，他们生活在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听闻无数的悲惨事件，一串串，一缕缕，我怎么能忘却？又怎么能不说呢？我不敢忘却，我要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让子孙后代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人民都知道，并且深刻认清中共和毛泽东集团对中国人民做了什么？我希望人们永远记住这段中国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历史，汲取教训，以免悲剧重演。

中共和毛泽东豢养了许多的文人走狗，为其歌功颂德，掩盖其丑恶的面目，欺骗老百姓。他们睁眼说瞎话，什么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们为人民“谋幸福”。请看看本书所记录的活生生的人民的生活历史事实吧！这只是冰山中的一角。看看毛泽东和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他们口口声声说为人民“谋幸福”，可是他们所做出来的事却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事实证明他们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啊！

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年代，毛泽东和中共高喊着“要民主”

的口号；可是当他们夺得政权之后，却实行更加独裁更加残暴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取得政权之后，把资本家的资产收为所谓的“国有”，把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收为所谓“集体”所有。当他们把国民经济搞得濒临崩毁边缘时，无可奈何地开始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企图借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来继续维持独裁统治。他们又化“国有”资产为私人资产，出卖“集体”土地而获得暴利。他们不但自己成了资本家，还招来国外的许多资本家，建立了许多工厂，招来千百万的工人。夏衍先生在三十年代曾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包身工》，描写了那时在日本纱厂的女工们的生活状况。过去了八十多年的今天，却有成千上万的“打工仔”，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在日本纱厂的“包身工”更恶劣；他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没有假节日，所得收入仅能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若夏衍先生在世，看到现今的“包身工”，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本书所记录的完全是真人真事，书中受害人的姓名全部都是真名真姓，没作改动；而另一些做了坏事或错事的人物，还在世的则略易其名，以避免产生误解和发生纠纷。

作者：曾石荣

二〇〇四年六月

我的家乡和家庭

巍峨的九连山坐落在广东的东北边，地处粤赣边境，峰峦重叠，千米以上的山峰有一百多个，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九连山是著名的东江发源地，这一带地方有茂盛的森林，盛产竹木、香菇、木耳等，还储藏着丰富的各种各样的矿物资源。其中有一支山脉横卧在大湖乡的北边，它的主峰叫白鸠脑，是大湖乡与洲乡的分界线。山北，山多岭峻，人们称它为山内，是和平县管辖的青州乡；山南地势比较平坦，是一望无际的丘陵地带，其中大湖乡和三角乡原属和平与连平各分管辖。有一条小河分别从青州的两个山谷冲泻入大湖乡境，流经三角和忠信，汇合成新丰江。大渡河两岸是一片小的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地方盛产稻米、花生、大豆和大蒜等。

大湖是我的家乡，全乡三万多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姓曾，其他杂姓的人很少，所以别处的人都叫这儿大湖曾。说起我们曾家，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族谱记载，曾氏是出于上古圣君夏禹的姒姓后裔，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曾国，后为莒国。莒灭，曾太子逃到鲁国，后任鲁大夫，就去掉“卩”邑为曾姓，并世代相传。所以曾姓发祥于山东，西汉时又南迁江西庐陵吉阳，繁衍昌盛。大湖这一支是于南宋时由江西庐陵吉阳徙居而来，当时只有兄弟俩在此落居，后来繁衍至第七代，伦公生了十二个儿子，就分成十二大房。其中二房人最多，其次是三房到五房。此后大湖寨每年祭祖就轮着拜祭，每年二月轮到某一房祭祖时，则这一房的全部成年男丁就要抬着全猪及五精五素¹等供品，到大湖寨的老祖堂去烧香点烛，敬拜老祖宗。这祭祖当中，二房祭祖轿马多，

¹五精是指猪、鸡、鸭、鹅、鱼及肝脏；五素是指香菇、木耳等五种素食品。

三房祭祖最讲究排场。因为二房人丁多，所以坐轿骑马的也多；三房因为发财佬多，所以办得十分精致奢华。特地到外地请来戏班，请来少女扮铁笔人，妖艳至极，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

曾家的老祖屋——大湖寨，处于大湖乡的中心，经历七百多年，它的环境独特，风景优美。据说大湖寨是生龙海，风水特别好，所以人才辈出。它是一座围龙式的古代建筑，像一座古城，坐南朝北，前面三座大孔门，右边的那座孔门的横额上写着一副对联：“东鲁世家”四个大字，两侧写着一副对联：“东鲁传经府”“南丰修史家”。大门前有一口月形的大鱼塘，塘的左侧有一条大的水圳，长年流着水。大湖寨的周围有八景色：“东蟾蜍、西鳄鱼、南天井、北天池、广济长虹、凌霄宝塔、瓮潭明珠、燕岩奇观。”清朝嘉庆戊辰科试，大湖寨曾冠英考取了第七名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士。他当时写了一首词颂扬大湖寨的风水：“东边东蟾蜍，西边西鳄鱼，南天井，北天池，也有金牛守水口，北面旗子逆大江。”

大湖寨老祖宗的礼堂有三栋，前堂为大门，中堂大厅为过道，后堂大厅为老祖宗的引像灵堂，靠后壁放着一张长条的香炉案桌，桌上放着三个大的鼎字香炉。逢年过节，有许多曾家的子孙担着三牲供品，从四面八方前来敬拜老祖宗，香火连绵，爆竹声不断。

大湖乡有个集市叫绣缎墟，忠和公路经过街心，沿公路北上 是眼坑和合水乡，往东走侧经过坪塘，倒流水便是河源县的三河与船塘。所以到绣缎集市做生意买卖的，不但有大湖人，也有周围的各乡人。每逢农历一、四、七集市日，便聚集着各种农副产品，各地的农民到来买卖，显得非常热闹兴旺。

从绣缎墟到倒流水村，只有五六华里路，四周都是小山丘，小山岳长满着松树和油茶树，郁郁葱葱。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从樟柑鲁岭流经倒流水村。倒流水这个村庄山清水秀，村里有过涧、叶屋、上下寨、岭背等八九个大围龙屋。其中叶屋原是姓叶

人住的，但已经迁走很久，故改为中心屋。在清朝时候，这村出了一个秀才，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来赞美这里的风水：“高耳来龙几千秋，狮子望门久不休，水口有株千年竹，仙人守馆水倒流。”

有一条拱桥跨过小河，过了拱桥沿河边往上游走百来米，便是我家的老祖屋——下寨。这四字型的围龙屋坐落在小河边，靠河的屋背种有各种高大的树木，河边种有一株高大而茂盛的簕竹。夏天，行人走到这里，南风从小河吹来，显得特别清静凉爽。

一九四五年下寨住着十五六户人家，我家算是寨里一户较大的人家。我父亲当年四十六岁，他的小名叫水娣，字号叫永城。他平时总是穿一身灰色的唐装，剃光着脑袋，额门宽阔，赤色的脸部干瘦，两颧骨里显得微突。听母亲说，他十六岁时他父亲就患肺病去世，他哥哥（即我伯父）又患了间歇性神经病，所以他十六岁就顶耕当家。那时为伯父治病，已经把家弄得很穷，只剩下五六亩田和几间旧屋。

我母亲姓黄，小名叫日姐，比我父亲小一岁。她是和平县樟柑乡鲁岭树的一户中等农家的闺女，没有读过书，但却知情识理，左邻右舍的叔伯大娘都说她是一个好媳妇，勤劳又俭朴，把一个家打理得顺顺当当的。

母亲曾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起她所经历过往事，她说：“我是你祖父在世时为你父亲定的童养媳，十七岁就送归给你父亲做媳妇。十九岁生你们的不在世的大哥，那时你奶奶还在世，她是一位专制的家婆，我坐月时，家里养的鸡和蛋一个都不给我吃，而且连大米饭都不给我吃，正是荒月，我每餐只吃一碗蕃薯片，幸得你外婆送来几只鸡和一百多只鸡蛋及两罐糯米酒，我每餐就煎二个鸡蛋煮一碗水酒送蕃薯干片。你父亲知道你奶奶这样虐待我，也不敢说她半句，我就只有含着眼泪熬过月子。”母亲说着，流下了眼泪，用手去抹了一下。她又继续说：“第二年，你伯父病好后竟然将几亩田及几间旧屋典卖给地主，赌输了钱，就丢下老婆

和一个四岁的女儿，到韶关当兵去了。你三叔见家庭这样，也跟着当兵去了。我与父亲见家里只有三间屋和二亩地没典卖，就商量留下你奶奶和你大娘带着她女儿在下寨居住，我跟你父亲带着你大哥暂时搬迁到鲁岭我娘家去住。唉！那时多艰难呀！幸得你外公对我们还好，给我们借来粮食，又跟地主租到三亩田给我们耕。没养猪，坪塘的井良叔赊了两条骨瘦如柴的猪仔给我们家养，家里没饮料，怎么办？我就只有每天到水塘里捞些小藻喂。我以为这两条小猪死定了的，却没想到竟然长得很好，后来不到半年就长成一百七八十市斤。”说到这，母亲的表情转哀愁为喜悦，“我们在鲁岭住着，我除了料理家务之外，每天还跟着我的兄嫂去耕田种地，你父亲则在农闲时就去贩卖小猪。就这样，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家里积蓄了一笔钱，才把你大伯典卖了的下寨的房屋和田地赎买回来，我们一家才搬回下寨居住。”

她埋怨父亲说：“我本来一共生下你们八兄妹的，怎么现在你们只有五兄妹呢？就因为你爸好财，真是要财不要命。回到下寨居住后，他整日整夜只顾做米粉丝卖，起五更睡半夜，白天出田耕种，天黑做米粉，苦得连命都不要。你大哥和三哥，一个四岁，一个八岁，长得俊秀又聪明伶俐，只因为感冒发烧，父亲忙着做米粉，没有及时料理医治，给耽误了，致使他们夭亡了。想起这事，我就感到痛心，就怨恨你爸……”

一九四五年冬，我哥哥松金已娶了老婆，大姊丁舅也已出嫁。我是三八寅年出生的，母亲给我去算命排八字，说要契石，就请人写了契，到山上找了一块大石，去烧香烧纸烛，并把契烧了，算是契了石，故把我的名字叫石寅。后来我读书报名，老师把我的名字写成石仁，初中毕业时我把名字改写为石荣，从此之后就一直沿用石荣这名字。而父母仍叫我“寅儿。”

我二姊的名字叫运舅，比我大三岁。还有一个弟弟叫石志，比我小三岁。那时七八岁的我已经懂得一些事，看见父母哥嫂每

天总是起早摸黑的，十一岁的二姊要帮忙做这做那。他们起五更睡半夜地做米粉丝去卖。父亲做事诚实认真不马虎，不偷工减料，他所做的米粉比别家的好煮也好卖，故生意颇好。

父亲不再出田耕种，耕田种地之事由母亲带领哥嫂他们去做，父亲只管做粉和卖粉之事。农忙时他也会请些短工来帮忙。父亲建造了一座米研，用牛推磨可以把糙米研白，节省了人力舂米。那时每天清早父亲就把我和弟弟叫醒，把我们带到米研屋去赶牛研米，直至九点多钟才把米研白。下午若牛不派用场，就叫我跟着别家放牛的孩子去放牛。

我父亲为什么要全家人这样日夜辛苦劳碌呢？他为之是想多挣点钱，让全家人过较好的生活，让子孙后代将来有富裕的日子过。我父母艰辛地操劳，终于能结出劳动成果：拥有房屋十二间，米研屋一座，在下寨占有最多的房子，占着龙头厅两条巷陌；家里养着一条大水牛犊，两头母猪和两条肉猪，鸡鸭成群，农具齐全。四六年夏，父亲还为我哥哥娶了一个因日本侵华而被父母亲贩卖的女子做小老婆，多添了一个劳动力。那时我们家有自耕地水田六七亩，旱地三四亩。父亲还租耕地主四五亩水田，弄得母亲和哥嫂他们十分辛苦劳碌。母亲白天要耕田理家，夜晚还要帮助做米粉丝。

受欺凌父母议建新居

倒流水村居住着七八百人口，都姓曾，并且都是二房祖的子孙后代。二房人很多，坪塘、里塘、湖东、湖西等村都有。而倒流水村居住的全是宗興公的后代，分房家界现象十分严重。宗興公生了四个儿子，分为四大家族：大儿子嗣盛公人丁最多最旺，住在过过涧、中心屋及岭背几个大围屋；四儿子嗣照公人丁较弱，住在上下寨。嗣盛公的子孙后代经常恃强凌弱，欺负嗣公的后代子孙，由来已久，无法改变。原在下寨居住的已有一支嗣照公的家族被欺凌迁居到五里外的耕塘去了。他们的旧房子有的卖给了过涧人，使得下寨的人事关系更加复杂，偷鸡摸狗之事经常发生，居住环境日趋恶化。

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一天中午，我哥哥驶完牛，把水牛绑在屋背的一棵大树下，让牠乘凉休息，他便回家休息吃午饭。到下午三点时候，他叫我去放牛。我走到屋背一看，牛都不见了。我便回屋问哥哥：“你把牛绑在哪里？怎么寻不见呢？哥哥立即跟我出去看，果然不见牛的踪影。我们东寻西找，都寻不着，于是问了一些人，有人说看见过涧王瑞牵了一条水牛犊走，说这条牛吃了他家的禾苗。我哥说：“我是把牛绑在离他家的禾苗有一百多步的一棵大树下的，牛绳又没断，怎么会吃了他家的禾苗呢？”哥哥不信，便走到屋角去看王瑞家的禾苗。见到他家的禾苗是给牛吃了一个小角，但又长出了一寸多高的嫩芽，说：“看这禾苗已是二三天前吃的，怎么能说是我家的牛吃的？”说着快步跑去过涧屋，走到王瑞家门口，我也跟着跑去看，见哥哥问：“王瑞叔，我家一条水牛绑在屋背的一棵大树下，听说给你牵了，是吗？”

“是呀！你家的牛吃了我的禾，怎样处置呢？”王瑞叔黑着

脸，恶狠狠地对我哥说。

“王瑞叔，我去看过你家的禾苗，嫩芽已经长出一寸多了，不知是谁家的牛在二三天前吃的啦，怎么是我家的牛吃的呢？”哥哥与他讲道理。

“哎呀！你还敢顶嘴呀！看我给你点厉害看看……”他不由分说，走上前抓住我哥哥的衣领，拿起一根粗竹条，狠狠地抽打我哥的背部和腿。我哥不敢还手，只是“哎哟！哎哟！”地大声叫苦。我见状，立即跑回家去叫父母，父亲不在家，就把事情告诉母亲。她立即放下家务，小跑去过涧。当我们走到屋背的河堤边时，已看见哥哥在拱桥的那边哭喊着走来。他拐着脚，母亲走上前去挟着他，说：“真是狼心狗肺的大恶人！迟早会天打雷劈的！”母亲挟着他慢慢走回家。回到家的房间里，解开他的上衣，看见他的背部被打得一条条的血印纵横交错，腿部也有几条血痕。母亲含着眼泪，拿来跌打药酒，叫嫂嫂轻轻给他擦药酒，说：“这事等你父亲回来后，再看看怎样处理。”

晚上父亲卖粉回来，母亲把大儿子被王瑞毒打的经过告诉他，他听后感到十分气愤，但面对恶棍，知道王瑞与水源狗是堂兄伯弟，也感到无可奈何，于是他说：“王瑞仔就是持强凌弱，蛮不讲理，有什么办法。唯有先去跟他的哥哥王石讲讲，王石跟我倒有点交情，叫他帮助把牛牵回来，被打之事只有忍住这气就是了。”

吃过晚饭，父亲一个人走到过涧，见到王石就把大儿子被他兄弟王瑞毒打之事说了。王石听了，让我父亲喝茶吃烟之后，带领着一起走到王瑞家。经王石一番劝说，还要我父亲答应赔他三斗谷，父亲无奈，只好答应，最后才把牛牵回家。

这年五月五日过端午节，父亲把一头大肉猪杀了，赊放猪肉给上下寨的穷人过节，即赊给猪肉，待到六月收割时才付给谷子。上寨住着一个名叫水源的，是过涧人。他是个恶棍鸦片烟鬼，一对贼眼像灯笼一样，经常做贼做寇的，人们都叫他水源狗。他见

我父亲放猪肉谷，也走来要赊三担谷的猪肉。我父亲开始不肯，知道他的为人。但他却厚着脸皮说：“水娣哥，上下寨家家户户你都肯赊了，怎么就不肯赊给我家呢？难道还怕我到时不给你谷子吗？你放心，到时一粒谷子都不少你的……”他死缠着赊猪肉，我父亲是个软心肠的人，见他如此说好话，又怕得罪他，就勉强赊给他三担谷的猪肉。

到了六月底，禾已收割完，其他人赊的猪肉谷都给了，只剩水源狗欠的没有给，父亲去催收时，他说要待秋收时才给。到了农历七月十四日过节那天中午，水源狗手里提着一只死鹧鸪，走到我家厨房门口，见我们一家人正在做饭菜，他把死鹧鸪往我家厨房里一掷，扳着脸孔说：“水娣，看你家养的好狗，把我养的鹧鸪媒²都咬死了，你看怎么办？”说完就走了。他走后，父亲说：“我家的狗怎么会走到上寨他屋里去咬他家的鹧鸪媒呢。鹧鸪媒是用鸟笼挂着的，怎么可能咬到呢？真是奇怪了！”母亲接着说：“这分明是要赖，要借故赖那欠的猪肉谷就是！”

到了秋收，父亲再去追问水源狗赊的猪肉谷时，他睁开那对铜锣一样的大眼睛，说：“你家的狗咬死了我家的鹧鸪媒，没有要你赔钱算是便宜你啦，你还想要收我的猪肉谷？”父亲知道他是个流氓恶棍，知道他早有阴谋借故耍赖猪肉谷的，也就不再跟他多说，让他白白的赖去三担谷子也就算了。

过了不久，家里养的两条肉猪都已一百多斤了。昨天还吃得饱饱的，第二天突然死去了，后经人检查发现是给人用砒霜毒死的。究竟是谁如此阴险。只能猜测，不敢说谁。为此，我父母感到在下寨住着极为不安，于是父亲对母亲说：“我们在下下寨住着如此受气，真是家无宁日，如何是好啊！我真恨不得马上离开倒流水下寨这鬼地方哩！”

母亲说：“是呀，我老早就觉得住在下寨很不安宁，老受人

² 鹧鸪媒：捉来饲养的鹧鸪，用来引诱山上的鹧鸪，以便捕捉。

欺负，虽然在这里有十多间房屋，不愁吃不愁穿，但是住着却日夜提心吊胆，真不好受呀！”

“不知这样好不好？我们家的田大部分都在耕塘蚕树社那边，在那里找块地建房子，跟耕塘人那样，住远去，就不会受他们的气，就可平安些了。”父亲提议说。

“这也好，早就应该想办法迁居啦，不迁居，世世代代都会受苦受难的……”母亲很赞成父亲的意见。

我父母经过商议之后，便于九月请来风水地理先生，到蚕形地段去勘察选地。经过一番勘察，风水先生认为在耕塘南面的蚕形地段自己耕种的那几块旱地建房可以，地理位置及风水都不错。但那二三块地是租来耕的，是地主曾雁初的。雁初是二房人，也是嗣盛公的家族，又是和平县参议员，他的大儿子曾保源是现任大湖乡乡长。他原来也在倒流水水角坝屋居住，三十年代在五禾角波岭建了一幢新屋，迁移到那里居住去了，距倒流水近十里路远。我父亲与雁初有交往，于是便走去跟他商量，把打算在他的蚕地段那几块地兴建房屋之事说了。雁初同情我父亲的处境，立即答应把地转卖给我家。

地买好了，父亲请来风水先生，选好吉日；又请来建筑师傅钉樟挂线，杀鸡烧香烛拜祭土地。接着兴工清理基地，请人担来沙石，买来石灰，砌墙基。

正砌墙基之时，不料先后二三天来了三伙人来阻止动工砌墙：一伙是耕塘的亲房，说那建房会阻碍他们的大门视线，虽说相距有千米之远，也会妨碍风水；一伙是中心屋大地主曾治平的家族，他家有一祖坟在建房的南小山上，叫鳃形地坟，相距八百多米，说会妨碍他家的风水地坟；另一伙是大湖坝盘石三房，他们有一祖坟叫蚕形地坟，在建房的东面小山坡上，相距大约一百米，说犯冲，走来阻止我家在那里建房造屋。

面对这三大家族的阻拦，怎么办？房屋建还是不建？父亲疑

虑不决，便走去与雁初商量如何办？雁初是二房最大的地主，最有钱有势，人们称他是二房王，叫老大哥，凡二房人的大事由他说了算。父亲买了一只大阉鸡公，买了两斤好酒，走到雁初家，把以上三大家族来阻拦建房的情况对他们父子说了。他们听后都认为相距这么远，没有妨碍。经过一番考虑后，雁初说：“永诚，你得定个日子，备几席酒菜，请齐二三五各房的老臣绅士来，我对他们说说，叫他们都来评评理。有我大哥在，你放心，看看他们谁敢来阻？”

经雁初一说，父亲有了主意。过了几天，那十月二十二日是小阳春天气，早上有小霜，中午阳光暖和。父亲在天地段的建筑地摆好了五六张八仙桌，备好了酒席，请来雁初父子及二三五各房的老臣绅士，还有耕塘和治平家及三房的几位老臣。来到工地上，议论纷纷。拿来丈竹，叫人丈量建房地到三房人祖坟的距离，经丈量结果是相距一百五十丈（即五百零六米多）。来者多数人都说：“相距这样远，没妨碍。”议论一番之后入席就坐，乡长保源大声发表意见说：“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永诚哥请大家来这里，目的是请大家到这实地看看，看他在这建造房屋对三房的祖坟有没有妨碍，大家现在也看了，也经过丈量了，相距一百五十二丈。相距这么远，一里路远，会不会妨碍他们的风水呢？大家也议论过了，多数人都认为没有妨碍，我也认为没有妨碍。我是站在公正的立场说话，绝对不是偏袒谁。在这里我还是劝一劝三房子叔，不要认为永诚一家人建房屋，就可以欺负他。我一向是主持公道的，凡是正义的事我都支持的，若谁敢无理欺负永诚的话，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希望你们不要再去阻拦永诚建房。至于其他治平和耕塘两家，相距更远，就不用说了。希望大家和睦相处就是……。”他说后，大家边饮酒边谈论，多数人都认为乡长讲得有道理，只有当事的那三家的来人沉默不语，其内心还是有意见的，只是不公开顶撞罢了。

经过请酒后，没有人再来阻止，我父亲就叫师傅继续砌墙基，直至把上栋五间屋的墙基砌完为止。

农历过关走去见大女婿黄月明，要求他帮助一笔钱盖房。黄月明是和平县有名的工商大财主黄恒丰的五儿子，住眼坑乡坑尾村，经营竹木及杂货生意，从和平县城至老龙及广州都有商店。在和平地方收购竹木运往广州出售，又从广州运回火水盐油糖回和平县销售，生意兴隆。月明过年回了家，父亲见了，说明来意。月明也算大方爽快，答应买给一批木材，并且到眼坑店取了二箱火水箱（煤油）和一匹布给父亲，也给了些钱。父亲高兴地回到家，把女婿慷慨送钱物之事告诉母亲，一家人听后都皆大欢喜。

雁初父子遭绑架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四七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凌晨三四点钟，大湖乡长曾保源在绣缎街的店里被人绑架拐走了。消息迅速传开，平静的大湖乡村像突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广大的民众百姓感到惊奇，有的感到惶恐不安，也有的为此幸灾乐祸的。人们在纷纷议论着：“究竟是谁绑架了曾保源？把他拐到哪里去了？”

我父亲最清楚这件事，因为那天晚上他就在保源店里住宿过夜。十八日清晨，他挑着一担空箩框，没精打采走回下寨老屋。我母亲正忙于做早饭，见他归来闷闷不乐，样子很伤心，便问他：“怎么今天清早才回来的？”

“唉！别说啦，昨夜差点就没命了！父亲叹了一口气说。”

“怎么啦，给人打劫了？”

“不是我被人打劫，是保源乡长昨夜在他店里被红军捉走了。”

“什么？保源昨夜被红军捉了去？你在他店里住宿吗？”母亲听说，感到很惊奇，立即追问。

“是呀，昨天街日我卖完米粉，买了点酒菜到下行街他的店里住宿，想与他谈谈盖房之事。在他店里帮他做好晚饭，一同吃了晚饭，却来了二三个熟人要他打麻将，竟然打到十一二点钟才结束。后睡了一阵，大约二三点钟时候，有人在门外大声叫开门，我问是谁，又不回答，只是叫要开门。半夜三更我怕是打劫贼，不敢开门，就叫醒保源。他醒后知道事情不妙，叫我与他的叔伯兄弟千万不可开门。来人见我们不肯开门，就踢门捶门，说：我们是红军，是来捉保源的。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跑不了的。若不

开门，待后就枪毙你们！不管他们怎样说，我们都没有开门。不一会，门给撬开了，冲进几个手持长枪的人，不见保源，他们就用枪指着我和丙坤及另一个人，并把我們三人背手绑着，喝令我们跪在店门口，追问我们保源在哪里？见我们说不知道，就用脚踢我们，说：‘刚才十二点还打麻将，怎么现在就会不见呢？’硬要带我们说出保源的下落，‘不说就立即枪毙你们！’我们确实不知道保源躲到哪里去了，说不出来。他们到处搜查，每个角落都搜查过，还是没找到。最后在瓦背坑里终于找到了保源，就把他捆绑着，押出店门口走了，才放开我们。”

母亲听后说：“真没想到这么一个好人竟遭暗害，真让人伤心啊！”她低下头，难过起来。

许多群众听到乡长曾保源被绑架的消息后，都在议论着：“什么时候哪里来的红军？他们住在哪里？为什么要捉保源？”

根据和平县志记载：一九四五年十月，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第三支奉命北上，开辟九连山根据地。十一月，中共九连山区工委成立，决定将原东纵三支队的三个大队分为独立的中队活动：

热水区：由邓发（原三支一大队长）率领。

利头地区：（包括江西三南）由张新（原三支二大队长）、江欧鸣（原三支组织股长）率领。

青州、大潮、忠信地区：由曾志云（原名吴提祥，现名吴毅，原三支二大队政委）率领。

船塘、和东地区：由王彪（原名王仕光，原三支一大队政委）、林镜秋（原七支队大队政委）率领。

一九四六年六月，东三支奉命离开九连山区，北撤山东省，留下少数精干干部继续坚持九连山区武装斗争。并成立了中共九连山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曾志云任书记。

一九四七年，九连山区又恢复和发展中共党组织。一月中共香港分局（其时中共广东区常委撤销，成立香港分局）在香港重

新成立“九连山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严尚民，常委魏南金、钟俊贤。二月中旬，中共九连工委严尚民、魏南金、钟俊贤从香港经河源到达上莞，向王彪、林镜秋、陈实裳等传达香港分局关于形势任务和恢复武装斗争的指示。三月到达青州，召开中共九连山区工委会议，决定集中部队力量，从和平的青州打到连平上坪，再到赣南转回九连山区，扩大政治影响，继而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扩大部队。同时决定在中共九连工委领导下，成立中共和东、中共连和工委，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并开展打击各乡政权和大地主的斗争。

那时大湖地方的中共党组织已有很大的发展，盘石、五禾、金溪、倒流水等村都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发展了大批的中共党员。故此，乡长曾保源及其父亲曾雁初就被列为首批要受打击的对象。通过金溪、倒流水的博学支部对保源的行踪进行严密监视，于一九四七年农历四月十七日晚派人与其在店里打麻将，以便将其捉拿。

九连山游击队司令部当时派了一支小分队，十多个队员潜入绣缎街，于十八日凌晨捉拿了保源，把他捆绑好之后，立即将他押送到青州白坭坑游击司令部驻地。到达驻地后松开其绑绳，押进一间农民的泥砖瓦屋里，派人专门日夜看守着，并且一日三餐还给他酒肉吃。对他说：“我们捉你来是为了想跟你家要二千担粮食，请你给你父亲写封信，叫他备齐二千担谷的钱，送交到我们这里来。这事办好了，我们就立即释放你回去，绝对不会伤害你。”

保源被绑架到那里，无可奈何。为了保命，也只有按要求写信给其父亲，告知他现在的处境情况，并叫其父亲立即卖田卖粮，筹够三千担谷的钱送到九连山游击司令部，他们保证会释放他。

他写的信是由大湖地方的地下党组织秘密交到雁初手中。雁初接信后，知道儿子还健在，也略为放心。但为了救儿子，没有

别的办法，也只好筹钱。从此开始，每逢绣缎街日都可见到他家请人担谷去卖，同时也将一些土地平价卖给人。

经过二三个月的筹备，二千担谷的钱筹够了，就找人报告游击队。游击队则派了两个人于农历七月二十日，带领雁初的二儿子曾丙添前往青州驻地缴交钱款。交割后当天在那里住夜，第二天清早，游击队也按照诺言释放了保源，并让他与其弟一起走路回绣缎。

这一天正是绣缎墟集市日，保源因脚先天有点小跛，走路有点一高一低的，山高路不平，走二三十里路感到很吃力，他的兄弟只好背着他慢慢走。到达绣缎街时已是十二点多钟，他先回到乡公所。那时的乡公所设在绣缎街的上行西北角，不但房舍简陋，人员也少，除了正副乡长之外，只有文书一人，税务和财政各一人，保安二人。保源回来，副乡长及文书接待了他，安排他吃了午饭，安慰了一翻，叫他先回家休养，公务之事以后再谈。他吃了午饭，走到下行他家的店里，有许多的亲房子叔来看望他。我父亲听说他释放回来，感到十分高兴，特地买了一只大红公鸡来看望他，并嘱咐他要抱着大红公鸡回家，以避邪气。下午三点多钟，保源抱着大红公鸡与他的兄弟一起步行回五禾角婆岭屋。回到家，一大家人自然高兴，以为从此平安无事。

第二天又有许多乡亲及亲朋戚友来探访他，其中也夹有共产党的密探，而雁初父子却不觉察，毫无防范。他们父子在与亲朋戚友的交谈中不时流露出对共产党游击队的绑架勒索的不满情绪，说：“今后要组织联防队，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继续破坏和扰乱社会治安。”

第三天的夜晚，游击队又派来十多个武装人员，包围了角婆岭屋，把雁初父子一齐捆绑了，押送到青州白坭坑去了，从此杳无音讯。

雁初父子被捉走之后，我的父亲和母亲像失去一根支柱一样，

很是伤心和难过。原满以为依靠他们的权势就可以把新房屋造好，就可以离开那叫人坐卧不宁的鬼地方，可是现在他们父子都被捉走了，并且杳无音讯，看来凶多吉少，建房之事如何是好呢？为此我父母感到十分尴尬。

而在另一边，中心屋大地主曾治平则见到雁初父子被捉走后，感到兴高采烈，幸灾乐祸。他公开对人们说：“以前雁初做二房王，现在轮到我做二房王啦！”的确是这样：他有五兄弟，又有三四百担地租收，养有一条赤兔马。除了雁初，有谁比他强呢？现在红军捉去了雁初父子，为他拔去了一根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十分庆幸。他是大地主，怎么他就不怕游击队来捉他？他有手段有依靠，因为他的三弟和四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经常带领那些游击队干部到他家住宿，他会热情接待，并且还会捐钱送粮，他是有意投靠共产党了。为此，他感到很安全，而且还可能因此升官。

不久果然这样：农历八月中秋过后，由于乡长保源被捉，要补选大湖乡长，地主乡绅们都不愿出来当乡长，都怕游击队捉，故只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中推举曾汝才做了正乡长，让曾治平做了副乡长。他们外表挂的是国民党乡政府门牌，实质是做共产党要做的事，为游击队通风报信。

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无能力的地步，在和平县的热水、青州乡，国民党的乡政府已经垮台，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乡人民政府。”

后来有人透露，雁初父子被绑到青州白坭坑之后，没多久，当局认为在他们身上所要勒索的钱粮已弄到手，再榨也没有多少油水了，留着他们已经没有价值，只有白赔米饭，而且还要派人看守，很不合算。因为他们是地主恶霸，又是当权者，所以决定处死他们。如何处死？枪毙的话，当时子弹紧缺，很金贵，故不想浪费几粒子弹。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山边挖个深坑，夜

晚把他们绑好，蒙上眼睛，把他们父子押到深坑边，用锄头把他们打死，推下坑，就让他们父子同埋在一个坑穴中。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的将他们结果了，可怜他们竟然死得如此凄惨。

盖新屋被烧

一九四七年九冬十月时候，我父亲已打定主意，今冬一定要将新屋建起来。于是请来木匠师傅先做木门窗。当时有许多亲戚朋友知道后，都来劝告他，说：“现在雁初父子被捉了，二房人虽然多，但蛇无头而不行，有谁为你作主呢？”又说：“而且现在治平成了二房王，他是要阻止你在那处建房的；加上耕塘人又不同意你在那处建房，他们虽然不出面来阻你，但他们会暗地里做鬼，叫三房人来阻止你的。你想想：你只是一家人，他们则几百家，钱财又比你多，你斗得过他们吗？你要三思呀。”

我父亲很固执，不听人劝告，说：“头已经洗湿了，就应该剃啦！怎能半途而废呢？”我母亲也劝告他，他就是不听。他说：“屋我是一定要做的，他们三房人敢来阻，到时再跟他们讲理就是了。”

十月初冬，门窗已经做好，桁、瓦等材料也已筹备就绪，便请人打好几千只大泥砖，准备盖新房。他请来师傅搭好毛棚，叫泥水师傅和小水工住进毛棚，拣了吉日，动工盖新屋。

动工砌砖盖房已经四五天了，不见有人来阻止。耕塘屋人和中心屋治平家都在日夜盼望三房人到来阻止，现在还不见来，心急如焚。今眼看我家的新屋很快就要盖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各派了人去盘石，与三房人通风报讯。耕塘人派了两位老臣走到大湖坝盘石，见到三房子叔正在聚集在那里祭社，便开口对三房人说：“三房子叔这么齐人在祭社呀，你们知不知道曾水娣现在正在你们的祖坟前兴工盖房子呢？”

“不知道哦！他开工几天啦？建好了没有？”三房有人问耕塘人。

“咳！你们还不知道，他已经开工五天啦。昨天已放了楼桁，再多几天就会钉角盖瓦了。你们要阻止的话，就得趁早去；若迟了，被他盖了瓦去阻就难啦！”耕塘的来说。

治平家派去的人接着对三房人说：“现在你们不用怕，雁初父子已被捉了，据说已被处死了，二房再没人为他掌腰作主啦！我家治平老爷已是二房王，他也要阻止水娣在那里盖房的，所以你们尽管去拆去烧。”

耕塘人接着又说：“我们虽然与水娣是亲房，但他所建的房屋却对我们屋的风水有影响，故我们决不会帮他。相反，我们倒要你们去把他新建的房屋彻底捣毁烧掉。你们若去烧的话，我们那地背坪里放有很多的草料，你们只管取去，我们只装作没看见就是啦。”

经治平派的家丁及耕塘人这么一说，三房人的胆子大起来，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于是两个为头的大地主曾守正与曾培其立即出来动员说：“既然是这样，我们明天大家吃过早饭都在这里集合，有枪的带枪，没枪的就带锄头带铲，去把水娣所盖的房屋拆掉烧掉，把那些木料及毛棚放把火，看他还建不建？”众人听了，一齐赞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三房集合了二百多人，有的扛着洋枪，有的扛着土火药枪，有的扛着锄头和铁铲，浩浩荡荡向耕塘蚕形地进发。走到耕塘屋对面的大路上还特地放了两枪，以显威风。这天，我父亲去了三角石马街卖米粉，只有我母亲和哥哥及嫂嫂他们在建筑工地帮手料理。母亲看见一大队人马扛着长枪和锄头铁铲，由耕塘屋那边开来，料定一定是三房人来拆屋，所以立即叫我哥哥走开，以免与其发生冲突，受到伤害。三房人马来到之后，曾守正与曾培其立即叫大家动手把砌好的泥砖壁拆掉，把门、窗、桁等木料放在一堆，叫人到耕塘人的草坪里取来草料，将木料与草棚一齐放起火来。我母亲与嫂嫂几个人哪里阻

止得住，只得到毛棚里抢出几张被帐，泥水师傅进去抢出他们的木工工具。一时间火光冲天，像火海一样，照得半天通红。耕塘屋很多男女老少都站在门口看着三房人放火烧自己亲房的新屋，不但没有人出来制止，反而在那里发笑，幸灾乐祸地叫好。

母亲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放火烧屋，却无能为力去阻止，看着融融烈火吞噬那些门窗木材，像是烧着自己的骨和肉一样，感到锥心之痛，但她没有哭，只是憎恨地看着这伙强人的所作所为。三房人看着烧得差不多完了，才撤队回去。母亲看见毛棚及木料被烧完，才与嫂嫂及师傅他们收拾那些抢出的被帐等物件，伤心地回到下寨老屋。

晚上父亲回来，母亲向他哭诉新屋被烧的情景，并埋怨他说：“你老早不听亲朋戚友的劝告，硬着颈子要盖新屋，现在一把火都烧光了！看你向谁去索赔呢？如何才能挽回这么巨大的损失？”

父亲听着母亲的哭诉，很是伤心和难过，他愤恨地说：“就是因为有治平和耕塘人这些败类纵容，三房人才敢如此大胆妄为的，看他们将来有没有好死？现在只有跟他们打官司了。”

新房子被烧后，父亲到处投人投诉，但大多数人只能表示同情和义愤，却无能为力帮助什么。后来他请来河源县三河长丘庆元，在家里的龙头厅里执笔写诉状。诉状写好后送到和平县法院及县国民政府，控告曾守正和曾培其为首煽动盘石三房人，烧了我家新盖的房屋，要求惩办罪犯和赔偿损失。

一九四八年二月，和平县法院作出判决：追查曾守正与曾培其的法律责任，并行文县国民政府办理解决赔偿问题。县国民政府当时责令大湖乡政府与大湖驻军协同查办此案。但是当时中共九连地委领导的游击活动猖獗，故县国民政府对大湖乡也派了保安连进驻盘石白云楼，进行扫荡和剿共。形势动荡不安，一时间红军到来，一时间又白军（国军）到来，老百姓不得安宁。一九四八年五月，九连山游击队在大湖倒流水村，把进驻大湖白云楼

的保安队洪连诱入狮子脑山，将洪连歼灭，只剩二三十人逃回白云楼驻守。从此国军在全国败退的形势下，在九连山地区的驻军也日渐败退，处于即将崩毁的边缘。故此，县国民政府对于我家房屋被烧案，再也没有能力顾及处理了。

这年的六月的一天晚上，我表兄从九连山游击队驻地返回船塘的途中，到下寨我家住宿。他是九连山游击队船塘地方的秘密交通员，经常往返九连山内与大湖、船塘之间，传送情报及联系，故也经常路过倒流水，到我家住宿，有时还会带一二个游击队的领导到来过夜。那天丘运方到我家住宿，问我父亲说：“舅舅，你盖的房屋被烧的官司结果如何？”

“唉！现在一红一白的，还有谁来理老百姓的事呢？本来和平县国民政府已责令大湖乡公所与大湖驻军协同办理的，但是五月洪连打败仗，哪里还顾得及办理这案呢？”我父亲说。

“现在国民党政府快要败亡了，舅舅，我看你不要再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啦！共产党就快要胜利了，我劝你把这案件向中共九连山区委提出状子，要求他们来为你办理这案。共产党是主张废除封建迷信，我看是可以为你办理这案的。你就请人写好诉状，我替你送交到九连山司令部去，我认识司令部的一些领导。”丘运才对我父亲说。

“你既然这样说，我就照你的主意办，明天我就请人再写诉状，请你帮助我，亲自送到九连山司令部去。”父亲听了运才的说话，表示同意照他的意思去办。

接着表兄对我父亲说：“舅舅，我看你一生中受了别人的不少欺负，你和松金表兄都被人打过多次，仇恨是不少啊！我现在想劝你乘当前兵荒马乱之时去报仇雪恨。我与船塘地方游击队领导相熟，只要你把打过你欺负过你的人的名单报给我，我就与游击队领导商议，派人在夜晚把他们捉去杀掉。”

“讲仇冤，我家的确不少，但要我去暗害别人，我却不愿意

哩！”父亲对运才说。

“舅舅，你真是没用！俗语都说：‘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你有那么多的冤仇，为什么不愿趁机去报呢？又不用你出面，只要你出句声就可以啦，你的思想怎么这样保守呢？”

“我想恶人自有恶人磨，他做的坏事恶事多了，老天爷会惩罚他们的。老天爷是有眼的，例如上寨的水源狗，作恶多端，曾欺诈我，赖掉了我三担猪肉谷，而今年五月去打家劫舍，就被人打死了，这就是报应。”

“舅舅，你实在是太善良了，俗语说：‘人善受人欺，马善被人骑。’怪不得你老受人欺负。”表兄见劝说我父亲不听，只有自感叹气，也就不再多说了。

次日，父亲便请人写了控诉状，交给了丘运才，叫他亲自送到九连山游击队司令部，并给了他一些茶水钱。

控诉状送到中共九连区委后，经研究决定接收处理这一案件，并通知大湖游击中队队长曾坤宜负责办理。但是由于坤宜是盘石三房人，加上倒流水曾治平对游击队的影响，借口说：“曾水娣原依靠伪乡长曾保源造房屋，被烧后又依靠国民党政府来办理这案件。”于是对案件就不了了之。

一九四九年九月，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南下广东，南粤“解放”，连平与和平分别成立了乡政府，设在盘石的白云楼。这时我父亲又请人写了诉状，送到县人民法院，控告曾守正与曾培其为首，煽动三房人拆烧我家新盖房屋。一九五〇年初，当时法院院长曾贞佑，是盘石三房人，他作出判决：“由曾守正和曾培其家负责赔偿曾水娣稻谷二十担，布匹二只。”

我父亲对这一判决不服，认为赔偿太少，不公平不合理，所以拒绝接收。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湖乡首批处决了“反动恶霸地主”曾守正、曾培其等五人，

于乡缎墟集市日在街对面的小山岳上公开枪毙了他们。

我父亲见曾守正和曾培其都已被枪毙了，便去找院长曾贞佑，要求办理我家房屋被烧案，当时院长对我父亲说：“水娣，你的案去年不是已经判决吗？你不接收。可是现在为首的曾守正与曾培其都已被杀了，还去找谁来负责赔偿你呢？我劝你还是接受那些赔偿吧！虽然是少了点，但总比没有好吧？你若再不接收，我也没有办法再判啦！”我父亲被他一说，也感到无奈，只好同意了。这一宗拆屋烧屋案就这样经过三翻四复的申诉，最终也就这样马虎地了结了。

“镇压反革命”廖先生蒙难

一九五〇年春，原绣缎中心小学由于战争停办了二年后，现在恢复办学，改名为湖三小学，从一年级办至六年级，是一所完全小学。这时我已经十一虚岁，父亲叫我与村里的一些孩子一起，到湖三小学报名读书。我不懂得应该读几年级，就随便报读了三年级。其实按照我的基础是不应报读三年级的，因为以前我虽然在村校读过二三次书，但那时兵荒马乱，办学极不正常，总是“九月九，先生不走学生溜。”办学经常半途而废，所以我每学期没上几天的学，就溜走不上学了，只有在四九年春去读了半年的私塾古书。现在报读三年级，学习基础差，特别是算术（数学），一二位数的加减法都不会，怎么去学多位数的加减法和乘除法呢？所以开学一段时间我就跟不上，上课像是鸭听雷似的，听不懂，成绩很差。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廖习成老师，当时称老师为先生。看上去廖先生当年二十三、四岁，个子不高大，他教我们班的语文和图画。他家在本乡白塘姓廖，说客家话，说话和蔼可亲。在第一段考中，我的算术成绩是倒数第三。廖先生见我的算术成绩这样差，就在每天自习时间来辅导我，教我一二位数的加减法。在他的耐心辅导下，使我掌握了加减法的要领，也学会了多位数的加减法。接着学乘除法时，算术老师一教，我就会了。待到第二段考时，有一道算术题全班都没一个人作对，却被我作对了。我们的算术老师是坪塘的曾学求，他知道我前段时间的成绩很差，现在第二段考试，他在改试卷时发现我作对了那道题，感到很意外，说：“真没想到麦林里竟然会走出老虎来！”

五〇秋，村校开办，因为到绣缎湖三小学要走五六里路去读书，早去晚回，中午要带饭，很不方便，故我就在村校报名读三

年级。这一学期，我在第一二段考中的成绩是全班第二名，第三段考竟然夺得第一名，得到纸笔的奖品。

一九五一年春，我父母怕我在村校读书会与弟弟打架，故又叫我到绣缎湖三小学读，我竟然报读四年级。当时我是不懂得学校是秋季升级的，没老师的指导，我就自作自为，竟然秋季留级而春季升级，把升留级的时间搞乱了。当时我到湖三小学读书，却不见廖习成老师，问了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我也不再过问了。

四月，在绣缎墟公开宣判曾守正与曾培其等五名“反动恶霸地主”时，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去参加了宣判大会。枪毙他们时，我也站在街口观看公安人员在对面的小山岳上枪毙那几个人，我感到有些害怕。

接着在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又在绣缎宣判“反动恶霸地主”曾保权等七人死刑，并立即执行。我们学校也停课去参加了宣判会。我们远远地看着县公安人员把带着脚镣并双手靠背绑着的犯人押到小山丘上，喝令他们跪下，然后开枪将他们打死。公安人员走后，我们看见一个中年的大汉，手里拿着大刀，凶狠狠的走到已经被打死的犯人身边，认定那个叫保权的死尸，将死尸翻正仰天，手抡大刀，将死尸剖开，挖出一副心肝来，大声说：“这下子我可报了你的仇！我要把你的心肝取回炒酒吃！”接着又将保权的头割下，将手和脚斩断，大声骂着说：“我还要叫你死无全尸哩！”然后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取出的那副心肝，飞也似地跑回家去。

人们看到那剖人心肝的恐怖情景，是大湖前所没有的，故惊诧不已。我看到那残忍的血腥场面，心里也感到害怕。亲眼看到了挖人心肝吃的事，真是惨不忍睹，惨绝人寰。

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又是绣缎墟集市日，上午十一点时候，我们正在课室里上课，突然响起“啪！啪！啪……”一连串的枪

声，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交头接耳的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不一会下了课，同学们跑出校门，看见对面的小山岳上，有许多人成群结队的前去观看，原来是枪毙了九名“反革命分子”。学校门口有人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宣传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校门口还张贴着一张用大白纸写的连平县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上用红笔勾着：曾治平、曾其全、张日辉、廖习成等九名“反革命分子”的姓名，说他们这伙反革命集团企图进行暴动，阴谋攻打乡政府，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立即执行枪决。

我看见有许多同学走前去观看那些尸体。我也壮起胆子，跟着走到 对面的山岳去观看，看见被打死的廖习成的尸体，仰着脸躺在草地丛中，身上中有三颗子弹洞，鲜血染红了衣服，地上流出一滩已经凝固了的鲜血，脸已经变成腊黄色，看上去很是可怕。我看了一下，就侧着脸，不敢再看了。我低下头，不觉滴下了几滴眼泪，漫着步子走回学校。我暗自想：“廖先生这么个好人，怎么会去干反革命的勾当呢？”

我是外宿走读生，晚上回到家，吃晚饭时父亲对我们一家人说：“治平支持三房人烧了我家的新屋，今天得到报应啦！他被枪毙了，终于不得好死哩！”

我问父亲：“说他们是反革命，企图暴动，是吗？”

“这事谁知道？”据我所知，他在游击战争时投靠了共产党游击队，现在共产党胜利了，他怎么又会去暴动打共产党？这事我真不知道呢。”父亲回答说。

“寅儿，这话不能出去乱说呀，给人听见会惹祸的，你们在外说话可要小心哩！这世道是很险恶的呵。”母亲插口说。

后来据说这案子的来由是这样的：

一九五一年初，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时有人举报说：“原和平县伪县长曾枢骑着白马到大湖曾其全

家活动，在其全家召集曾治平、张日辉等开会，策划反革命暴动，准备攻打乡政府。”于是县公安局立即展开侦查，派刘奋飞带队到曾其全屋的周围去放哨，一连几天晚上由天黑守到天亮，都没有发现有人，只有几粒马屎，便认定这是事实，立即进行逮捕。首先逮捕了曾其全和曾治平及在绣缎街开药材店的张日辉，进行逼供审讯，用酷刑逼使他们承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实，同时逼使他们供出廖习武、曾兹彬等同案犯十多人。

曾兹彬是倒流水过涧人，游击活动时他是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又是金溪游击小队队长，五〇年因财务之事被开除出队。廖习成也是慈彬游击小队的队员，五〇年转业在湖三小学当教师。他们二人都是被逼供出来的反革命成员，廖习成当时被判死刑，曾慈彬则被判六年徒刑。

这一案件中被杀的九人，被判徒刑的五人，直到一九八七年，这个冤案才获得平反，确认是一宗枉杀案。这是后话。

一个小小的乡，在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被杀掉了二十多人。连平县是一个小县，有十多个乡，就被杀了三百多人。若以中等县来计算，平均每个县被杀的按它四百人算，一个广东省有一百多个县，全国大约有三千多个县，加上各大中小城市，则全国在这次运动中被杀的人就有百万以上。这不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吗？说什么南京大屠杀呀，与之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斗“地主”学求与保伦等遭殃

一九五一年秋，我继续在湖三小学读四年级。这一学期我在学校住宿，认识一位很特出的老师，他是我们村水角坝屋的曾保伦。他大约二十八九岁，身体魁梧，国字型的脸，头部留着西装发型，身上经常穿着一件尼子青年上衣，一条尼子西裤。他是一九四八年岭南大学毕业生，当年毕业时中山大学聘请他当助教，他拒绝了。一九四九年回到家乡，五〇年春他却到湖三小学来教小学生，有人问为什么？他说：“我读书时我们祖宗给了我家的租粮收，供我读到大学，许多乡亲还捐赠过钱粮给我读大学。现在读毕业了，我要报答祖宗及乡亲们对我的恩情。所以我要为乡亲们服务，要教他们的孩子。”听我父亲说我家也曾捐过三担谷给他读大学，因为他是二房人。

曾保伦老师的英语很熟，我们小学生没有英语课，却对英语感到新奇，故有很多同学一撞见他就请他用英语写自己的姓名，我也请他用英语写了我的姓名。那时他也带着两位大妹妹到湖三小学读五六年级，一个十八九岁，一个十六七岁。他家离学校有六里路（三公里），但他却不在学校住宿，每天清早带着俩个妹步行到学校上课，下午五点钟放学就步行回家。有时候他也会留在学校住宿一晚，每当他在学校住宿的时候，我们就围在他身边，听他讲《西游记》、《水浒传》，他讲得动听，我们很喜欢听。他为人和蔼可亲，我们同学都很亲近他。他的象棋下得很好，他除掉一个车马，学校都没一个老师能下赢他。他教六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一九五二年暑期毕业班十八个人考初中，竟然考上了十六人，不但创绣缎湖三小学有史以来升学率最高记录，也是全县各校没有的记录，博得广大乡亲父老的赞扬和尊敬。

一九五二年秋，我继续在湖三小学读五年级，却已见不到曾保伦老师。据说这时开展“打地主”分田地

土改运动，他家因收租成了地主阶级，故不要他来教学了。校长曾丙坤也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回家种田去了。

农历十月，初冬时节，寒冷的北风南侵，使得整个南方大地寒气逼人。但是这时华南地区却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打地主分田地”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各个村庄在开展这个运动。倒流水改名为“民主村”，名为“民主村”，其实一点也不民主；坪塘则改名为“新民”村。两村合为金溪片，有一个土改队十多个人员派驻在金溪片，负责两村的村民集中在平塘的一草坪上召开“斗争地主曾学求”的群众大会，各村小学及湖三小学都停课参加斗争大会。我也跟着大伙排队去那里参加观看斗争大会，看到草坪上用木板搭了一个讲台，讲台前面横挂着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斗争反动地主曾学求！”上午十点时分，草坪上挤满了群众和小学生，民兵把曾学求带上讲台，并用绳子绑着他，喝令他面向群众跪下。土改队长讲话说：“农民兄弟们，现在正在进行打地主分田地的土改运动，这是农民兄弟盼望已久的运动，这次运动我们是要斗倒斗垮地主阶级，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今天我们首先斗争曾学求这个反动地主分子，这个反动地主分子曾经在游击战争时期在国民党伪乡政府当过文书，向国民党军队告密，杀害了我地下党的人员曾亚哉；解放后他很狡猾，先后钻进教师队伍和土改工作队，现被我们党清查出来。今天我们要斗争他，清算他的罪行。下面请农民兄弟来诉苦申冤。”

这时下面有村干部带领高叫口号：“有苦诉苦！有冤申冤！”“打倒反动地主曾学求！”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走上讲台诉苦说：“学求，你四八年

在乡政府当文书时向国民党告密，说我丈夫曾亚哉是游击队员，害得他被捉去杀了。你害得我好苦呀！”她哭诉着说“我今天要申冤，要报仇！”说着竟然拿出一把小刀，动手去割学求的一只耳朵。工作人员看见去阻止，但她早已把一只耳朵割开了半边，鲜血直流。

学术忍痛求饶说：“大娘，你怨错人啦！那时我还是地下党派去当密探的哩，不信你可问当时的党支书曾兹泰，我怎么会密告你丈夫呢？你真是冤枉我啦。”

“有仇报仇！有冤伸冤！”“决不允许地主曾学求狡辩！”“只许学求老实低头认罪！”台下有村干部带领高叫口号，打断了学的申辩。老大娘又大巴掌去打学求的脸。

接着又是一个男农民上去诉苦，说学求以前如何逼他家交地租，逼得他家如何穷苦等，说了一遍。过后土改队长讲话说：“反动地主曾学求杀害我地下党人员，属罪大恶极。故今天我们要为广大农民报仇申冤，决定立即枪毙他。”说完，叫了两个民兵，把他拉到小山坡上，“啪！啪！啪！”几枪把他结果了。

农历十一月，各村打地主分田地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民主”村有曾治平、曾保伦五户地主，新民村有三四户地主，而在游击战争时地下党支书曾兹泰也被评为地主而被清理回家种田了。各村斗倒了地主，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没收了，还要追逼他们缴交出暗藏的金银财宝出来，追算他们的余粮。交不出就残酷斗争。金溪片两村已经逼迫得曾治平的两个老婆上吊自杀死了，当教师的曾文芯也被逼上吊自杀死了。但运动还没有停止，还在继续进行。

十一月中旬，民主村又在残酷斗争曾保伦的哥哥曾保田，逼他交出暗藏的金银财宝出来，他说：“没有”，就绑打吊起，把他打得死去活来。这天中午当他被绑得手脚麻木发紫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只有说谎，以求得解脱。他对绑打他的民兵说：“你们

解开我吧！我告诉你们我家埋藏金银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挖就是啦！”

“是真的吗？不对你施酷刑，你是不愿说的。”民兵说，喜出望外。

“是真的！”保田肯定地说。

“那好吧，我们就解开你，你立即带领我们去挖！”两民兵便把保田的绑绳解开。

解开了绑绳，保田松了一口气，但手脚还在阵阵发麻。他坐在地上不能动弹，俩民兵催促说：“怎么？解开绑绳了，还不起来带我们去挖金银？”

“我的手脚还十分麻木哩，都站不起来，怎么走呢？待一会儿吧？”保田求情地说。

过了一会，民兵拉起保田，问：“你家的银埋在哪里？”

“埋在我家一间屋的尿缸角里，我就带你们去挖吧！”保田应付说。俩民兵提着枪，跟着保田到水角坝屋去。走了半个钟头才到达，他带着两个民兵走进一间房间，用手指着那个墙角说：“银就埋在那个角头，你们去挖吧！”

一个民兵把提着的枪交另一个民兵拿着，又在保田家拿来一把锄头，便大力挖起来。挖了一阵又换另一民兵挖，挖了一米多深，一平方多米宽，累出一身汗。可是却不见银缸的踪影。民兵急着问保田：“哪有银缸？你一定是说假话骗我们！”

“我都说我家里没有金银，你们不信，一定要逼我讲，所以我才讲假话的，请求你们饶恕我吧？放过我吧？我给你们磕头。”保田一面说，一面跪下磕头求饶。

“他妈的！你这个地主王八蛋，竟敢来骗我们，给我狠狠地打！”一个民兵气急败坏地说，拿起绳子抽打起保田来。另一个民兵说：“你家没有金银是假，不愿意交出来才是真的。你快说出来你家的金银埋藏在何处？”

“实在是没有呀！你叫我怎么说呢？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保田被打翻在地，被抽打得滚来滚去。

俩民兵哪里肯放过他，打过一轮，又用绳子绑他的双手，并吊在到楼桁上，然后用竹条子抽打他的双脚。保田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想：“这次不死也得一身残，留着这条命也没有，不如再说假话骗他们，待他们放开我时就与他们拼掉这条命。”他想好就对民兵说：“这次我说真的啦，我不再骗你们，放开我吧！”

“若是骗我们呢？”民兵说。

“若再骗你们，就任由你们处置。”保田说，“我家确实是埋有一缸子银，刚才说的是假地点，现在放开我，我说真地点给你们。”保田被绑吊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说呀，先说出来才放你。”一个民兵说。

“你们不放开我，我死也不说！”保田顶住气说。

“就放开他吧！不怕他说假话，若是再说假话，就打死他！”另一个民兵对他的同伴说。于是俩人就把保田从楼桁上放落下来，解开绳索。他的双手被绑吊得变成紫黑色，麻木得失去知觉，他呆呆地站立在地上，将双手上下伸振活动，以便尽快恢复。民兵让他休息了一会，问他：“银埋在哪里？”

“埋在我家的菜园里，我带你们去挖吧！”保田说着便开步要走，民兵叫住他，叫他扛上锄头带头领路。

俩民兵提着枪，跟着走去菜园。走到半路转弯处，保田突然转过身，举起锄头向跟前的一个民兵的山上打去，把那个民兵的前额角打破了，晕倒在地。后边的那个民兵见状，立即后退几步，举起枪朝保田开了两枪，把他结果了。接着叫来附近的几个贫农，帮着把那个被打伤的民兵的伤口包扎好，并抬送去卫生院救治。

民兵立即回到村委会，汇报了情况。保伦与母亲及家人得知保田被打死，哭喊得死去活来，后来叫本屋的新房协助掩埋了他的尸体。

第二天下午，村召集群众大会，并派民兵带保伦母子俩到来受斗争。大会开始，他俩母子被叫到讲台上，并叫他们脸向台下的群众跪下。土改队长讲话说：“昨天地主曾保田抗拒交余粮，欺骗民兵去他家挖银，他竟然行凶，打伤我民兵一个，企图杀害我们的民兵同志。他行凶时被我民兵当场击毙。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斗争他的母亲和弟弟保伦，还要他们交出余粮。”说着又转向保伦母子：“你说你们家暗藏有多少金银财宝？赶快向农民们交代清楚，不然的话，人民群众是不会放过你们的。知道吗？”

“唉，你叫我怎么说呢？保伦读书是靠祖宗给的租收，这几十担租哪够他读书呀，幸亏乡亲们捐赠了一些钱粮，才勉强支持他读完大学。哪来剩余的金银财宝呢？”保伦母伤心地回答说。

“你家收了几十年的租，乡亲们又捐赠，总有积蓄吧？”贫协主任说。

“你哪里知道？他在广州读书时还跟和平县眼坑的大财主黄恒丰的儿子黄月明借了一大笔钱，至今还没有还哩！哪里有余粮呢？”保伦母解释说。

关于保伦在广州读书时向黄月明借了钱之事，我曾听我母亲说过，四九年我大姐夫黄月明来我家时说想去水角坝保伦家，说他借了一笔钱，至今没有还，想到他家看看。后有没有去，我就知道了。

“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贫协主任问。

“不信你可以去问嘛。”保伦母亲说。

“不管你怎样说，你们还是要交出余粮来的，不交是过不了关的。”土改队人员说，又转向台下的群众大声说：“农民兄弟们，他们抗拒交余粮，能放过他们吗？”

“不能！”台下有很少的盲从应声而说。

过后会场哑雀无声，一片寂静。多数群众都同情保伦，知道他一向来是祖宗给他众租收，他为人善良，故没有一个人上去斗

争他。村干部和土改队员见如此，也只好收场说：“现在就这样吧：保伦母子回去反省想清楚，将家里所有的钱粮交出来，只有交出来群众才会原谅你们，知道吗？”

散会后，保伦护送母亲，伤心地回到自己家里。他的妻子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儿子在家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他回家，弟妹们也担心他和母亲的安危。寒冷的冬天，天黑将下来，呼呼的北风吹着，乌云密布，整个大地变得漆黑一团。他的嫂嫂带着一个三岁的侄儿在房间里伤心地在哭泣流泪，他走去安慰她，劝她节哀，还叫她明天带孩子回娘家去。他的两妹妹烧了水给他和母亲洗了澡，又煮好晚饭叫他们吃饭，可是谁也不想吃，一家人都挤在母亲的房间里沉默流泪。深夜了，保伦安慰弟妹们去睡觉，又劝慰妻子安心回房休息，叫她带好孩子，说他多陪母亲坐一会。当他们都回房休息之后，母亲坐在床缘上，保伦痛苦地坐到母亲的身边，流着泪对母亲说：“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哥哥和你们。如果我不读那么多的书。我们家就不会变成地主，你们也不会有这样的苦受。”他哭泣着，把头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越说越伤心。

母亲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劝慰他说：“好孩子，你是我们家的好男儿，你专心读书，一心为国为民，为祖宗争得了荣誉，是好样的，怎么能说是你的过错呢？我们一家遭到这种灾祸，不是你造成的，而是统治者们造成的。”

“娘呵！你说得对。但是现在我们却无法逃脱这一灾难呀！如何是好啊。”保伦流泪满脸地说。

“这有什么办法？任由他们折磨个够就是了。”母亲流着眼泪说。

“娘，我真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和屈辱呵！我宁死也不愿辱生，只是担心你年老受苦受难，难以生活啊。”他泣不成声。

“好儿子，你不用担心老娘，我已经六七十岁了，死已不足惜，只是你还年轻，还有远大的前途，不该这么早就离开人世啊。”

母亲听保伦说出轻生的话，心如刀割，想到儿子读了这么多的书，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却遭此劫难。她感到惶恐、愤怒和无助。

“娘，你说说前途了吧，我们的国家走到这样地步，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恐怕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哩！我是不再有幻想和希望的，请娘亲不要再劝我。”保伦拥着母亲，虽心意已定，却难以割舍。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一起上吊吧！”母亲绝望地说。于是俩母子便在房间里上吊自杀了。

保伦的妻子在房间里陪孩子入睡，自己却久久不能成眠，翻来覆去等待着丈夫回房休息，还想劝慰他一番。等待了大约一两个钟头，她放心不下，便穿上大衣，提上灯，走去婆婆的房间，她打开房门，看见丈夫与家婆双双吊在楼桁上。她哭喊着立即叫醒弟妹，几姐弟起来看见，放声大哭。一时哭喊连天，冲破了漆黑夜空的寂静，把邻居们都吵醒了。天亮之后，他们的亲房帮助为保伦母子简单地料理了后事，不在话下。

后来，保伦家的房屋，土地及财产都被分了。他的妻子带着小儿子回娘家去了，他嫂嫂也回了娘家，两个妹妹嫁了人家，弟弟则上门入赘去了。就这样，一个大家庭便家破人亡了。

重建新居我家被划富农

一九五一年夏，我父亲接收了连平法院判决赔偿的二十担稻谷和二匹布，又打算重新建房屋。为了避免三房人和耕塘人的阻挠，他放弃在原蚕地段的地址重建，而是选择在离原地三四百米的蚕树社的小山丘边，那里有自己耕种的三亩旱地，又跟别人买了一块小山丘。他请了风水先生和木匠泥水师傅，拣了好日子，钉上樟符，拜祭了土神，便兴工整理基地。谁知刚整理好基地，上寨书房屋的曾罗月家族又来阻挠，在那里建房有碍他们侧边祖坟的视线，有碍他们的风水。九月初，我父亲又请了“民主”村和“新民村”的村长及大湖乡长等人来调解，经调解决定我家建房界线，不得超出那划定的界线。

争议解决之后，父亲便于秋收后请了建筑师傅和水工，在那里建起了上栋五间的泥砖瓦屋平房。

我父亲一生艰苦创业，向来不过问政治，为人诚实，只顾做米粉丝卖，一心只想着多挣几个钱，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以免后代在正寨受欺负。我哥松金也是个老实人，他的耳朵不太灵，有点聋，要讲很大声才能听清楚。他少年时父亲送他读过几间小学，只因他听不清老师讲课而读不进书。他身强力壮，耕田种地很勤力，十八岁时父亲便为他娶了一个老婆，后来因为受人诱拐就把她卖掉了。接着又为他娶两个老婆，但都因为住在下寨而被人诱拐与人通奸，于四七年冬也卖掉了。四八年又为他娶了一个二婚女子，四九年“解放”后，那女人又受人摆弄而闹了离婚。五〇年哥哥又跟一个离了婚的无娘家的妇女结了婚。那妇女名叫李亚东，二十四五岁，带着一个四岁的男孩，她虽然没有以前几个媳妇长得苗条好样，但诚实听话，做工也肯干，不

过家串门，故母亲很是喜欢。

五二年农历九月，我父亲又请了建筑师傅和水工，接着建那下栋五间的泥砖屋平房，建成后与上栋合成一座完整的院落。父亲迷信算命，说他今年脱运，明年要交上衰运，故急着要住进新屋去。于是他请了风水先生拭拣了好日子，于农历十月二十六日迁了新居，但新屋还有两间房子没瓦盖呢！

当时农村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土改运动，我父母和哥哥却一点也不过问这一政治运动，认为与自己无关，每天除了做农活之外就只顾做米粉丝卖。他们却没有料想到下寨的贫协主任曾石水正在与自己的亲房堂弟曾照狗相互勾结，阴谋抢夺我们家在下寨的十多间旧房屋。

石水当年三十多岁，脸上有许多麻斑，眼睛也像灯龙那样，长相很像他的叔伯兄弟水源狗。他也是过涧人，四五年后才住进下寨。

照狗则是我父亲的堂兄弟，十多年前他跟着他父亲流浪到河源黄田。后来他走田下寨，无屋无田，我父亲退出三四亩田给他耕，又给了他三间房屋住。但他不但不感恩，反而忌妒我父亲，对我父亲不满。

我们家自四九年“解放”到五二年冬，一直都被定为中农阶级。按《土改法》，我家耕牛，家具齐备，只有自耕地六七亩，还租地主土地五六亩，自己耕种，又勤力加工米粉出售，生活属中等水平，又没有粗粮收，故父母亲都认为不可能评为地主或富农的。他们却不知道自从下寨迁到新屋居住之后，石水正与照狗策划阴谋，企图把我们家评写上富农，然后分掉我们家的在下寨的十多间旧老屋。石水首先在下寨召集各户家长开会，动员各户不要跟我家买旧房屋，要大家一齐把家评写上富农。他说下寨没有地主，唯有把我家评为富农，才有房屋分，原有一二家亲房打算买的，也就不买了。几户亲房也听他摆弄，断绝与我家的来往。

接着石水向土改队作假汇报，说我家请了长工和短工，要评我家为富农。土改队人员问下寨贫农小组长曾良兴，良兴如实地说我家没租粮收，没有请长工，只在农忙时请上几个短工，都是靠自己勤力劳动的。某土改队人员向联队汇报了情况，后决定我家的阶级成份由联队在金溪片召开群众大会评定。石水知道良兴为我家讲话，说他立场不稳，就把他的贫农小组长撤了，换了别的人当。

那天在坪塘草坪召开两村群众大会，十二个土改队员参加，审议评定三四户有争议的农户的阶级成份，我家是其中的一户。我母亲和哥哥去参加了评议会。石水叫照狗等上台提议要评我家为富农，他们提的理由是水钦为我家的长工。我母亲听了，走上去反驳了他们，说水钦是与我家联耕的，因为他家没有耕牛家具又耕有三亩土地，是互帮互助的形式，不是长工。当时叫水钦来了证，结果十多个土改队员中大多数都认为这不算长工，就评为中农。

而贫协主任石水却死不甘心，在农历十二月公布全村各农户的家庭成分时，却有意不公布我家的成份。我哥哥当时去问他，他说：“你家的成份还未评定，待后再评。”

十二月中旬，土改工作基本结束，大部分队员都回家过年去了，“民主”村只剩下一个姓龚的北方佬留在村里过年。他讲北方话，听不懂南方的方言。这时石水就搞起阴谋诡计来，他于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决定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来评定我家的阶级成份。那晚上天气寒冷，北风呼呼，他叫了两个民兵提着枪到我家来。我们一家刚吃过晚饭，两民兵到来通知我父亲说：“今晚村里叫你去开会，现在就去！”我母亲问他们：“开什么会？”民兵说：“去到便知，我们也不知道。”母亲说要陪父亲一起去，但民兵却说：“让他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去一下子就回来的。不必麻烦两个人嘛！”

父亲也听信他们说，对母亲说：“我一个人去算啦，天气这么冷，不要两个人去受冻嘛！”于是母亲就给父亲加穿了两件长衣服，并嘱咐他小心为是。母亲本想叫哥哥陪父亲去的，但我哥因染上疟疾病，正在发冷，故也就算了，父亲一个人去了。

父亲去到村小学球场，来了一些群众。石水把我父亲叫上讲台，几个村干部和那姓龚的土改队员也在讲台上。石水对我父亲说：“水娣哥，今晚叫你说说，建新屋究竟请了多少人工？”

父亲不知道泽水耍阴谋，便直率地说：“总共可能有三四百个工吧！”

“既然是这样，就请你盖个指印吧！”石水叫文书写好了纸条，早有预谋地叫我父亲承认做屋请工的数字，叫他盖了指印。我父亲不知石水耍的阴谋，认为承认做屋请了几百个工没什么，就印了指模。

当我父亲印过指模后，石水与姓龚说了几句什么，便对群众宣布说：“今天晚上我们村要对水娣家的阶级成份问题进行评定，他刚才承认了做屋请了四百个工，四百个工算起来就是两个长工，就是顾工剥削，就是富农了。”

父亲听石水这么说，知道上当受骗，立即对姓龚的土改队说：“龚同志，我家做屋是在五一和五二年，那是解放后的事啦；听说评阶级是讲在解放前三年的，怎么就这样算我家请了两个长工呢？怎么可以这样呀！”

可是那姓龚的北方佬，听不清我父亲说话，不理睬我父亲说话。而石水早已串通了几个村干部，不容许我父亲辩解，他扳起了脸孔对我父亲说：“你承认请了四百个工，就是富农，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若不服，就把你绑起来，送到区公所去！”石水恐吓了我父亲几句，便宣布散会。

站到台前的下寨屋的华荀叔劝我父亲说：“水娣，算了吧！就算是富农也没什么，你照样可以做米粉生意。我劝你还是回

去，好好过一个安静年吧！”

父亲无可奈何。回到家，母亲问他开什么会，他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母亲知道上当受骗，懊悔当时没有跟他一起去。我们一家人听了感到十分愤恨，但却也无可奈何。

接着石水征收了我家在下寨的八间旧房屋，分了三间给他的堂侄——打劫贼水源狗的儿子，他自己分了一间，其余四间也分给了过涧人。照狗没有分得半间，感到上了石水的当，被他利用了，有点后悔。过年时照狗的两大个儿子回来，问他父亲：“怎么水娣爷会被评为富农的？”照狗说：“都是石水搞的阴谋啰，把他做屋请的工算作两个长工，就说是富农了。”

“你们在家也真没用，怎么不去反对呢？让他乱搞。”照狗的一个儿子说。

“唉！我们也是上当受骗呀，以为把他评上富农可以分上三两房屋的，谁知却没分得一片瓦，真是后悔呀！”照狗说。

“那些房屋本来也是不应当征收的，又不是出租的，怎么又征收了呢？”他的二儿子说。

“哎呀！你哪里知道石水的狡猾呀。他借口说你水娣爷以前买了火明的破屋拆了，现在要用这些旧屋来赔偿。他有权就任由他说啦！”照狗不好意思对儿子说什么，只有把责任推给石水。

石水借风盗去了我们家的八间旧房屋，这是我父母一生中用血汗积累的血汗钱，竟然给他用几句话就抢夺去了。我们一家人对此十分愤慨，但在那黑暗的年代里，那有你申诉的地方？过年了，因为建房欠下师表和水工的工钱，虽然父母兄嫂日夜劳碌加工米粉出售，却没还清债务，只有省吃俭用过年。

过了年，“民主”村与“新民”村合并为金溪小乡，泽水当上了小乡长，大湖则成为区公所。农历四月时候，我二姊听说这时进行土改复查，就对父母亲说，母亲听后就叫父亲到区所去申诉。父亲在一家人的支持下，走到区公所，找到一位区长，诉说

我家去年评阶级时被石水歪曲政策写上富农之事。那位区长听后立即打电话到小乡，问石水是怎么一回事？石水在电话里否认说：“水娣的阶级成份是土改队在这里评定的，不是我写上的。他现在是想翻案，进行反攻倒算。”区长听后，不但不听取我父亲的申诉，反而踢了我父亲几脚，说我父亲反攻倒算，把他赶出区公所大门。

父亲垂头丧气地带着伤痛走回家，对我们一家人述说了以上的经过。母亲听后感到十分气愤地说：“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从此我们一家人就忍气吞声默认这“富农”阶级成份了。

厄运频频降临

我家于五二年迁居新屋后。天天加工米粉丝，天天要把米担到距二里路（一公里）的耕塘去研，感到辛苦和不便。过了年后，母亲和哥哥便请了几个人，到下寨去抬搬那座旧米研。照狗做米粉也要研米，看见我母亲和哥哥等来搬米研走，走来阻止，企图把米研霸占去。他走来对我母亲说：“这座米研已被没收了，不准搬走！”我母亲反驳他说：“是谁说没收了的？没收凭据呢？”照狗说：“是石水说的。”母亲说：“你叫石水来！”他便走去把石水叫了来，可这回石水却不帮照狗说话，石水对照狗说：“这座米研一向来都是水娣家的，又没有出租，怎么会没收呢？是她家的，怎么可以阻止她搬走呢？”这时照狗感到没面子，便怀恨在心。

五三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早上七八点钟时候，我们一家人正在加工做米粉丝，哥哥榨粉，父亲剪米粉线。哥哥榨完粉丝，将榨粉的一条二三百斤重的硬木榨杆撑起，用一根大木棍支撑着，以前是用大麻绳吊起的，现却改用木棍支撑。哥哥走出大小便，父亲坐在粉筒底下剪完粉丝，站起来用手去挖米粉筒，不料碰动了那条榨杆，支撑的大木棍一动，歪斜着倒了，那条笨重的榨杆掉落下来，父亲“哎哟！”一声，榨杆将父亲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压碎了。哥哥和姊姊立即跑进屋去抢救，将榨杆撑起，手指鲜血直流。姊姊用布放上黄烟丝，把他的手包扎好，卡住了流血。过后父亲日夜躺在床上，伤口发作，叫苦连天。那时很少西医西药，只有在西湖田区政府有一间卫生院，家中经济又困难，故只用一些中草药去敷。父亲在这次不幸工作事故中痛苦地熬磨三四个月，到农历八九月，伤口才愈合，而被压碎的手指有三个已经残废，

只剩下拇指和食指能活动。

九月之后父亲虽然左手三个手指残废，但他依旧帮助家庭做米粉，也到街上买米和卖米粉。他担不得就叫我哥挑到绣缎街去给他卖；买回谷米就叫我哥挑回家。

公历十二月，连平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中央的“统购统销”政策，由政府粮管所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不准个人买卖粮食。我父亲听说政府实行这一政策，也打算停止做米粉生意；但还欠人一些债务，他又在街上跟人买了二十斤大米，与自己家里的五十斤大米合做最后一担米粉，并在绣缎街出售。

五四年元月连平地方当局开展打击贩卖粮食破坏购统销的政治运动。照狗由于怀恨我家搬走了米研，当他知道我父亲于十二月中旬卖了米粉时，便乘机报复，向石水乡长报告反映，说我父亲买卖做米粉搞投机，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运动当头，石水听照狗反映后认为这是要打击的典型。于是他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决定于元月某日在绣缎街召开群众大会，把我父亲拉去斗争，说他买米做粉出卖，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斗争会结束后又把他押进区公所监房。区公所的监房没棉被，叫我母亲给他送了一张旧棉被。第二天，父亲便被送去连平县看守所坐牢去了。由于绣缎到连平有四十七公里远，加上高山峻岭的阻隔，交通不便，故直至农历过年，我哥哥才带了一些过年的油炸米果及红烧猪肉去探望他。哥哥翻山越岭走了一天的路去到连平城，次日找到看守所，通报姓名后，当局不准亲人见面，只得把食物留下由看守所人员交给父亲，有否交到他手中无从得知。第三天哥哥又走路回家，把经过告诉母亲。

父亲在连平看守所坐牢直至五四年四月，连平法院才宣判定他的罪。说他于五三年十二月买二十斤大米榨粉丝出售，破坏粮食统购统销。判刑二年。八月才把他送到连平尖劳改场劳动。在劳改场，由于他的左手残废，他们就让他去放鸭。在那荒山密林

里，狐狸野兽很多，鸭子给狐狸吃了很多，当局又给他加了一年的徒刑，后来还有人传说他给老虎吃了呢！

一九五四年农历二月，春耕春种开始了，由于去年父亲为了还清债务，把家里原有的一条大水牛卖掉了，还没买回来。这时母亲叫哥哥把一头母猪和几个猪仔卖掉，以便买回一条小牛来春耕。不多几日，哥哥卖掉了母猪和小猪，买回一条小水牯，牵回家后才发现小牛屙烂屎有病，又不多吃草。哥哥便叫母亲煮了些小粟米糊给小牛吃，可小牛都不喝，哥哥就喂灌它。为了应付春耕生产，哥哥牵去教练小牛犁田，可是教不上几圈，小牛就走不动，打他两鞭，小牛就倒下。小牛日渐消瘦，再过几天，在一天的晚上六七点钟时候，小牛病倒在牛栏里，断气死了。二姊听说小牛死了，竟然哭了。为了避免别人说哥哥乱屠杀耕牛，她叫哥哥去报告小乡长石水。哥哥当即走去下寨向石水报告，石水冷淡地对我哥哥说：“牛病死了，怕有病毒，就把他埋了去吧！”哥哥得了回话走回家，对母亲说了石水的回话。母亲与我哥哥觉得把牛埋了可惜，于是商量把牛皮剥开，割了牛肉，把牛头和肠肚用牛皮包着抬去远处的山边埋了，然后把牛肉煮熟晒干当干菜食。这事后来石水也没有过问。

春耕时节快到了，没有钱买耕牛，怎么办？后来幸得遇到陂头屋的黄添信上街经过我家门口避雨，他与我母亲同姓，说起我父亲被害和耕牛病死之事，他深表同情，就叫我哥哥与他家搭耕：他家有水牛一条，先帮他家插完秧，然后再给我家插秧。

谁知他家耕着七八亩的稻田，一家七八口人只有他夫妻两人劳动，其余的是小孩和老母。他家的田多在山坑里，离屋又远，故竟然插了十来天。后来到我家插秧时已过了谷雨，几乎插到立夏时节才把秧插完。

由于插秧延误了季节，所以也影响了禾苗的生长，使得我们家的稻谷成熟时有三分之一的白穗，收成大减产。

到了夏收夏种的时候，母亲又叫我哥哥把留下的一头母猪养的几条较大的猪仔挑到和平县城去出卖，以便买条小耕牛来。一天在，半夜三更时候，母亲喂饱了小猪，哥哥吃过早饭，把四条较大的猪仔挑着到和平城去卖。当走到绣缎与和平县交界处时，却遇到大湖供销社的人员拦住去路，勒令我哥放下猪仔，说不准把猪仔运到和平县去卖。我哥当即担着猪仔往回走，可他们却拦住说：“你是搞投机买卖的，这几条猪仔是要没收的！”我哥说：“这几条猪仔是我家的母猪生的，不是搞投机买卖，怎么能没收呢？不准到和平去卖我就挑回去嘛……”可是这伙人却不由分说，像强盗一样强行我哥把猪仔留下没收。还喊打我哥哥。我哥哥无可奈何，只得拉着一条扁担，流着眼泪走回家来。回到家天刚亮，我们一家正起床准备去割禾，看见哥哥哭喊着空手走回来，母亲问明原因气愤地大声骂道：“真是十足的土匪王八蛋！借风盗枪！给老百姓挂上一条罪名，就把别人辛苦喂养的猪仔抢去，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嘛！”我们三姐弟看到家境如此贫困，现又遭贼劫，也跟着哥哥一齐哭喊起来。

为了能买上一条小牛耕种，在夏收夏种的辛苦日子里，母亲每餐都煮蕃薯粥给我们吃，省下几担谷平价卖给粮所，又把剩下的三四只猪仔卖掉，才买回一条小黄牛牯，艰难困苦地把夏收种搞完。

五四年秋，我考上了忠信初级中学，母亲和哥哥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中还是给我读中学。那时学费不贵，才三元钱人民币，自己带米，学校学生每餐吃三分钱的菜，柴伙费每月一元八角钱。母亲养了些鸡，每月靠卖鸡和鸡蛋来支持我读书，那时每只鸡蛋才三分钱，每斤鸡才五六角钱。我的二姊和弟弟还在湖三小学读五年级和四年级，二姊上学迟是因为父亲以前重男轻女，没有给她上学，直至五二年秋才在二姊的强烈要求下让她上学读书的。由于她年龄大了，她一上学就报读三年级。姐姐和弟弟在家住宿，

每天下午读书放学回到家后还得帮家庭割草皮填猪牛栏，星期日常要帮着出田做工呢。我们家自从五二年冬住进亲屋后，灾难重重，一直没有缝过新衣服，我们三姐弟都是穿着旧的或是补了的衣服上学，受到别的同学的歧视，我们感到羞辱和难过。我在忠信中学读书，别的同学有助学金，我家如此穷苦，由于家庭被写上富农，却没有助学金。后来湖三小学停办六年级，二姊转到湖东小学去读，要在那里住宿，姐姐还得于星期日去砍柴，把柴挑到石灰窑去卖了，才有钱交柴伙费。我们读书虽然如此艰苦，可是我们没有放弃学习，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冬天的早上我的手脚被冻得发麻，身上冷得发抖，但我还是坚持上课，从不缺席。

有一个本班又是同乡的曾充信来欺负我，他看见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很是忌妒。他经常在班里散布流言蜚语来打击中伤我，说我父亲是劳改犯。他把一口盅水放在房门上，待我进门时掉在我的身上，把衣服淋湿了。我气愤之下用力推了他一下，他跌倒在地上。他爬起之后却用木履打我的头，于是我就与他打起架来。同班同学报告了班主任欧阳化水，结果学期末了，我的学习成绩虽然是第七名，可是品德操行却被打为丙等，这使我感到极大的义愤。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及家人，只自己忍受着种种的歧视给我带来痛苦。

一九五五年农历四月，父亲从连平尖山劳改场调到忠信莲塘劳改场，他传话给母亲，叫她去探望。星期六的晚上我上学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知此事，并叫我明天星期日顺路带她去探望父亲。星期日早上，母亲准备了一些熟花生仁和糯米糕，又杀了一只小公鸡炒熟，装好带去给父亲。吃过早饭，我担上米粮，便与母亲一起去探望父亲。

从洋塘岗分路去劳改场只有三四里路，十二点时分我们走到了场部，找到了队部的一位队长，他带我们直到牢房的大门口，打开铁门，把我父亲叫了出来。我看见父亲穿着一身劳改服装，

皮肤晒得黑赤赤的走出来。我叫了一声“爸爸”，不觉流下了眼泪。母亲也流着眼泪，说不出话来。父亲见我们伤心，却安慰我们说：“不要伤心难过嘛！现在家里没事吧？”母亲含着眼泪说：“家里别的事没有，只是你被捉走后，家里买了一条小水牛牯病死了，从此家庭经济困难就是啦。现在寅儿在忠信中学读书，他弟弟和姊姊也还读书，金儿又添生了一男一女，家里缺少劳动，我要在家理家务和看顾小孙，只有金儿夫妻俩出田劳动。望你安心劳动，争取早日回家。”

父亲说：“家里的困难我是知道的，不如这样吧：以前我们曾给寅儿定娶的童养媳，现在也已十八九岁了，就把她叫回家来与寅儿成亲吧？这样就可以多一个人劳动啦。”父亲又说：“寅儿，你能读上中学我感到很高兴，希望你努力学习。家里缺少劳动，就把以前定给你的童养媳娶回来成亲吧？我当年也是十七八岁时成亲的。现在家庭环境这样，你就简单地成亲算啦！不要太过讲究嘛。”

我低下头没有说话。母亲又与父亲交谈了一会，把带来的食物交给了他，就告别了。然后我前往中学走，母亲就独自回家去了。

农历八月时，母亲与哥哥又去洋塘探望过父亲一次。不久父亲就调到河源高博岗劳改场去了，因为路途远，我们就没有再去探望过他。

到了冬天，母亲托人传话给我定亲的童养媳，约定她于某星期日与我见面，商谈双方成亲之事。那天她与原媒人及一位姐妹来了，我与她见了面，看见她长得又高又瘦，双手像松树皮那样粗糙，比我大一岁，不像个少女。因此我不中意她，当即写了一张解除婚约书给她。母亲没有逼迫我与她成亲，任由我做主。

一九五六年春，我家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兄嫂参加农业社劳动，母亲在家料理家务和带小孙子。在夏收时按劳分红，我哥哥

虽然是强劳动力，每天十分工；嫂嫂每天八分工，他们都出满勤，总共计得三千多分工。每十分工的分红值只有三角二分钱，半年只得一百多元钱。全家分得口粮谷一千五百多市斤，还有十斤花生油和黄豆，每百斤稻谷八元多钱，收支对比还要超支二三十元钱。这比起单干户时的粮食及各项收入都显著的减少了，生活更贫困了。

这年的暑假我二姊考上了忠信中学。她很想继续升学读书，可是家庭如此穷困，哪有钱给她读中学呢？哥哥认为她年龄也大了，就叫她不要上学，叫她在家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姊姊因没钱升中学而哭了两天，我也为姊姊没能升中学读书而难过落泪。

反右整风运动

一九五六年秋，我在忠信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我们甲班的班主任是程佩潜老师，他教我们的语文课和自然地理课。程老师高高瘦瘦的身材，大约三十一二岁，是河源黄村人，家庭背景是华侨。他有老婆和一个男孩，经常都不在他身边，多在他家乡居住，只是偶然间到他这里来住一月半月。程老师为人正直爽快，对学生也十分关心和爱护。这学期开学后不久，一个星期日我没回家，一个人留在宿舍里，他走来跟我聊天，问我的家庭情况，我如实地告诉他，说家里经济很困难，二姊因为经济困难而没上学。他听后深同情，不久他减免了我已缴交了的三元钱学费，让学校退还了给我。这是我自从读书以来第一次获得减免学费的待遇，以前每学期有许多同学有减免学费和助学金，我家庭经济很困难，因为家庭出身富农却没有权享受，让我感到很难受。这学期程老师能给我减免学费，使我感激不尽。

程老师在学校里得到学生们的尊敬的爱戴，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许多同学与他一起到校外的空旷地去散步漫谈，有说有笑的，直至晚修钟响了，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他而回课室。

农历八月下旬，我父亲被释放回家，全家人都感高兴。父亲回到家后，在家除了协助我母亲带孙子外，还协助料理家务，饲养鸡鸭和猪狗。从此我们家的家庭副业就搞得比较好，经济状况也比以前好些。

一九五七年暑期，我初三毕业。那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冒进，各条战线都进行压缩，特别是教育战线，各大中学校的招生人数比去年大大缩减。连平县去年高中招两个班，今年只招一个班，其他中专学校分配给连平的招生名额只有三十个；但今年初

中有八个班的毕业生，人数达四百多人，升学率是4比1即25%。而我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连平高中，其中数学成绩是全连平的第二名。

公历九月初，我高兴地到连平中学高一班读书，全班五十人，其中忠信中学考来十人。因为连平高中是五六年才办的，所以我们的课室和宿舍都是新建的平房。开学后不久，学校决定在高中部各班开展“大鸣大放和大辩论”，我们的班主任谢细田在班会上要求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发言，谈自己对当前农村的生活状况的认识和体会，他说：“同学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学校是不会给你们扣帽子，更不会打棍子，尽管进行大鸣大放，也可以展开辩论。”

开始时没有人发言，后来忠信街的胡同学廖同学站出来发言，说：“现在农村农民的收入与国家干部职工相比，相差很大，干部职工每月收入一般都有四、五十元，农民只有五、六元钱。农民的生活很困苦，在生产队劳动，分红很低，只有二三角钱一天，粮食每年只分得二三百斤稻谷，都不够吃，要加蕃薯之类的杂粮来吃，真是太苦了。我看这个社会确实不合理。”

接着隆街的罗同学也发表同样的看法和感受。我听到他们几个都敢说出这样的观点，让我也有所感触，头脑发热起来，感情也冲动了，于是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前几位同学所讲的都是事实，他们对农民生活状况的观察和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他们对现实生活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我生活在农村，对生产合作社对农民的生活情况十分了解，农民在农业合作社里每天出田做工，只得到十分八分工，分二三角钱，一年才得二三百斤谷，每天三餐都吃蕃薯杂粮饭，生活的确十分艰苦的，还不及单干户哩。”

第一天晚上的班会就由我们几位同学发言，之后就结束了。到了第二天，响过晚饭铃后，班主任召集班里的团员及班干部开会，部署今晚班会的辩论，要求团员和班干部起来，针对昨天那

几位同学的言论发表意见。

晚上的班会开始了，班主任讲了开场白，团支书便首先发言，这位叫蒋平蓝的团支书学来一套给人扣帽子的理论，他批判胡石泉说：“胡石泉同学所说的言论是十足的右派分子罗隆基与章伯钧的言论，他否定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否定农民生活的改善，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出身于地主阶级，所以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他还想过地主阶级的生活。”他给胡同学扣了很多的帽子，骂了个狗血喷头。

接着又有两三个班干部站起来矛头指向胡同学，胡同学被扣了很多的大帽子，终于受不了而哭起来了。

紧接着就批判我和罗同学，一个满脸白麻的名叫周企求的表现得特别卖力和出色，他说我家庭出身是富农，父亲是个投机倒把分子，曾经被判刑劳改。他说我是站在富农阶级的立场来否定农业合作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还想过以前那种剥削人民的生活。他也一个接一个的给我扣帽子，也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也终于被骂哭了。

我当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哪里受得起这样的打击和谩骂？下课后我走在校园的大树下痛哭流涕，两个原忠信中学毕业的同班同学走来安慰我，叫我别为这伤心，别理睬他们的说话。在这两位同学的劝慰之下，我止住了眼泪，走向宿舍休息。

由于我的年轻而幼稚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从此学习的劲头没有了，听课也没心情，学习成绩大大地下降。到学期结束时，各科成绩仅仅及格而已。

一九五八年元月初旬，上级通知全国各地的所有教职员工开始“反右整风”运动，学生提前放假。放假后我回到家乡，见到了忠信中学比我高一年级的校友曾南甫同学。他原也是考在连平高中读书的，现已转到和平中学读高二去了。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也想于明年转学到和平中学去读，换一下学习环境，以利于今后

的前途出路。我先跟父母说好了，然后就于春节前走到和平县城，找到大姊夫黄月明。我姊夫黄月明以前在广州开商店，四九年由于战争丢弃广州的店铺，回到和平县城开杂货店，五五年公私合营，成了一位食品店的职员。我找到他，跟他说明想转学到和平中学读书比较方便；因为绣缎到和平县城只有二十五公里，而到连平却六十多公里，而且要爬越高山峻岭，十分不便。他表示同意，我要求他跟我一起找中学校长。去到和平中学，那里也正在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看到学校办公大楼的周围都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许多大字报是攻击和平中学正校长陈道昭的，所以陈校长已经被解除了职务，由副校长周云彬负责学校的工作。我们找到了周校长，我向他说明我因上学要姐夫负担生活费用，家在大湖绣缎，距和平中学近，也比较方便，要求转学到和中读书。我姐夫也与他谈了一阵，周校长便答应了。

过了春节，年初八我便乘车到连平中学，那里还正忙着反右整风。张校长很忙，我就找曾道明主任，对他说：“曾主任，我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上学要靠在和平常城的大姐夫来负担；我家在绣缎，距和平中学较近，所以要求转学到和平中学去读书。和中校长已答应了，请你写张转学证给我。”

曾道明是五七年连平招生委员会主任，负责连平县高中及中专的招生工作，他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数学是全连平的第二名，现听我说要转学，他爱惜人才，故很想挽留我继续留在连平中学学习，他对我说：“石荣，我劝你不要转学，留在这里继续学习吧，经济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我听了他的话心里十分感激，但我转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上学期在心灵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中伤，无心留在这间学校学习，致使学习成绩急剧下降。我客气地对他说：“曾主任，感激你的爱护，但是我意已定，请你给我写转学证吧！”他见我坚持要转学，也不再勉强，就给我写了转学证。

我拿了转学证，谢过曾主任，又到城里办了户口和粮食转移

关系，就乘车回到家。接着又到和平中学去交上转学关系证明；但由于学校整风运动还在继续，我直待到三月下旬才到和平中学去上课。

反右整风运动结束了，我来到和平中学读高一乙班。那时和平中学整风中有八九个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有正校长陈道昭和他的夫人陈清辉老师，还有其他几位老师都是德高望重的优秀教师。他们都被迫离开了学校，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被清洗，回家受管制。陈清辉老师在一九五二年秋曾在湖三小学教过我，当过我们五年级的班主任，她教语文和音乐。她长得很美，也很和善，同学们都很喜欢她。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她离开湖三小学与中和校长结婚并在和平中学当了一名职员。她有一个妹妹正在高一甲班读书，与我是同年级的同学。五月时候就听她妹妹说她姐姐在家因为精神受严重打击，身染疾病没钱医治而去世了，当年才二十三岁。我听说后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惋惜。

后来我也听说忠信中学有四五位老师被评为“右派分子”，程佩潜老师是其中的一个。程佩潜老师被评为“右派”后，被赶回河源黄村老家受管制去了，他的妻子又与他离了婚，只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还患上了风湿关节炎，过着十分凄惨的生活。

连平中学也有六七个老师被评为“右派”而离开了学校。其中德高望重的曾道明主任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清理回兴宁家乡受管制去了。他原是广东保安十三团曾天节团长的一位参谋，四九年投降共产党后被安排在连平中学当教导主任并教语文课。他的教学很好，加上演说水平高，深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德高望重，五七年被选为连平县招生委员会主任。五八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被遣送回老家后不久，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享年才四十五岁。

在这次反右整风运动中，在全国有几十万优秀的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有的送去劳教，有的送回农村劳动管制，

死的死，伤的伤，埋没和糟蹋多少人才呢？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和悲哀啊！

人民公社与大炼钢铁

一九五八年8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争取今年钢产翻一番而奋斗，要求全民开展炼钢。29日会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中说：“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接着便在全国各地农村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

那时我在和平一中（即和中）读高中二年级，九月下旬，我们学校接到上级通知，要学校停课下乡宣传发动建立人民公社。师生们便挑着行李被铺等到和平县大坝乡的山村去落户。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向社员群众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它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经过几天时间，大坝乡便成立了一个政社合一的“大坝人民公社”，原来的村农业合作社便成为一个生产大队，下边的是生产队。其他的各个乡村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人民公社”。

公社成立后，接着便掀起“三化六集中”的浪潮，三化就是：生产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领导指挥一元化。六集中就是：生产生活资料集中，居住集中，生产集中，吃饭集中，分配集中。

我们完成宣传任务后回到学校上课。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回家拿生活费用，那天晚上家里杀鸡汤鸭，我问父亲：“今天不是节日，怎么杀鸡宰鸭来吃呢？”父亲说：“你在学校还不知道呢，现在成立公社啦，说所有各家各户的粮食、猪、鸡、鸭等都要归公，不准个人饲养啦！听说不久吃饭都要集中吃大锅饭哩。现在不吃，到时就没有得吃啦！”

我说：“让集体去饲养也好嘛，怎么把母鸡都杀掉吃呢？”父母亲都说：“家家户户都这样，难道你就这么傻，就愿意把自

己家里的物品贡献出去？”我没话可说，便让他们去处理。不久父母亲看见生产队里有人把家里的粮食埋藏起来，他们也把家里的一些粮食埋藏起来，以备以后饥荒时吃用。

不久，学校又接上级指示：停课下乡搞全民炼钢。于是我和班里的同学又挑着衣被等行李，走路到二十里外的大坝街的一个村上，在农民的一间宗祠里住下。第二天清早吃过早饭，便挑着一担竹箕到二十多里远的山坑去担矿石。山路小径，上坡下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十分难走。有的同学挑上一百多市斤，可我只能挑六七十市斤，感到十分辛苦。我有时辛苦了就装病请假，一个多月请了几天假，许多同学和班主任都认为我是装病，是怕苦怕累的藉口。

大坝街附近的小山岳上建起了许多的小高炉，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看上去也像是一座小炼钢城。我们学生把矿石从二十多里远的山坑担到这小炼钢城上。农民则有的被调去捶碎矿石，有的被分配去大砍森林，把砍来的树木当柴火炼钢。我们看到附近的小山的树木森林被成片成片的砍伐光了，可是炼出来的却不是钢铁，而是一堆一堆的石屎。为了虚报成绩，当局要求各公社成立公共食堂，收缴各家各户的铁锅，拆锅炉砸铁锅，把砸烂的铁锅送到小炼钢城，放进高炉重新炼成铁。

农村和生产队的大部分强壮的劳动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去了，只剩下一些妇女和老弱病残的社员在生产队里。这时正是秋冬时节，各种农作物都要收成，不及时收成就会糟蹋在田地里。可是大部分强劳动力被调走了，生产队缺乏劳动力，使得生产队有许多的要收成的庄稼没有及时收成。例如有的生产队还有大片的稻谷没有收割而被糟蹋在稻田里；有的生产队则有许多秋花生仍留在田地里没有收成而发芽；我家所在生产队则有大片的蕃薯没有收成而让霜煎熬而腐烂。

这时候还刮起一大股浮誇风，大吹大擂地宣扬各地的高产卫

星田。今天报导某地某公社某大队创造亩产稻谷一万六千多斤的卫星田，明天另一个地区的某公社又创造了亩产稻谷六万多斤的更大的卫星田，后天又有一个地方的社员创造亩产十万斤的大卫星田。后来竟然出现一个亩产一十六万斤的特大卫星田，不仅《南方日报》报导了这一消息，《人民日报》也是如此报导了这条消息，真是可笑得很。

由于各报章电台连篇累牍地报导各地农业取得了如此特大的丰收，所以当局便认为粮食过关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各报章也大力宣传各地公社农民在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的情况，说农民现在吃饭不要钱，无论男女老少及病残等都放开肚皮在集体的食堂吃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在中国实现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连平与和平两县合并为九连县，县城定设在忠信，又大兴土木工程，建设新县城。这时又征调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去砍伐树木，大烧砖瓦，大刮民财。

关于亩产十万斤稻谷的卫星田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这里举连平县忠信公社官陂大队的创造事例来说：

这官陂大队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名为“红星”的农业社，它位于忠信街的下侧。五八年秋成立公社后，当局为了搞个高产试验田，公社党委决定在官陂大队选择一块一亩左右的稻田，把其周围几十亩的水稻禾苗全部拔起来，集中移植到那一块一亩的稻田里。那时禾苗已经长到一尺五寸多高，并且正在园身孕穗的时候，却进行移植，还放了许多肥料，许多社员和干部都认为不妥，但有谁敢说呢？其中有个老农民叫李大伯，看见当局如此蛮干，便起来对吴书记说：“吴书记，这些禾苗正在园身大肚啦，是不适宜移植的呀！你们怎么竟然把几十亩的禾苗拔起来移植在一块稻田里呢？这么密植是会枯黄而死的！”

吴书记却扳起脸孔对李大伯说：“李大伯，你不要胡说八道！

现在是大跃进时期，是不讲常规的，我们现在搞高产试验，你不要走来破坏。你若再说就当你破坏大跃进，立即捉你去批斗！”李大伯见他如此不听劝告，只有叹气走开去了。

第二天，那块移植得密密实实的禾苗便开始发热发烧。当局见状便派人在稻田的四周装上几十台鼓风机，用人力轮流使劲鼓风，给禾苗吹凉。可是哪里有用？第三四天禾苗便发黄，再过两天禾苗便开始腐烂死去了。

这一计不成，不久当局在秋收时又想出另一放高产卫星的绝招：把周围几十亩成熟了的水稻禾割下来，集中放到一块一亩的稻田里，然后通知县委和《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记者及惠阳地委的领导，请他们到来参观高产卫星田。在夜晚的时候，他们布置好灯光，记者们在现场拍摄了“高产卫星稻田”的照片：稻穗堆满成山，俨然是真实的高产卫星田星。

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里，听母亲诉说了当局一件更加荒唐的事：

当时连平县与新丰县进行农业评比，看谁的肥料最好？新丰用猪肉放进粪池里让它腐烂做肥料；连平则用豆腐放入粪池去做肥料，要求各生产队把一百几十斤的大豆磨烂后倒入粪池去做肥料，并进行逐一检查验收。我家所在生产队离大队较远，是一个较边远的生产队，社员得知此事后便劝告生产队长，叫队长别这样浪费，先将豆子磨烂后取了豆腐吃了，然后再把豆腐渣倒入粪池去。队长听从了社员的话，这样做了，社员们吃饭了豆腐，心满意足。后来大队带人来验收，当局果然觉察不出来，过了关，社员们高兴了。其他的生产队侧按上级的要求去做，白白浪费糟蹋了大量的大豆。如此进行评比。你说荒唐不荒唐？

毛泽东看到报刊所载各地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田星，农业有了特大丰收，便为之总结出高产的“八字献法”：“深耕、改土、水肥、密植。”还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

秋收后，各公社的每个管理区抽出一片最好的保水良田来做试验田，进行深翻改土。我们家的“民主”大队与“新民”大队成立一个名叫金溪的生产管理区，选择在高陂屋前的那片最好的保水良田进行深翻改土。抽调各生产队的许多劳动力来搞；先挖一米深的坑，然后割些草皮放下底去，再盖上土。这样一搞，便把原来面上那层肥沃的土埋在下边，而底层的泥骨翻了上来。而水稻的根最多只长下二十厘米深，生不到下边，怎么吸收下层的肥呢？所以深翻改土是弄巧成拙的行为，也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举措。有些地方甚至被搞得无法进春耕，例如和平县大坝公社某大队，有一大片良田被深翻起的土堆像小山一样，深坑没有填平，春耕到来了，却要我们和中的学生停课去帮助他们把深翻的土堆拉平，让社员进行春耕插秧。真是荒谬极了。

追缴黑仓闹饥荒

由于大炼钢铁和搞人民公社，浪费和糟蹋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荒芜了无数的良田土地，加上大搞浮夸风，粮食被糟蹋了，大减产却被当局说成大丰收，弄虚作假大放卫星田，说成了粮食特大的丰收。既然粮食特大丰收了，各地应该有大量的粮食储存。当县委和县政府要各地公社上缴粮食时，五九年元旦过后各地公社和大队却反映说没有粮食，所剩无几。这使中共九连县委（连平与和平合并后）感到惊奇：各地粮食都大丰收了，为什么放开肚皮吃饭不到三个月，却没有粮食了呢？这里必有问题，是否各地干部有意暗藏了黑仓？于是决定于元月19日分别在连平与和平分两个片，召开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甲级干部会议，称万人粮食会议。大湖划为和平片，所有的各级干部都到和平县城开粮食会议。

我家所在的耕塘生产队有正副队长前来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是住宿在我们和平中学的礼堂里。大会开始由县委副书记作了“目前的形势”报告，说：当前形势大好，各地粮食都大丰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各地却又说没有了粮食，这是为什么？是否是你们这些干部有意收藏黑仓？所以这次会议是专门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召开的。希望各级干部要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觉悟，如实地把你们大队和生产队所暗藏的黑仓报出来。会议先让你们讨论，提高思想认识，然后报黑仓。

会议第一天听报告，第二天分各公社各大队进行小组讨论。谈形势谈认识。第三天开始要求报黑仓，这时每个到会的干部都目瞪口呆，像是哑巴吃黄连，不知如何说才是。说没有粮食吧？去年冬天又虚报了粮食的大丰收。说有吧？到时去哪里找来粮食

上缴？个个都感到为难，骑虎难下。

到了第四天晚上，还是没有人把暗藏的黑仓报出来。当局看到这种局面便于第五天又集中各公社及大队的干部进行总结会议的进展情况。当局对全体干部说：既然大家都说去年冬天是大丰收了，却又说没有粮食，又不把暗藏的黑仓报出来，这能说过得去吗？对此我们县委决定：过几天就要过春节，不报出黑仓的不得回家，留在这里学习反省；报出了黑仓的就可以立即回去过春节。

下午又分小组讨论报黑仓，其中林寨公社有一个大队小组的几个干部暗中商议：“现在上级一定要逼我们吃这条死鱼，不吃也得吃，是他们带我们说谎，不说谎是下不了台了。说了以后到时再任由他们处置就是啦！”于是这个大队的干部首先报了“黑仓”，说这个生产队暗藏了三个黑仓，每个黑仓有稻谷一万斤；那个生产队也有二个黑仓，每个黑仓有八千斤的稻谷等。其他大队的干部见他们报了黑仓回家过年，便问他们是否真有黑仓？他们说：“这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哪来黑仓呢？是他们逼我们说谎的，不说不成呀！”于是一下子各公社各大队和生产队都纷纷上报了黑仓的数量和所暗藏的稻谷多少，会议也终于圆满结束了。

各地干部回去过春节，可是这个集体食堂面临的春节难过啊！生产队的食堂没有猪可宰，也没有鸡鸭可杀，既缺油又缺粮，一切食物都短缺，怎么过呢？社员个人家中没有了一切，连锅炉都被毁了，只靠公共食堂才有吃。而食堂要靠生产管理区来分配。金溪管理区有两个大队，近二千人口，虽然杀了六七条大猪，平均每人只能分配半斤猪肉，分配到各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再由食堂煮熟分到各户。耕塘生产队除了每人平均半斤猪肉外，食堂还做了几十斤的糯米油果，每人平均分一市斤。除夕晚餐当场就一下子吃完了，年初一也只有每人分得一斤的薯片杂米饭，青菜都很少，就这样过了一个自盘古分天地以来最贫乏而又是最隆重的

中国旧历年。

春节过后，当局派人来追缴黑仓。哪里有黑仓？白仓都没有粮啊！还有黑仓？当局不但没有缴上一个黑仓的粮，而且各地正在闹粮荒呢！各生产队库存的粮食很少，还要求县政府发粮救济。这时县党政感到惊慌，知道是去年大搞浮夸风造成的结果。怎么办呢？县党委和县政府立即指示各单位及各公社限制粮食，严格规定：所有机关干部、学校的教职员工及学生、各厂矿企业员工、商业等的员工，每人每月只配给二十市斤大米，四两油；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每天由县粮管所供给四两米至六月底止，不足部分由各生产队自己解决。生产队是没有粮食了，只能叫人多种菜，又不许个人种，靠集体种菜，哪里种得上来吃？而且每餐只吃二两米饭，其他什么杂粮都没有，肚子饥饿得很，哪有力气耕种啊！

这时街上的所有商店和饭店都没有糖、饼及其他任何食物卖，吃饭要有粮票。一个月后，许多农民身患水肿病，开始时人数少，公社卫生院还发放些米糠与大豆粉给水肿病人。但后来患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一发不可收拾，哪有这么多的米糠与豆粉来发？那就只有任由他们听天由命去啦！从四月至六月这段时间里，各地生产队都有许多农民因缺粮食患水肿病死去，有的地方较严重，有的地方较轻。

我当时在和平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我们每月还有二十斤大米吃。我们学校的梁校长又将学校农场的地分给各班种菜，我在家里拿了很多田瓜子给班种，各班自己种自己收来加菜吃。我们班每星期都加菜一二次，没有油，只放点盐去煮，肚子饿了也感觉好吃。故此我们不至于患水肿病。

历代社会中如某地发生饥荒，老百姓还可以逃荒。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的饥荒是全国性的，老百姓想逃荒都没处可逃，到处都闹饥荒，想讨饭都没处可讨，想偷东西吃也没有东西可偷。唯有

去刮树皮和摘野菜充饥，可是野菜和树皮都给弄光了。于是只有忍饥挨饿，让它患水肿去，让它死于非命去。我班来自林寨公社的同学说他们公社有一个村，每天都出三十副棺材。饿死的农民之多可想而知，在全国后来有人统计为六千万人以上，这么悲惨的事，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

当时我家所在的生产队还算幸运，患水肿病的人较少，因患水肿而死的只有一个队长和一个社员。其原因是因为去年秋冬时，还有许多蕃薯没有收成，还埋在田地里，虽然到了春天已有许多腐烂了，也有许多已经发芽，但还可以收来吃。因此各户人家就趁机各自去抢收那埋在田地里的蕃薯，各人抢收归各人家，劳力多的就抢得多，劳力少的就抢收得少，但每家每户都收有一些。故此让多数的社员逃过了这次劫难。

一九五九年七月夏收后，集体食堂解散了，社员也分得一些种菜地，饥荒有所缓和，水肿病也很少了。但物资依然奇缺紧张，并且影响到大中城市去了。

经济困难怨天尤人

尽管当时经济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但我还是坚持学习，并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希望能升上大学。五九年秋我们学校进行物理竞赛，我考取了全校的第二名。但那时物质紧张，没有什么物质和金钱的奖励，只发给一张奖状和一张学校食堂的菜票，去食堂领了一碗煮熟的青菜，真是罕见的奖品。

五九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批评大炼钢铁与大跃进是劳民伤财，说人民公社搞糟了。但毛泽东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把彭德怀等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为“三面红旗万岁”，他要全国人民高举他的“红旗”继续沿着饥饿的道路走下去。他不顾客观实际，一意孤行，要蛮干坚持三年的大跃进。五九年高等学校招收了二十八万大学生，已经无法维持了，在六〇年还要招收三十万大学生。而六〇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二十八万人，全部招来还不够，还得招收二万名不合格的社会青年。

六〇年我高三毕业，高考前进行体格检查，我身高一米七十分，但体重才四十五公斤，血压、视力等都正常，也没其他的任何慢性疾病，体格算是合格了。七月初我们到忠信考场进行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八月中旬我到学校去等待高考通知书，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的通知书没有我的份，第二批省级重点大学通知书又没有我的名。正当我失望之时，第三批高级以下的通知书来了，我被广州师院物理系录取了。我真没有想到自己的成绩在学校里是优秀的，却考取到三类的学校，那些成绩比我差得多的同学却考上了全国或省级的重点大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中共当局执行一条阶级路线：凡是招生或招工都要优先照顾工人与贫

农，把出身“地富”的放在末位。我家是“富农”，被三类学校录取了，还算幸运。而我们班有三个同学因为家庭“地主”，三类学校都没有录取他们，甲班也有三个这样的同学。因为每年高考前都要对每个毕业生进行“政审”，当你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时，乡村的干部就可能在你的政审材料上写上“不宜录取”几个字。这时那怕你考的成绩是第一名，也不会录取你，你就只有认命就是。这次高考，我们班和甲班那几个同学的成绩和才貌都比较好，却没有被录取；那些成绩很差，才貌又不好的却被取上了。这多么不公平不合理。

我对高考的录取感到失望和难过，还痛哭了一场。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去办理了户口等手续，准备去上这间不是我理想中的大学。父母和兄弟姊妹等却为我考上大学而高兴，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理想和愿望呢？

九月一日，我乘上和乎至广州的客班车，下午四点钟到达广州越秀南汽车站。走出站门口，便看见“广州师院新生接待站”，于是我拿着行李走上前去询问，接待站的同学为我请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说到东山培正路。不一会便到了学校门口，进去报了名，学校为我安排了食宿，我便住下来了。

广州师范学院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新办的大学，设在东山培正路，校址原是华侨办的培正中学。绿色琉璃瓦建的飞凤阁式校门，显得古雅美观。进入校门内则有一大的花环，花环正中种着一株像塔一样的侧柏，四周便是一盆盆名贵的菊花和鸡冠花，显得十分美丽可爱。花园的右侧是一座红墙绿瓦的办公大楼，是美洲华侨捐款建的，称为美洲楼。花园的左侧是一座三层楼的科学馆。再往里走，便是浓浓树阴的大校园，纵横的道路小径长着一棵棵大的浓浓的相思树和小叶榕。校园的两侧有非洲楼、澳洲楼和欧洲楼等教学楼和宿舍，还有一个大的运动场和球场。校园里砌有石阶小径和石凳，显得清静雅致，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学

校的背后是广州军区司令部，右下侧是广东省委所在地，东山湖公园就在它的旁边。

我对这间学校的环境是感到满意的，故也安心下来学习了。学期开始，首先进行专业思想教育，让我们认识“人民教师”是伟大而崇高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原来是不愿意做教师的，一心想做科学家，但通过老师的教导启发，也表示愿意当人民教师。

开学初的一个月，我们的粮食每月三十四斤，除早餐定量二两外，午餐和晚餐吃的是双蒸饭（先蒸一次，然后再放水去煮），任由你吃多少。一个月后则就宣布减少我们的粮食配给，每人每月三十一斤大米，还要捐一斤支援缺粮地区的农民。故实际上我们每人每月只吃三十市斤大米。学校食堂不再吃大锅饭，印成一斤或者两的饭票发给每个人，菜票按日期每天分午晚二餐，一次性的发给，丢失的不补。那时我们班有个姓刘的同学的一个月的饭票给人偷了，学校不补发。则动员我们班的同学每人自愿捐助一斤或半斤给他，全班三十多个同学总共才捐得二十斤饭票给他，他只有每餐吃粥。一个月后刘同学因缺营养而晕倒在路上，后送去医院抢救，经检查是缺营养而患上水肿病。

这时广州市的物资供应已是十分紧张，街道的所有商店都没有糖果饼干及其他任何食品出售，各饭店、茶楼、酒家都要凭粮票吃饭，商店的日常生活用品如肥皂、牙膏、衣物等都没货卖。买条冰棒吃都排长龙，十分紧张。那冰棒是用糖精做的，但由于人们的肚子很饿，有的人竟把它当饭吃，我们学校就有个别同学一口气吃下二十条这样的冰棒。由于食物的缺少，当局提出劳逸结合，减少体育运动，体育课只做太极拳的运动。

由于国民经济陷入极端的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六一年开始采取压缩和整顿各项建设工作，许多建设项目停顿下马，大跃进中上马办的大专院校下马停办或合并，广州师院与广东师

院合并为广东师院，分为南北院。广州师院为南院，暂仍留在东山培正路，待后再迁往农村下路，今年停止招生。

在农村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分给农民自由地，允许农民社员个人饲养家禽家畜，允许农民自产的产品自由买卖。在城市则由国营食品部门高价出售商品，其价格比原牌价高出十倍多。

自五九年以来，广东省各县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到深圳和珠海边境，企图逃往香港和澳门。到了六一年，逃难的人越来越多，深圳边境竟然有几十万的逃港者。中共当局虽然加派了军队制止，但由于人多，阻止不了逃港的人潮，开动机枪扫射也挡不住汹涌的难民。故当局就放开七日，任由其逃往香港。港英当局看见这成千上万的逃港难民，感到惊慌，立即照会中共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七天后中共当局才重新关闭边境。但各地逃亡的人潮还继续涌向深圳边境。当局便规定乘火车或汽车只能到东莞樟木头为止，樟木头一过便是边境，不许跨越。尽管如此，还有不计其数的内地人买火车票到樟木头。六一年五月的一天，政府突然下令广九火车停止出售到樟木头的票。这下子激怒了群众，人们蜂拥而至，砸烂火车站的玻璃。当时市长坐着小轿车来解释，可是众怒难平，把市长的小轿车推翻，市长也受了伤。于是当局立即宣布戒严令，说“广九火车站发生反革命事件”，逮捕了一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称为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中共中央的几个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假惺惺的作了一些检讨，只承认大跃进以来犯了些小错误；但他们却不进行认真的彻底的反省检讨，而是把三年的饥荒和经济的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推到“三年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身上去，说是苏修逼债和撤走专家造成。分明是由于他们不顾人民的意愿，推动所谓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运动，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策所造成的空前灾难，现在

却怨天尤人，企图推卸罪责。查一查便可知这三年风调雨顺，哪有大的自然灾害呢？纵使有某些局部的灾害，也不至于造成全国性的大灾荒。他们只知推卸责任，企图继续愚弄和欺骗中国人民。

初恋婚姻遭破坏

一九六二年春节放寒假，我回家过春节。由于政府放宽了对农民的限制，农民分得了自由地，可以搞家庭副业，又开放了自由市场，所以农村的农副产品就丰富起来了。原来旧的被拆得七零八落的绣缎街也活跃兴旺起来。农民自发地恢复绣缎旧市集，每逢一四七农历日，各地的农民就聚集到这个废墟来交换做买卖，卖出自己的农副产品，买回自己所要的东西，其中有蔬菜食品，也有家畜、家禽等，还有九连山内的农民的林木产品。农民不再单靠生产队的分配过日子了，因为从生产队里只能分得一些有限的粮食，还不够吃哩！有的农民还另外开荒种花生和蕃薯，把多余的产品运到市场上去卖。这时农民虽然吃蕃薯杂粮饭，但已经可以吃饱。

由此可见，只要有小小的自由，社会生产力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提高；限制人民的自由，个人积极性就受到抑制，整个社会生产力受束缚，社会就会倒退。

过年时候，我姨姑妈给我介绍认识一个姑娘，她是大湖公社卫生院的护士，叫曾幻珍，十八岁。她身材中等，胸部丰满，鹅蛋形的脸，眼睛不很大，留着一头短发。我们认识后彼此相爱了，她纯洁善良，虽然不十分美貌，但温顺可爱。她见我举止斯文又为人正直，也表示爱慕。当我们俩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热情地拥抱和接吻，感到了爱情的甜蜜，沉醉在梦幻似的幸福中。她很痴情，三天两天就来与我相会一次。当我提出要立即结婚时，她说：“我父母还不知道我与你谈恋爱，我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意哩？”我催她：“请你快点对父母说知吧！我们争取早日结婚。”

她说：“我要等到适当的时候才能对他们说，因为我父亲这个人是很不通情达理的，态度又恶劣，我真怕他。”

短短的二十天寒假过去了，我与幻珍依依不舍地分别了。分离时她安慰我说：“回到学校要安心学习，与你的婚事我会跟父母说，相信他们会同意的，你放心吧！”

回到学校，我很想念她，在一个月內接连写了四封信给她，但却没有得到她的回信，这让我感到很难过。我继续写信，追问为什么不回信。两个月之后，回信来了，她在信中说：“荣哥，这么久没有给您回信，真对不起，请您原谅！我真不知怎样对你说才是。自从您会学校之后，我把与你谈婚的事对父母说了，我说您的为人很好，我很喜欢您，要求他们同意我跟您结婚。可是却没想到，我父亲知道您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坚决反对，大声骂我，不许我与您今后来往，说若敢与您结婚就打断我的脚骨。我真害怕极了。荣哥，我原是很爱您的，但父亲如此野蛮，让我感到十分难过和痛苦，我不知怎么办才是啊！故此我不敢给您回信，怕伤了您的心，影响您的学习前途。我是个很脆弱的女子，没有勇气反抗父亲的专制。看来我是没有缘分跟您结婚在一起了，请您忘记我另选佳人吧！”

看了她的信，我没有想到如此甜蜜而纯洁的爱情却遭受到无情的阶级观念的破坏，我感到万分的痛苦和悲伤，不禁痛哭流泪，对那些提倡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恶魔们产生深深的怨恨。

经过一段时间的伤痛，我也慢慢淡忘了这段恋情，只安心学习。不久接家弟的来信，说幻珍在她父亲的逼迫下，已与别人结婚。暑假时候，为了彻底忘掉那段爱情，我没有回家乡去，只留在学校里看书学习。

一九六三年春节即将到来，我打算放寒假时回家过春节。不知道是谁对数学系某班的团支书说我是刘瑞泉同学的同乡，于是

他来找我，说刘同学因去参军，他的被褥与毡子委托我带回他家。我说我与他不是同乡是邻乡，他舅舅与我同村，我只能叫他舅舅来我家拿取。团支书说这样可以，便把那包装好的行李拿到我宿舍，托付我带回去给他家。

我回到家后，过年前见到了刘瑞泉的舅舅，把上述的事说了，叫他转告瑞泉的家人来我家拿取行李。大约年初五那天，刘的妹妹刘玉容来我家里拿取她哥哥的行李。我招呼她，并向她说了她哥去参军的情况。她也介绍自己的情况，她今年十八岁，在船塘中学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她说：“在农村已经劳动一年多，感到农村的生活确实艰苦，收入又少，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我劝慰她说：“在农村锻炼一下也好嘛，以后情况会变好的。我弟弟也是六〇年初中毕业没升学，在家劳动两年多，他现在已经娶了老婆成了家啦！”

她问我：“你弟弟都成家结婚了，你做哥哥的怎么不结婚呢？”

我说：“我现在还读书，是个消费者，没条件结婚成家；另一方面也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

她问我：“你想找怎样的对象呢？想要找城市的还是农村的？”

我说：“我不管城市与农村，只要志同道合就可以啦！”

她谈笑风声，一点都不感拘束，还要问这问那，这时我母亲来叫吃午饭，我便留她在家吃午饭，她客气地推了几句后，也就跟我们一起吃午饭了。吃过午饭，又谈了一会，便把她哥哥的行李交给她了，并把我的学校地址给她，送她上路。

我回到学校一个星期后，接到刘玉容寄来的信，没想到这是一封充满着激烈感情的情书。她写道：“荣哥，春节时与你认识之后，我竟然与爱上了你。现在很是想念你，愿你接受我的爱吧！”

随信附张相片给你，请你也寄张相片给我留念吧。”

我读了来信，为她对我的情意所感动。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并附上一张相片。我写道：“玉容，接你的信我很感动。你是个天真又大方的姑娘，我喜欢你那直爽的性格。我也是爱你的，让我们之间的爱情开花结果吧！”

不久，我家里又发生不幸的事了，家弟来信说：由于他去年秋天结婚时，父亲杀了两头大猪，请客吃酒摆宴席，现在农村开展“打击暴发户”运动，我家被认为是暴发户，父亲被捉去批斗后又被扣留，被送到连平看守所去了。

我立即写了几封信，分别寄到连平法院和检察院，又寄了一封给大湖公社，询问我父亲是违犯了哪条法律而被拘留。当时法院回复说不知道有此事，而公社当局没有回复。

过了不久，刘玉容给我写来一封断情信，信中说：“石荣，我以前不了解你家的情况，现在我舅舅告诉我，说你家是富农，你父亲搞投机倒把，现已被政府拘留坐牢去了。为此我现在决定与你断绝关系，现将你的相片寄回，也请你将我的相片寄还给我，以后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没想到事情发展如此突然，感到委屈和难过，既为父亲忧心，又为家庭的不幸而痛苦。对于那种突然到来的爱情的消失，我并不十分在乎。于是将她的相片寄回给她，断绝了关系。后来家弟来信说刘玉容在她舅舅的介绍下，已经与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曾火钦结了婚。

搞社会主义教育闹笑话

由于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炼钢铁，造成全民的水肿和饥荒，全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人心动摇，为了挽救这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要中国人民继续相信他们，并且拥护他们的倒行逆施。为此他们施展各种卑劣的手段，在人民内部制造各种矛盾，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企图分化瓦解人民。毛泽东于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六三年八月，连平县组成社教工作团，分组开赴各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湖公社也组成了一个社教工作组，由县委副书记和公社正副书记等组成领导小组，下分十多个工作队。工作队由公社一名领导当队长，分别下到各大队开展社教运动。

公社副书记曾林焕所带领的一个工作队，被分配到盘石大队。曾林焕是民主大队人，五十多岁，仅读过二三年级的小学，眼睛深深的下陷，人们背地里都叫他深眼狗。游击队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地下的共产党，四九年当了民主村的村长，五一年当土改队长在盘石进行过土改工作。那时他带领土改队在盘石打地主分田地，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工作开展得顺利。现在他又分配到这个大队进行社教工作，他满以为也会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

开始时，上级要求各工作队员要下到生产队，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林焕带领的工作队到了盘石大队，首先召集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长开会，传达开展社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并要求各生产队妥善安排工作队员下队的住宿问题。盘石村是个游击老区，外出的干部多；可是公社化的三年中，干部和

群众却遭到严重的饥荒，成了重灾区，患水肿病，饿死了许多人。因此人们对当局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现又见其来搞骗局，人人都议论唾骂他们。

当工作队员下到生产队要队长安排食宿时，一个生产队长把他带到一间养猪的屋子，对他说：“你就住在这间房里！”那工作队员看见是一间猪栏，急道：“队长，这猪栏叫我怎么住呢？”队长扳起脸孔，毫不客气地说：“你要住就这间房，不住就拉倒。”工作队员无可奈何，走回大队部向林焕书记作汇报，不仅他一个人受到这种礼遇，有一大半以上的人员都受到同样的待遇。

情况如此出乎意料，林焕立即向公社工作领导小组作了汇报：“盘石的农民群众在土改时是很欢迎我们进村的，可是经过公社化之后，他们变了，现在不但不欢迎我们来，反而还驱赶我们！”后经请求，公社领导小组同意那些下队没处住的队员集中在大队部住，但还得下生产队去同社员同吃同劳动。

在安排与社员同吃时，生产队也有意地安排他们到最穷苦的农户中去，并吩咐农户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照顾，说：“你们吃蕃薯粥，他们也一样。”不到几天，那些队员个个叫苦连天，认为工作艰苦，个个垂头丧气。林焕组长又向公社领导小组作了汇报，反映了这种艰难的局面。他提出：“盘石大队的确是块硬骨头，工作十分难搞，我没有能力在那里搞好工作，请你们调别的领导去吧？”

领导小组负责人说：“林焕书记，工作分工已经定好了，你在那里搞过土改，对那里的情况熟悉，怎么又要调换呢？既然你都感到困难，换别的同志去也是一样的！你是个副书记，又是个老干部，不要遇难而退，要想法克服困难。要听毛主席的话，担子拣重的挑，不要拣轻怕重，这才是好同志。”

林焕听后埋怨道：“你们个个都知道盘石是块硬骨头，不肯到那里去，却把它分配给我去啃这块硬骨头。这次算我倒霉吧，

我就硬着头皮搞完。下次再搞什么运动，我可不再去盘石这地方啦。”林焕于是请示领导小组批准全体工作人员集中在大队部住宿和办伙食，只下生产队去宣传社教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第一阶段是宣传发动社员群众进行忆苦思甜活动，要广大的贫下中农回忆旧社会的苦，思社会主义社会的甜。而社员群众谁都不买他的账，当工作人员上门时，社员们拒之于门外。林焕便亲自出马，下到某个生产队，找到一户他土改时扎根落户的老贫农顺祥家里，向他嘘寒问暖，打听生活状况。顺祥伯六十多岁，五九年饥荒时他家七口人，挖草根吃树皮，全家人患水肿，几乎死去。林焕来找他，他冷若冰霜，只是塞着耳朵听。林焕说：“这几年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让群众社员吃了些苦，但现在党的领导下困难已经过去，农民的生产已经有了好转，以后会更加好的。现在要你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我知道你在旧社会跟地主打过工，所以我要你忆苦思甜，到大会去讲一讲你在旧社会所经受的苦，说一说新社会给你带来的甜。你看怎么样？可以吧？”

“林焕书记，我是没文化的人，不懂得怎样说，怕到时说得不好，让人见笑。你叫别的人去说吧！”顺祥伯说。

“你就说说你在旧社会给地主做长工的生活情况以及你在生活中最痛苦的日子，说得不好不要紧的。”林焕书记说。

“既然如此，到时我就上去说几句就是了。”顺祥伯勉强了。

工作队决定在大队小学球场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动员全盘石大队的贫下中农参加，规定各生产队的社员来参加大会的记一天的工分，不来开会的则扣一天的工分。因此许多社员原本不愿参加开会的，也被迫去了。

大会开始，由大队党支书主持会议，林焕书记作“忆苦思甜”的讲话，他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社会，广大的贫下中农受压迫受剥削，过着困苦的生活；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贫下中农翻了身做了主人，过上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生活。所以

我们现在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要思新社会的甜。下面由老贫农顺祥伯来向大家作忆苦思甜的讲述，请大家欢迎！”

顺祥伯在稀少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首先向社员躬身行了个礼，便用本地土话说：“我已经六十二岁，是个耕田佬，没文化，不会讲话。因林焕书记要我上来忆苦思甜，所以就上来讲几句我的经历。我在旧社会给地主做过长工，那时跟地主打工是包食宿的，吃的是青菜杂粮饭，每天从天亮做到天黑，每月另给二担谷，一年还有两套粗布衣服和一对鞋。现在解放了，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又加入了人民公社，生活怎样呢？我一天出工得九分工，一个月就可得二百七八十个工分，每十工分三角钱，算来可得到八九元钱，可买到一百市斤的谷子。你们去比较一下，看谁给的工价高。”群众哗然，林焕听到这也打断顺祥伯的话，说：“你怎么这样去比较？要讲一些比从前好的才是嘛！”

“我是按事实讲话！好我继续讲好的。旧社会我们穷人每天都喝粥，但这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粥都没得吃，只有挖草根吃树皮，那就是五九年啦。”群众鼓掌称快，林焕书记立即打断顺祥，大声说：“算了，你别再说了，你下去！”

顺祥伯见林焕发火，脸带笑容退下，并对林焕说：“你不是叫我讲经历最苦的事吗？这就是我一生中经历最苦的事！”

“哎呀！你真糊涂，我是叫你诉旧社会的苦，你怎么诉起新社会的苦来呢？下去吧！不要你说了。”林焕接着解释说：“刚才顺祥伯说到公社化那年的苦，但那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苦难，现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克服过来了，广大社员的生活已经有了好转，今后将会一天比一天好。希望大家向前看。”他说完便宣布散会。

这次“忆苦思甜”大会闹出的笑话，广泛地流传开了。

忆苦思甜过后，社教工作转入第二阶段——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暴发户”，清算资本主义复辟。有的上中农也被

划为“新地主”或“新富农”，受到批斗和清算。我家则被定为“暴发户”，受清算后罚款五百元，没钱就把米研屋及供给生产队做仓库的一间房子作价卖给大队和生产队了。

那时家中已十分穷困，弟弟与哥哥分了家。将近过年，弟弟夫妻俩天天去深山打柴卖，才买回几斤猪肉过年。我在学校没有经济来源，向中学时的同学和亲友求助，寒假没回家乡。过了新春，老同学和一些亲友分别寄给我五元或十元钱，我才艰辛地读完这一学期，直至毕业分配。

参加“四清运动”

一九六四年六月，我在艰难困苦中读完了大学，从广东师范学院物理系本科毕业。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在毕业分配时，当局号召我们毕业生“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有很多同学留恋城市，不愿到农村去工作，更不愿到边远的山区去。而我却很傻，竟然被当局的宣传所迷惑，愿意回连平这个穷山区去工作，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家庭成分，没有想到家乡的一些坏心眼的人正在嫉妒我，要置我于死地。有些同学曾提醒我说：“家庭成分不好，最好不要回家乡。”为此我曾多次写信给家弟，征求家人的意见，但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便鬼迷心窍，听信党的宣传：“出身不由己，前途可选择；不唯成份论。”就选择了回连平山区的志愿。

七月初分配名单公布后，很多同学立即赴任报到去了。我待到七月中旬，此时中共中央突然下达一个通知：应届高等院校毕业生一律参加“四清运动”。还没有报到上任的毕业生发给通知书，带给报到单位。有的同学拿到通知书后说：“要这通知书干啥？把它撕掉嘛！”而我却老实呆板，把通知书带去交给了报到单位。

七月十四日我乘车到连平文教科报到后，领了一个月四十八元钱的工资，被安置在县招待所住宿，等待文教科对我的工作安排。三天后，县宣传部的田副部长约见我，安排我去参加四清工作团，并要在七月三十日到连平四清工作团报到，八月一日随团到惠阳参加四清工作会议，学习有关四清工作。

因为离报到之日还有十来天的时间，我便向文教科人事干部告假回老家探望父母亲。回到老家，看见双亲鬓发灰白，愁容满

脸，我不觉滴下了眼泪。父母见我突然回来，破涕为笑。我将毕业分配回连平工作的事，一五一十告诉父母及家兄他们。家兄听说我回连平工作，深感忧虑地对我说：“我们很早就告诉你不要回家乡工作，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知道保伦读了大学，回到家乡教书，不是被整死了吗？你怎么就不知汲取教训呢？”母亲接着对我说：“寅儿，你本来是不应该回乡工作的，你还不知道家乡生产队有些人的心眼多坏，他们眼红你读了大学，嫉妒我们家，运动一来就陷害我们。去年你父亲为你弟娶亲请酒杀猪，被说成是暴发户，捉去被整得死去活来，家里贫困交加。他们还说你在大学里写信控告干部为家庭辩护哩！听说大队和公社还写公函给你学校，要把你弄回家耕田呢！这些你都不知道吗？你以后就不要再理家里的事吧！你要顾全自己的前途才是！”

我说：“我是一时糊涂，竟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而我曾多次写信给弟弟，征求家人的意见，但他却没有给我回信，故就鬼迷心窍地误入歧途。现在懊悔也没有用，以后小心注意就是了。”

家弟说：“我根本就没有收到你的信，可能给大队的人扣了。再说家中穷愁度日，日夜劳碌疲劳，我真没时间和精神给你写信。”

在家里住了几天，听母亲说了许多有关家里及生产队的人和事。临走时我看见家兄与家弟分了家，家兄儿女多，生活特别贫困，感到心酸，就给了他十元钱，也给了母亲十元钱，便离开老家回连平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回到连平城，在招待所住了两天，三十日到县四清工作团报了到，于八月一日随团到惠阳集中，住惠州华侨中学。八月二日就地听地委严书记作“四清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现在农村中的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严重，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作风败坏蔓延，严重地存在着经济上的不清、作风上的不清、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不清，这就是四不清。故现在我们要进行一次四清运动。报告中还提到王光美同志下桃园大队搞四清工作

的经验，说明天要专门听王光美同志的“关于桃园四清工作报告”。

我们于第二天听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也听了刘少奇主席对四清运动的指示。我听后有深刻的认识，觉得王光美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分组进行讨论，我被安排在曾凡启的小组里，他担任小组长，是隆街公社第一书记，又是县委常委。他叫我当记录员，记录每个人的发言。讨论了两天，后来又有一个书记作了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四清运动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体现，把四清运动工作引向了邪路。

过了几天，要进行整队，首先在四清工作团中开展四查工作：查思想、查立场、查组织、查作风。每个人都作自我检查，然后由组员评议，看看在上述四个方面有否问题存在。在四查中提出“大胆怀疑揭发，大胆上纲批判”。

各小组首先由组长带头检查，我所在的小组则由曾凡启组长领头作检查，他作自我检查后，立即有人揭发他在隆街当书记的作风问题，说他在隆街公社与某大队的一名军婚妇女搞不正当的关系。他受到上纲上线的批判，大家还怀疑他老婆的出身问题。他不但在小组受到揭发批判，还被提到分团的大会上进行批判。结果免除了他的小组长之职，停职反省检查，留队察看。小组进行了改组，另派小组长，也另选记录员。

改组后，原在连平高中高一班的那个曾批判过我的白麻子周企求调来与我同组。他高中毕业时因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没考上大学，后在忠信高陂大队当了一名大队干部。这次开展四清运动，被送来参加工作队。他知道我大学毕业，并分配在文教科工作，对我心怀嫉妒。当轮到我对进行四查时，不知道是谁向他提供了有关我的材料。白麻子周企求便乘机大力攻击我，说我出身富农，写信控告干部，为父亲为家庭辩护，丧失立场。他提议开除我出队，清理回家种田。

我的检查没有过关，等待处理。在这同时，其他各小组也有

许多干部受到怀疑批判，同样没有过关。过了几天，连平工作团宣布我们一批二十多人有问题，不能参加四清工作队，并送回连平等待处理。回到连平第二天上午，县委组织部吴部长召集我们二十多个被送回的干部开会，决定暂时安排我们到新东农场劳动，等待处理。第三天我们便携带行李住进新东农场。这新东农场在县城的东门外，距倒城很近。我们在这农场每周劳动五天，集中开会学习一天，休息一天。劳动是种菜、担粪施肥或是担水淋菜。天天如此，我感到疲惫厌烦，十分苦恼。这批干部中有一个是原县委组织部长，有一二个是公社的副书记和社长，还有许多个是股长级的干部，其余侧是一般的干部，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经历也比我多。他们在空闲休息时总是谈天说地，讲吃讲喝，或是讲些社会上的怪事。我虽然在傍听他们讲，但不感兴趣，也不参与。

在农场劳动了二个多月后，十一月初的某一天，文教科通知来了，张科长向我宣读上级对我下达的处理通知书，说我由于同情富农的家庭，写信为家庭辩护，控告和打击干部。决定清理我回家劳动。我听后感到十分气愤，当场顶撞张科长说：“我什么时候控告了哪个干部？控告什么？怎么没有具体的事实呢？”

张科长说：“这些事我也不知道，又不是我们处理的，是四清工作团上报处理的。你有意见就找上级去。现在我们单位给你半个月的工资，你就办理手续回家去吧！”

我想既然如此，同他争辩无济于事，于是就领了半个月的工资，决定到省里去上诉。回到新东农场，同事的干部们都已吃了午饭，见我回来便问我：“文教科找你去，有什么事？”这时我情绪激动，流泪对他们诉说我被无理处理的事，并准备到省里去上诉。一位原县委组织部孙部长说：“小曾，你听我劝告吧！上诉是没有用的，上级组织只相信下级组织，不会相信你个人的上诉的。不如暂时留下不走，让我们大家为你想办法吧？”老王车

队长接着说：“小曾刚从大学毕业回来，他做过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家庭问题吗？就这样处理他回家劳动，实在是太浪费人才啦！我看我们大家要向组织部反映意见，让他留下来。看以后怎样安置。”原公社副书记曾某也说：“亚东，我还是劝你不要去上诉，听大家的话，留在农场劳动，待我们向组织部反映一下，说让你回家对你和对国家都不利，看能否作适当的处理。我们这里也有党支部，陈同志就是我们这里的党支书，让他去向组织部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好吗？”陈支书接口说：“是呀！你就留下来，不要走吧！”

可是我当时血气方刚，正在气头之上，感到满腹委屈，同事的干部们虽然为我好，我却没有冷静的考虑他们的建议，决意要到省里去上诉。并且立即收拾行李，准备明天就乘车到广州去。

到了广州，找到一间简便的旅店住下，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便走到省高教局，一个姓林的女科长接见了。我诉说了我被无理处分的过程。可是这科长说：“对你的处理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有意见你回去说。”我见她不讲理，下午便去原毕业学校找龙院长，因学院已合并华南师院，只留下财务组一些人处理学校的遗留事物，龙院长已调市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到儿童医院搞四清工作去了。我乘车到儿童医院，门卫说他正在作“四清工作报告”，我递上一份申诉书给院长，门卫回来说龙院长正忙，他叫你去找张院长。于是我又跑回学院去找张院长，他不在家，我只有泄气地回到旅店。第三天我去高教局找局长，局长不在，仍然是那个女科长来见我，她还是叫我回去。我感到无奈极了，就说我用完了钱，没车旅费回去。她立即打电话给学院财务科，叫我去领取十六元补助，买了车票返回连平。

回到连平，我没有回农场，在连平旅店住宿。第二天去到县组织部，找到办公室朱主任，向他讲述我被无理处分之事。他可能听了农场劳动的干部反映过，故叫我回农场去劳动，待后再作

处理。可是我却很执着，不愿再回农场去。于是他便叫张科长再给我半个月的工资，由我回家去。我当时钻牛角尖，执迷不悟，不考虑回家的后果，没有想到父母看见我回家会有多伤心，更没想到回家后生活的艰难。凭一时的意气用事，便收拾行李回老家去了。

背井离乡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下旬，我在气愤又悲伤的心情中回到了父母家里。年迈的双亲看见我回来，含着眼泪问我：“寅儿，怎么带着这么多的行李回家呢？是不是被清洗回家啦？”我二话没说，丢下行李，扑到母亲的怀里，痛哭着说：“娘亲呀！是我没有用，辜负了你们的期望。我不应该回家乡这个鬼地方来的，现在才知道大错特错了，真是懊悔啊！”哥哥在旁插口说：“我老早就曾多次对你说了，叫你以后不要回家乡来工作，你却把我的话当耳边风。现在知道了，可已经迟啦！”母亲抚摸着我的头，止住眼泪，安慰我说：“寅儿事情都既然这样了，悲痛和懊悔也没有用，你就安心在家里吧！生活上有困难，你就暂时跟你弟弟一起过，以后再作打算吧！”

父母及兄弟对我被整回家，感到很伤心和失望，他们原来对我是充满着希望的，盼我能出人头地为家庭争光；但是现在却被清洗回家耕田种地，跟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一样生活，甚至比他们更低贱。父母及兄长十多年来对我培养的心血算是白费了，他们的希望破碎，怎么能不伤心悲痛呢？此时我后悔莫及。

哥哥和弟弟分了家，母亲跟弟弟一家，她每天为弟弟做饭操持家务和料理小孩。父亲则跟哥哥一家，他给哥带小孩，还会去拾些蕃薯来喂鸡狗。哥哥已有四个孩子，生活十分艰苦。四岁以上的孩子也跟着大人一样吃薯片饭，经常连青菜都没有。几个孩子由于缺乏营养而发育不健康，他们穿的是褴褛的衣服，我母亲一有空就为孙儿们补衣服。我身上仅有三十多元钱，看见哥哥家境如此贫苦，就拿出十元钱给哥哥，另给了母亲五元钱，叫她买顶羊毛帽子御寒。

在家我半个多月没有上街，也没有去参加生产劳动，只在晚上去串串门，跟一些较善良的农户谈谈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及生产队的状况。农户们的生活绝大多数都很贫困，全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我在家闲着，有时也帮父母亲做些家务，母亲也经常跟我讲些家中前一二年的不幸之事。母亲对我说：我家之所以会被定为“暴发户”，完全是生产队长曾冬发去向大队汇报造成的。

冬发的花名叫亚驼发，因为他的背有些驼。他为人奸狡，六二年当上了队长，又成为共产党员。他原也是在下寨居住的，五七年冬才与上下寨其他七八户人家在我哥的大力帮助之下，在我家住处的右上侧附近建起土瓦屋，搬来居住。他们迁来之前，我家是与上耕塘共一个生产队的，归属于金溪大队管。自从他们几户人迁来后，从六二年开始便成为下耕塘生产队，归属于“民主”大队管。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实行三自一包的政策后，我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冬发很是忌妒眼红。六三年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全开展打击“暴发户”和社教运动，冬发便乘机来害我家，企图把我整死。他生有一个儿子，名叫治恩，在连中读高中一年级，由于违犯校规，与一女生谈恋爱，被学校开除回家没书读，又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社员对他有意见，故不给他口粮。社教运动开始时，冬发便到大队诉苦，说他的儿子只让读到高中一年级就得停学，太不公平。他说我写过信给他儿子，指责他家伤害我们家。他命儿子治恩到大队去，要求党支书曾火钦写公函到我读书的学院，把我开除学籍遣返回家。火钦因与玉容结了婚，玉容曾与我谈过恋爱，故他也有心顺势想把我整回家，以巩固他与玉容的婚姻。他们狼狈为奸，写了报告，盖上大队党支部的印，又到公社盖上大印，于六四年元月邮寄到广东师院。幸而当时学校设有理会他们。现在我被整回家，母亲及兄长听别人说知道这件事，他们告诉我后，我才明白这些背后的小动作。

母亲还跟我讲了三个月前本生产队发生的一件丑闻：生产队

长亚驼发的大女儿与生产队会计曾火灵在牛棚里通奸，被剃头佬汪丑及大眼佬清林捉住，汪丑要将这对男女捆绑送大队处理，而清林却想索取他们的钱财，要他们奉上四百元钱，若答应便不送大队。火灵当时被逼，同意待卖了大猪后给他们四百元钱。可是过了几天，当冬发和治恩得知此事后，他们父子却要火灵否认，还要叫他反口说是汪丑与清林企图勒索他的钱而陷害他，叫他将四百元钱赔给自己的女儿。这样矛盾就闹大了，汪丑与清林岂肯罢休。汪丑不是等闲之辈，是个剃头佬，乃三教九流的人物。他在大队交结了一些人物，一些干部很听信他。他在公社派出所还结交了所长，经常在夜晚一起打猎。清林在生产队里也不是弱者，这次因为爱钱却反被咬了一口，岂肯心甘？当时大队对此事感到为难，不敢处理。汪丑与清林两大家便合在一起与冬发、火灵斗，在生产队里分成了两派。汪丑三兄弟与清林两叔侄为一派，冬发与火灵纠集几户亲房为一派，经常吵闹甚至打架。

我家当时处于中间状态。我知道这种情况后，劝告弟弟说：“我们生产队已经分成两派，我们家应站中间的立场，不要偏靠任何一方。”虽然弟弟当时听从我的话，但是由于他与火灵有不正当的财务关系，往往袒护火灵。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年终结账，清林之子超连与火灵争吵起来，并且打起架来，超连踢了火灵一脚。我弟在场看不过，帮了火灵说话，大声叫喊说：“超连打人，把他绑起来！”超连听了，恼火起来，便与我弟打起来。后有人叫我，我赶到后把他们拉开。事情过后，我严肃批评了弟弟，说他不应该这样引火烧身，造成他们那一方都对我们家不利的局面。

从此之后，汪丑、清林他们一方不但对我弟弟有意见，也对我有意见。生产队上工也分成两方，记工分则由对方记。六五年元旦后，母亲和弟弟劝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我也觉得若不参加劳动，坐吃闲饭时弟媳会有意见，自己也感到不好。于是就跟着兄弟他们一起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是由于汪丑、清林的一方对

我们兄弟有意见，认为我们站在冬发、火灵那一方，故就有意将我的劳动工分定低为六分工。冬发虽然是队长，却奈何不得汪丑他们，我更是无奈，只得任由他们了。冬发之子治恩看见我去参加劳动，他也跟着去参加劳动，也同样被定为六分工。在年终分粮时，汪丑他们原想不给我和治恩口粮的，后在大队的干预下，才给了我们每人半年的口粮一百六十斤稻谷。

农历春节过后，我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是三朝打鱼两天晒网的。因为辛苦做一天工才得六分工，计起报酬来只有一角八分钱人民币，维持不了最低的生活。所以我不愿意从事这样的劳动。

六五年新春后我见到了老同学曾南甫。他也因家庭出身地主而被清洗回家种田一年了。他原考入贵州水电学院，六二年由于院校合并，水电学院合到煤炭学院，他不愿意读煤炭专业，故回到家乡。当时大队安排他教小学，不料六三年执行毛泽东的阶级路线，把他清洗回家在生产队劳动。我与他相见谈了彼此之间的情况，从此之后便经常到他所在的湖东大队春浴堂屋去坐聊。他生产队里有一个叫曾宏祥的右派分子，原是县民政科的一名干部，也经常到来一起聊天，谈论有关自身的处境。大家都感到身陷困境难以为生，渴望寻找一条出路。但是当时控制得比铁桶还要严密，我们一时束手无策，寸步难行。

六月中旬，宏祥约我到广州去向省申诉，我同意了。他在家搞染布的副业，有些微收入，可我却连车旅费都无着，他答应借钱给我。于是我们便一起乘车到广州，并到他的老同学家里住宿。第二天他到省民政厅去投诉，我则到省高教局去申诉。省高教局的那位女科长来接见我，她还是跟去年一样，叫我回家好好劳动，申诉还是白费唇舌。后来我又到省高级法院和省高级检察院，控诉当局对我的无理处分。但是他们却不受理，说这是行政部门的事。我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家做到饭也吃不上，于是便破罐破摔，走到华北大饭店，叫了两三盘大鱼大肉和一瓶好酒，大

吃大喝起来，吃喝得酩酊大醉。店小二来计费是二十六元钱，向我拿钱时，我说：“请跟我去省高教局去拿。”小二见我吃霸王饭不给钱，就不客气地带我到越秀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小二把我吃了他饭店的二十六钱的饭菜耍赖不给钱之事说了一遍。公安人员作了记录，并叫我签名印指模，付了钱给店小二打发他走了。之后派出所人员就把我送进越秀分局看守所的一间拘留房，那里面拘留了四五个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在那里一天吃两餐饭，每餐四两米饭，虽然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好过在家吃杂粮饭，又没愁没忧的，还可以与同犯谈天说地。我安心地在那监房里待了四天，没想到很快就把我送到石井广州收容所。

石井收容所是省民厅办的一所大型收容所，主要任务是收容遣送流浪汉及逃港逃澳的人员。这收容所较大，有两间大厅，可容纳一千多人，睡的是木地板。我去到那里已有二三百人，每天都有许多人被遣送走，也有许多人被送进来，其中较多的是从深圳、樟木头及珠海送来的逃港逃澳犯，送走一批又送来一批，好不热闹。

我在这收容所所住着，每天与同犯交谈，了解到他们为何逃港，怎样逃，又怎样被抓回的经过。我兴趣很大，因为我也想逃出去牢笼，找一条生活的出路。在那收容所里虽然吃不饱，但我却感到快活，很想长时间的住下去。但是过了四五天，收容所人员却叫我去问话，我如实地把我来高教局申诉的过程述说一遍。他们给省高教局打了电话，第二天便给我公共汽车票，叫我到高教局拿取回乡的车票及回乡的路途伙食费。我去拿了回乡的车票及几元路途伙食费，在街上买了些面包，回到收容所，将面包分给了同伴们吃。次日当局便放我自行回乡，我也不好再留在广州，只好回家了。

那时已是农历七月，我再也没有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我跟父母及兄弟说：“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才得六分工，吃饭都不够，不

如在家多养些鸡鸭，搞点副业收入还比去生产队劳动好。”父母及兄弟都同意和支持。从此我每天就挑着两大笼的大鸡小鸡到野外的小山丘去放养，或挑到已收割了的稻田里去放养。生产队看见我不参加劳动，不给我口粮，我也没意见，任由它。到了十月，生产队有人向大队反映说我专门在家搞副业，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是走资本主义。于是大队派一个民政干部来警告我说：“你在家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专门养鸡搞副业，是走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不然的话，后果你自负！”我被说后也不再挑鸡去放养了，但也没有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就在家看些书，或到其他相熟的朋友、同学家去坐聊。冬至过后的一天，我弟初中时的同学严优仁和严振磷来我家与弟弟聊天。他们也是出身“地主”家庭，听说优仁的父亲在九连山游击战争时是严尚民司令员的副官，四九年广东“解放”时当上惠州市银行的行长，五二年“三反”时被清除出队，返乡后被定为地主。优仁的二叔现在香港从事远洋运输业。振磷的父亲则在土改时被逼害自杀身亡，他母亲带着他们五兄妹，他大哥现在佛山棉织厂做技术员。听说优仁的妹与振磷谈婚，振磷的妹又与优仁谈婚，他们的父母承诺彼此交换婚配。后来优仁与振磷的妹登记结了婚，而振磷再去登记结婚时竟被大队阻拦，说不许相互交换婚姻。这样振磷就没有与优仁之妹结成婚。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三角塘严振磷和严优仁家闲聊，并在他们家住宿。我与优仁的父亲见面相识，彼此间谈论起往事，都有同感。他说：“万万没有想到现在不但我们老一辈的人受苦没自由，我们的后代子孙甚至要结婚成家都困难呀！我三弟现已三十七八岁，至今还没人肯嫁，他哪一点比不上别人呢？不就是因为家庭被评为地主吗？所以我叫我的女儿一定要嫁给我们这一类人的家庭，他们贫下中农的女不愿嫁给我们这类人，所以我们这类家庭的子女应相互交换来婚配。不然的话，我们这类人就会

绝种。”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表示赞同。接着他问我：“是否找到结婚对象？”我说：“回到老家后都已成了地富这类人了，还有谁肯嫁呢？”他说：“我的女儿原打算与振磷结婚的，但受到大队的阻拦，没有结成婚。你若不嫌弃的话，我可叫她跟你结婚。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现在农村不愿意去参加劳动，吃饭还要靠弟弟，不安心在家，哪还有心情来谈婚姻成家之事呢？以后再说吧！”他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和理解。接着我问了他二弟在香港的情况和住址，说以后有机会逃港的话就去找他。他称赞我说：“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好青年，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幸生长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白白的埋没了你的天才，真是可惜可恨呀！”

一九六六年元旦前后，我多次到南甫家去聊，他对我说在家没前途出路，想到新疆往苏联或者到外地去做工。我告诉他在广州收容所看见许多青年逃港的情况，并说优仁的二叔在香港做远洋运输业，若能逃到香港去时可找他。农历过年时候，大年初四那天，我约南甫到塘背优仁家，优仁的堂兄（地主成份）由礼及振磷也来聊天，还有我们原村曾治平的二儿子曾灵振也前来坐聊。由礼的家庭出身地主，父母在土改时被斗争双亡，只剩下他兄弟两人各自为生。灵振则于父母双亡后投靠舅父为生，住在塘背。谈论到大家现在所处的境遇，都觉得受到严重的歧视，像奴隶一样生活在最低层，根本就没有任何前途出路可言。南甫在谈论中提出：“想到外地去做工，”他约我们一起去。由礼听南甫这么一说，立即响应，表现激动，恨不得立即跑出去。但我担心：这么一大帮人外逃做工，会影响很大，地方当局一定会怀疑。所以我在回去的途中劝告南甫说：“你不应该约由礼、振磷他们一起外逃做工，这么一大帮出身不好的人偷偷跑出去，没经过大队的同意，当局一定会怀疑我们搞什么勾当”。我认为要走的话，我与你两个人去比较没影响。”但他听不进去。

农历正月十一日是绣缎街日，我见到了另一位金溪大队的曾

日健同学，他从江西大吉山回来。他六二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湖三小学当代课老师，六三年也因家庭出身富农而被清洗回家种田。他不愿种田，于六四年私自跑到江西大吉山他哥哥处去做工。他当时见到我，欺骗我说他在大吉山矿区找到工作，叫我搞几张假证明，于正月十六日到大吉山找他，他帮我找份工做，并给我写了住址。我把这事告诉弟弟，并与他商量准备外出做工，叫他为我刻个公社的印章。过了两天，弟弟把印章刻好后，印了几张空白条给我。我又走去找南甫，约他一起去大吉山找日健。而南甫却临阵退缩，表现犹豫，叫我先去，找到工后再写信告诉他。他给了我五元钱路费和几斤粮票，因为他有个哥哥在忠信中学教书，经济上会支持他。

正在这时，我们大队的一名民政干部走来我家，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大队通知你到瓮潭水库劳动，若不去，后果自负！”我没有理睬他，更加感到非走不可。我跟弟弟拿了八元钱，第二天便毅然乘车离开故乡。我在绣缎街搭车到和平城，转车到龙南，在龙南住了一夜。次日早上起来到车站买票到大吉山，却发现剩下的五元钱不见了。怎么办？只有提着行李到车站去候车。当班车准备开行时，我跟乘务员求情说：“我的钱包给人偷了，没钱买车票，请让我先搭车，到达车站后我再叫朋友补买车票好吗？”乘务员是个中年女工，她见我长得斯文，便答应说：“你到达车站后把行李放在车站里，然后叫亲人拿钱把行李拿回去，好吗？”我高兴地说：“好！谢谢你啦！”就这样，我才到达大吉山矿区。

外逃做工遭追捕

我到达大吉山矿区后找到了日健，把路上来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跟我一起走到车站，拿出五元钱，补买了车票，拿回了我的行李。原来他叫我去找他的住址不是自己的住处，是我初中时忠信中学同级乙班的同学的住房。当时那位住房的主人回来时，一见到我便热情地说：“你这个人我感到很面熟，像是在哪里见过，一时间想不起来了。”他叫韦木信，五七年同在初三毕业，没考上高中，五八年走到大吉山矿区当了一名电工。我当时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也不敢认他是我当年的初中同时毕业的同学，怕说出来后他会不欢迎我。故骗他说：“我是在忠信中学读过书，你在初三我在初一，故此见过。我叫黄真荣，想来这里找工做。”他没有再多问，日健便把我安排在他的住处居住，食宿都由他打理。说了一会，日健离开去了。晚上木信告诉我说：“日健是在深山处烧木炭，有时运木炭出来矿里卖，有时也会到他二哥处住一天半天，他二哥在矿里的食堂里当厨工。他还在南迳村认识一个村姑，准备入门做女婿。”他说：“现找工作很困难，什么工作都由国家和政府统一安排，不像西方国家可以自由找工就业。我看你是个读书人，长得这么期文，做苦力工是不成的，跟日健去烧木炭，你干不来的。”经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日健原来欺骗我，感到有些气愤，但走到这一步，唯有忍着，看他如何处置便是了。

第二天，日健走来对我说：“我为你找工跑了许多路，很难找。那些都是苦力工，不适合你做。我看你还是回去吧！”我说：“我怎么回去呢？又没路车费。”他说他给我八元钱做车费，我说：“这八元钱乘车都不够，还要吃要住的，怎么回去？”他说：“我实在是没钱，也没好工做，只是跟佬表进山烧木炭来维持生活而

已，经济上是有困难的。就这样吧，从这里走小山路到连平陂头是很近的，只有三四十里路，很多人都是走这条路回连平的，经过贵东。我也是从条路回去的，这样可以省很多的车旅费。明天我就带你去。”我感到无奈，就答应走路回连平。

第二天清早，日健就来了，在木信处吃过早饭，他拿给我八元钱，叫我拿三张假印的空白条给他。他带我走到通往陂头的小路处，指着小路对我说：“这就是通往陂头的小山路，没有叉路，沿着山边走，中间经过贵东，走三四个钟头便可到达陂头。”我沿着这条小山路走去，其间也遇上三五个往来的行人，还看见一二条大斑蛇在山涧中趴行，一个人感到有些害怕。中午走到贵东小墟，买了七角钱的便饭吃了。下午三点多钟走到陂头街，没车到连平，便在陂头街的旅店住夜。我所开的住房是两人房，六点时，另有一名姓黄的旅客来住，我看他像个干部，大约四十来岁，便问他：“同志，你贵姓？来这做什么生意呢？”他说：“我姓黄，是牛岭水林场的场长，来这里开会的。”我说：“我也是姓黄，名叫真荣，是连平大湖人，高中毕业，到大吉山找工做没找到，现路过这里回去。请问你们林场招人做工吗？”他说：“我们林场现在在植树造林，还需要请些外工。”我说：“我到你林场去做工好吗？”他立即答应说：“你若愿意的话，就去吧！我现在写张便条给你，你拿着我的字条便可立即去做工。我这几天要开会，你拿着我的字条到去交给管理人员，他们就会接收安排你。”说着，从手提袋里拿出笔，给我写了一张印有林场红头的便条。我收取了他写的字条，打算不立即去林场，因为我一个人没带被帐，还要回乡找个同伴，带上被帐才去。

次日我乘车回到连平县城，已没了车旅费。怎么办？我当时想到陷入如此境地，很感悲伤。我在悲伤中走到连平法院，想找院长控诉我受的歧视和迫害。当时院长不在，出来一个人事秘书接见我，我伤心流涕的将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回连平工作后所受到

的无理处理及回到老家后所蒙受的屈辱，致使现在在家无法生活的过程，向法院诉说了一遍。秘书作了记录，他听后同情我的遭遇，但他说：“这是行政部门管的事，法院无法为你做主，但我们会把你的情况向他们反映，请你暂时回去。”我说：“我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回去？”他听我这么一说，立即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叫我到县民政科拿路费回去。我拿了字条走到县民政科，拿到一元六角钱的路费和七角钱的伙食费，下午乘车到忠信，然后走路到三角塘背优仁家。

我见到振磷和优仁，并在他家住宿，我把去大吉山找日健的经过及现打算去陂头牛岭水林场做工之事对他们说了一遍。他们告诉我说：“自从你走后，南甫第二天便走来找由礼，把你走的事告诉他，由礼过了两天便带了被帐行李独自到江西去了。”次日优仁叫我弟石志走来劝我回家去，弟弟对我说：“二哥，我还是劝你回家去好，外出做工是很艰苦的，你一向读书，体力劳动不习惯，是受不了做工的苦的。回家吧！我已与妻子球英说好了，我叫她要体谅你，不要因为你回家增加了我们的负担而有意见，她答应了。”他虽然如此劝说我，但我还是执意要外出做工为生。弟弟见劝我不听，便走了。下午我走路去船塘邀老围屋的一位右派分子欧阳来一同去林场做工。他同意去，又叫上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一同去。第二天他们带了被帐与我一同道忠信搭车去牛岭水林场。到了林场，我递上黄场长写的字条，管理人员把我们三人安排到水洋洞工地做工。那个工地搭有一座毛草棚，给外地民工住宿，另有一座泥砖瓦房则是给管理人员及本公社女工住宿。我们三人住进了毛棚，毛棚里已经住着五六个龙川和五华的民工。这时是三月时候，经常下雨，我们每天做打树穴，树穴的规格是 $0.4 \times 0.4 \times 0.4\text{M}^3$ ，每打一个树穴是八分钱。我们每天只能挖十多二十个。到四月中旬，经点数结算，我们三人扣除去伙食费后，只得到八元钱人民币。欧阳来见做这种工辛苦，又挣不到钱，要

回家去。我见他不愿做，没有勉强他们，便把做得的八元钱全部给了他们做路费，自己一点也没留下。

他们走后，我跟龙川的民工共铺睡。做了不到十天，四月末，政府当局要清查户口，凡三月后来的民工一律清退。正在这时，我接到严振磷写来的一封信，说由礼在全南官山矿区做工。林场给了我五元钱的路费，于是我在五月一日又从陂头走路到大吉山。在大吉山旅店住宿了一夜，没了路费，又走去找日健，没找着，就把我的一件毛衣五元钱卖给了一个商贩。我走路到南径村，乘车到全南，然后转车到了竹山，再翻山越岭走到官山矿区，几经周折才找到由礼。

原来由礼跟了和平县林寨公社的民工陈峰和陈柱等人在官山为矿区搭盖木棚房子。他们住在一间小的毛棚里，我找到他们时，由礼很不高兴，是因为我走时没邀他，故怀恨在心。幸得陈峰和陈柱他们对我还好，安排我与他们一起住宿。这时他们所做的工程已经结束，等待寻找下一个工程。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正是雨水多的夏季，连续多日下雨，找工真不容易。后来陈峰他们在龙南小江接到一项建桥工程，我跟着他们一道挑着行李，爬山越岭来到龙南小江建桥工地。我们在农民的屋里住下，等待开工，陈峰和陈柱要我与他们一道到某小墟去看另一项工程。工程没接上，下午回来却不见了由礼。听说他跟一个连平来的人走了，还把我和陈峰的行李都拿走了。工地上大部分工人都走了，只留下几个工人，他们都说是因为那个人起来对由礼说：“你们的证明是假的，公安局已经知道，马上就会来抓人，你赶快跟我离开这里！”所以他就跟着那个人走了。他走时留下一张字条，说是去九连山。于是我们立即乘车往九连山公社追赶。在半路上追上了他们，见他们俩正在那里吵架。我走上去一看，那个人原来是我家乡大湖盘石大队的一名流浪汉，二十四五岁，名叫曾满秀。在家乡时我曾见过他，他与我生产队冬发之子治恩相熟，我离开家乡

时，他从治恩那里听说我外逃做工去了。他经常流浪到九连山及龙南一带或是做工，或是行骗。这次正遇着他流浪到龙南小江，他得知承包大桥工程的是连平人，本想打探一下并参加做工，却没想到他正好问着由礼，并从由礼的口里知道我逃到这里做工。满秀对我说：“荣哥，我在家听说你外逃走了，想不到你会跟他们一起用假证明领工做。那是很危险的，公安局已经在追查你们，你还是跟我离开那里吧！我是为你们好才带由礼先走的。”我对他和由礼说：“有什么事你们要等我和陈峰回来说，怎么不等我们回来就把我们的行李带走呢？”由礼争辩说：“我是上了他的当，一时间没考虑清楚就跟他走的，但我不是有心想要你们的东西，我是怕我走后你们的东西被别人拿走，故就把你们的行李带走，还留下字条子给你们。”

我和陈峰拿回了行李，正准备回工地时，满秀却拉着我的手，甜言蜜语的对我说：“荣哥，我真的很为你担心，怕你跟着他们假造证明，到时会被公安局捉去坐牢。故我劝你还是跟我到九连公社去找户人家入门落户去好。现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女儿，想招个女婿，我给你做介绍，带你去看看，好吗？”我见这样说，便答应跟他去看看。于是我对陈峰说：“小陈，你们先回去，我跟他去看看，明天再回工地去。”

陈峰他们回工地去了，我则跟着满秀绕山弯水来到九连山中的一个山村。傍晚时分我们走进一家烧砖瓦的人家，见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满秀对他说：“林大叔，我介绍一位好朋友给你做女婿，你一定会满意的。”林大叔看见我，高兴的对满秀说：“这位青年是哪里人？”满秀说：“他是我家乡的人，刚读完书，没工作做，家境不太好，到外地找工做。”林叔说：“我家住在山村里，做砖做瓦的，他这么好的青年人怎么肯来我家入门呢？”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们泡茶，又叫他的老伴给我们烧水洗澡。吃晚饭时候，林大叔及他的女儿出来一起吃饭，我看他女儿才十六七岁，

长相算一般，还穿着一身灰色的大襟衣服，是一个十足村姑。我看了，一点都不中意。我对林大叔说：“我是出来找工做的，这次跟着满秀顺便到来借宿一夜，满秀说介绍我来入门是开玩笑的。其实你女儿年纪也还小，不宜现在谈婚事。”吃完晚饭，坐聊闲话了一会，我走累了，便去睡觉。睡觉时满秀劝解我说：“荣哥，你现在的处境如此，我劝你留下来入门吧！这户人家虽然在山村里，但吃的还是有的。这姑娘年纪虽然小些，但还是长得不错。我跟他家做砖瓦已做了一二年，我还想入她家的门哩！可她却不喜欢我，可能看见我生得粗蛮些。”我没有听满秀的劝告，决定明天清晨离开这里。

次日清晨我便起床，梳洗之后便与林叔告别，走路回小江工地。回到工地，工地里住的工人几乎走光了，只剩下几个人。负责建桥工程的人员听说后也与陈峰解除了合同，另行请人承建。当时陈峰与陈柱对由礼和我很不满意，叫我与由礼另行寻工做。这时我身无分文，由礼身上还有些钱。要找工，到何处去找呢？后来我凑了一个兴宁县的青年小伙子叫孙某的，跟着我与由礼一起去南康某林场。在路上，最先一二天的伙食费是严由礼给我；到南康城后由礼竟然一个人独自吃饭，不肯给我伙食钱。我只有要求兴宁的小伙子小孙给我伙食钱，因为他找工没证明，要靠我的证明才能找工做。过了南康县城后，我们又走小路折回信半去油山林场，路径信丰大河油桐林场。六月天气炎热，我们口渴了，问林场人员讨水喝，并顺便问林场是否请临时工？林场人员说：“我们这林场现在需要请人种植油桐树呢！”于是我们走进林场办公室，我把写好的公社假证明递上，办事员看了就留下我们来做工了。我们住进了一间木板楼房，其中原有广东五华县来的民工两人，他们姓朱，是叔侄俩人。我与他们一道做工也合得来。

这油桐林场是油山林场的分场，经营种植油桐树，这林场有十多个固定工人。我们每天跟着去挖打树穴，规格是 $0.6 \times 0.6 \times$

0.6M3。六月天气炎热，每打一个洞穴，我都累得满头大汗。每个穴一角五分钱，我每天只能打得十四五五个，由礼他则能打得二十个上下。做了一个月，结算工钱，扣了伙食费后，我还剩有十多元钱。找工时我在路上吃了由礼和小孙的伙食费，则算我给了他们做工的证明，就抵消了，各不相欠。到了七月，农村进入收割大忙季节，大河地方人少田地多，许多生产队缺乏劳动力，要请人帮助夏收夏种。姓朱俩叔侄在此做工多年，与农村一些生产队的佬表相熟悉，一个生产队要请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帮助割禾，生产队包我们吃三餐，每天给我们每人三元钱。我们去了，第一天我做打禾工作，但这里的佬表打禾用的是四方打谷斗，第一方两人轮流打，一个人在打禾，另一个人就去取禾苗。佬表和我的几个同伴都打得快，我却打得慢，并且感到很吃力，赶不上他们。下午，队长看见我赶不上，便换我去割禾；可他们割禾也是有分工的，每人割十行，我也赶不上那些女社员。第二天队长又换我去赶牛犁田，我又不熟练，干了一天便不再干了，回林场铲火烧土积肥。过了七月，林场看见我们去为佬表做工，就辞退了我們。

我们被林场辞退后，由礼去虎山找陈峰去了，我和姓孙的则跟着姓朱的俩叔侄到油山林场他哥那里去做工，朱友贤的哥哥在油山林场当会计。我们到油山的一个工区做铲草搞防火线的工作，一天也只能做得一元多钱，勉强可度日，刚做了十来天，没想到严振磷带着余铭发和他的弟弟走来找我，我问他：“你们怎么不在家？却来这里呢？”他们说：“自从你和由礼走后，大队干部追问我们，逼我们说出你们到何处干什么？我和优仁被逼得无奈，就告诉他们，说由礼在官山做工。于是我们大队与你大队各派了一名民兵营长去了官山寻找你们，幸得你们离开了那里。他们没找着，回来后不但车旅费要我和你弟出，我们大队还要捉我去斗争，非逼迫出你们的下落不可。故此我们害怕，便逃出来找你了。你在大河林场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同学曾平水，知道你在那里。我

们走到大河林场时，你却走了。后问了林场的人，才知你来了这里，故此才来这里找到你。”接着我问了我弟的情况，振磷告诉我说：“你弟本也想跟我们一起逃的，但他有老婆孩子，优仁也是这样，故他们就没有走了。”听他们说后，我又把我离开家乡一路的经过告诉他们，并把由礼如何对我无情无义的行为表现对他们说了。

振磷他们来后，我叫他们暂时在这里做工。做了几天，有一个兴宁县姓肖的人起来凑我们到安远金鸡林场去承包做枕木的工程。我与他去了，并把工程接了下来。正在这里，油山林场场部发现我的证明是假的，通知我到去把证明取回。我并不害怕，来到场部，一个管理人事的干部对我说：“我们发现你的证明是假的，不过只是为了做工，没做什么坏事，故叫你把证明拿回去，你就离开我们的林场吧！”我取回了假证明，次日便与姓肖的一起，带领兴宁的四个小伙子和振磷他们，到安远金鸡林场去伐松木做枕木去了。

我们到了金鸡林场，办理了手续，就来到一个叫雷峰头的山村工地。那小山村没有马路，只有山坑小路。村里有一二百户人家，只有一间小代销店。我们住进一间大毛草棚，毛棚里砌有锅炉供我们烧水做饭。我和高个子老肖为领班，我负责做财务和做饭。开始时，我们预支了一些钱，但到金鸡街去买米买菜很远，故我就在村里跟农民佬表买米买菜。那村里的农民佬表对我十分信任，肯将一百几十斤的大米赊给我。我们做枕木是按每条计钱的，他们八个人每两人为一作业组，按劳取酬；我则从中抽百分之十作报酬。最初几天，工作开展很顺利，但做了十来天，振磷他们三人感到拉锯做枕木很辛苦，提出不做，要到虎山去找由礼和陈峰他们。我没有阻拦，让他们去了。他们去后，工地里又来了一伙紫金姓刘的人，也来做枕木，他们有五六个人。而跟我一伙的老肖见振磷他们走了，只剩六个人，就有意与紫金姓刘的合

伙，叫我去做枕木，让姓刘的紫金人负责财务和做饭。我一个人，只好听从他的意见。但我做了半天，感到很吃力，提出离开不做。他们同意我结账离开，我便把账目结算好，还清赊欠农民佬表的米菜钱，自己得到十多元钱。次日离开林场去虎山找振仁他们。

来到虎山，找到陈峰及振磷他们。他们在虎山一个竹木场承建一个小水轮泵站，那工程将近结束，我插不进去，只待在毛棚里吃闲饭。在那呆了十来天，原在金鸡林场一起做枕木的兴宁老刘却走来找我，我问他怎么来这里。他说：“你走后不几天，那个紫金姓刘的去林场结算，支取了一大笔钱，竟然想企图逃走，被我们兴宁人发现了，并报告公社，说他用假证明，并企图携款逃跑。公社听了便把我们一齐捉去，并用专车送我们回广东。在送的途中那老刘又企图逃跑，被打得死去活来。我就乘机逃跑出来，到这里找你来了。”

我招呼这老刘在毛棚里住下，他见我没工做，又凑我去龙川风树坝做水库。次日我便跟他走路去找工，走到安远的土田大队，看见村里的群众和干部正在那儿兴建水轮泵站。我们停下来问社员：“你们建筑小拦河坝是否请泥水师傅？”一个大队干部问我们是否会砌石？我说：“会！”他又问我：“你说会砌石，那我来考你一下：什么是梅花石？”我见问，灵机一动，回答说：“所谓梅花石就是把石砌成像梅花一样，中间一个，周围五六个。”那干部见我答得上，看老刘又像个师傅的样子，便留下我们在大队部住下，请我们帮手建筑拦河坝。大队每天供给我们三餐饭吃，住吃都在大队部，工钱则商定按砌石方计算。

其实我们不太会砌石，幸得其大队原有一个会砌石的泥水师傅做主导，我们跟着也就混过去了。那时已是寒冬，天气日趋寒冷，我衣服单薄，不怕寒冷。做了一个多月，工程基本完成，也接近农历过年。经结算，除伙食费外，我们每人得到十五六元钱的工钱。老刘得了钱回兴宁老家过年，我也想回家一趟，故跟佬

表买了十元钱的山鹿胶，准备带回去给父母亲补补身材。但还剩余五六元钱，感到路费不够，就走回虎山林场，想跟振仁他们拿点路费回家。他取出一封我弟写来的信给我看，说家乡公社正在追捕我们：“哥哥，现公社和县公安局正在追捕你们，把我们的家都抄了，捉我和优仁去斗争，我们被整得死去活来！望你千万别回来，并且要尽快离开虎山。我本想外逃的，但因有妻儿在身，不能逃了，只有任其宰割。”我就打消了回老家一趟的念头，我花了十元钱为父母买的山鹿胶，算是白费了。

过年了，振磷跟陈峰到大桥佬表家去了，陈柱和马师傅回了和平，我与振磷的弟弟、由礼和铭发四人留在林场的毛棚里过年。我们买了几斤猪肉、二斤生香菇、几斤山竹笋，就这样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个农历年。

亲人受害写反书

一九六七年春节过后，陈峰和陈柱回到虎山，他们与鹅叫大队联系上一项承建小水轮泵站的工程，由于天气寒冷和连绵下雨，工程没有动工。我跟着他们在鹅叫大队部住宿，当时陈柱回乡买回一部收音机，晚上一起收听电台广播，特别喜欢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电台的广播。由于我们都出身于受迫害的家庭，故对“自由中国之声”的语言感到特别的亲切。我们渴望平等自由，热切希望台湾国民党能来解救大陆的苦难同胞。严振磷和陈柱等提出写封信给台湾国民党，严由礼表现得更加激进，他叫我们把信邮寄给他在香港的伯叔严恩华，再转给已去了台湾的原和平县的参议员兼和中校长欧阳利农先生，以为会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当时不太同意写这样的信，认为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会有危险。但是过了几天，我弟弟又从家乡寄来一封信，信中详细说了他和优仁等在家乡受到残酷迫害的情况：“由于你们外逃，公社和大队怀疑你们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逼迫我和优仁及振磷的三弟等在家的亲人供出你们的下落，我死也不说。他们就提我们去斗争，进行严刑逼供，用一百斤重的水泥压住我的手和脚，还用电话机的电来电我。优仁和南甫也受到同样的迫害。振磷的三弟则被捉去活埋，泥土都埋没到颈部，幸得被人及时抢救出来。我大哥松金也受到逼供，被逼得上吊自杀，幸被人及时发现，才救出来。我家的猪、鸡、鸭都被抄走了，我和大哥家都没猪肉过年，幸得两位姊姊送来几斤猪肉，算是过了一个年。优仁的父亲也被捉去斗争，被关在大队里，半夜后失踪，不知是投河自杀了还是被人谋杀了，那天夜里下着大雨，洪水泛滥，他的尸

体也没有找到。在此我再次提醒你们，要尽快的离开虎山，不要写信回来，以免被他们截留得知你们的住址。”振磷他们也看了这封信，读后大家都对当局的种种暴行逆施感到无比的愤恨，他们强烈的要我执笔写封信给台湾国民党政府，表达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感情。我便答应他们的要求，提笔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敬爱的国民党主席、尊敬的蒋总统：

我们是中国大陆的一群受压迫奴役的青年，我们的父母被定为“地主”或“富农”成份，不但他们自己受到残酷的打压和迫害，他们的后代子孙也受到无情的摧残。现在我们被逼离乡背井，流浪到外地做苦力工，有家不能归。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还有千百万的中国大陆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血腥统治下，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台湾人民在您和国民党的英明领导下，过着平等自由的幸福生活，我们为之感到十分羡慕和敬仰。大陆的人民是多么渴望能获得自由和解放啊！我们热切地盼望您领导的军队能早日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的苦难。

祝您身体健康和伟大的事业成功！

中国大陆青年：打毛、打林等青年

1967年3月5日

信写好后，我读给振磷、陈柱他们听。他们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写得好！”我将信稿交给严振磷，叫他用信抄正后邮寄。第二天，振磷把信抄好后走到安息墟去投寄了。信封面是写香港某地严思华先生收，信内是写转欧阳利农先生收。我估计这封信是难以寄出，因为江西地方很少人在香港，突然发现有信寄香港，当局一定会截查。纵使寄出了，欧阳先生也未必能收到，因为欧

阳利农当时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我们也不知道。故上述我们的行为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已。

三月中旬，陈峰所承建的鹅叫大队的小水轮泵站开始动工，但容纳不了这么多人。陈峰要我与振磷之弟跃磷到安远去找工，我们俩人与他们分了手，到安远去。后在寻鸟县的一座建桥工地找到做砌石的泥水工做。做了十来天，承建人给我们的工资太低，我们感到不满意，便辞了工返回虎山鹅叫大队。我们返回鹅叫大队后又住了十多天，陈峰他们所承建的小水轮泵拦河工程也完了工。这时没有工程做，陈峰又叫我和振磷几个人一起到安远去找工做。我又带着他们挑着行李，翻山越岭去安远。我们路过我曾经做过水轮泵站的土田大队，在佬表的家里借宿住夜，听说驻土田的地质探矿队要请人打探矿槽，我和振磷与之联系之后，同意给地质队打探矿槽，按土方计工钱。我们住在地质队租用的大队的房子里，每天上山给他们挖矿槽，住了十多天，承接的两条探矿槽打好了，进行了验收结算，所得到的工钱刚好够做这二十天的伙食费。我身上没留下一文一分的钱。

当我们正要转移到别处时，振磷和他弟弟却要回鹅叫大队去找陈峰取回留在他处的行李，我也还有一本《广东师范学院毕业文凭》及一斤多山鹿胶留在那里，我也叫他们给我一起拿回来。我和余铭发及由礼则留在土田住处等待他们。我叮嘱他们早去早回，以便尽快离开土田到别处找工。

银铛入狱受逼供

我们三人在土田地质队住处等待振磷兄弟回来，到第三天傍晚才见振磷的弟弟跃磷回来。我问他：“你哥哥怎么没一道回来？”他说：“我哥被陈峰叫去了大桥，明天才能到。”晚上睡觉时跃磷对我们说：“我在回来的路上，感觉好像有人跟踪我似的。不知是否公安局的人呢？”他的话当时提起了我的警觉，我感到事情的严重和处境的危险，但他们三人都不以为然。这时已是夜晚的时候，振磷又没回来，没有人与我商议这件事。当晚几个人说了一会闲话，也就睡觉了，待明天振磷回来再商议。

那天晚上我睡着觉的时候，却作了一个很奇特的梦：梦中遇见很多如狼如虎的恶狗，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要来咬我，我逃进了一个山洞。山洞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我毛骨悚然呼喊起来。当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天已经灰蒙蒙地亮了。突然这时有人叫起门来，开了门，几个两手持短枪的公安人员站在那儿，命令我们快跟他们走。我们没洗脸刷牙，就拾齐行李走下木板楼梯，看见店门口有两个佬表民兵，手持长枪守住门口。公安人员呵令我们跪下，用粗牛绳把我们四个人挂劲绑起，然后叫我们挑着行李，押送我们走路回虎山公社。半路上，在山边的羊肠小道遇到严振磷迎面走来。公安人员认出他来，也用绳索把他绑了，一起押送。走到鹅叫大队时，又看见正在放竹排的马师傅，一并把他也捆上押走。

走到虎山公社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不给我们吃饭，就用猪笼车把大伙人押运去信丰县公安局。到达时已经天黑，依然不给我们东西吃，就立即进行审讯。公安人员极其凶残，我的双手被绑得很紧，并被吊在窗杠上。我们分开来接受审讯。先问些姓

名籍贯之类的事，接着就问我到信丰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我们只是用了假证明来做工，没做什么坏事。”他们不相信，紧缩吊绑，用鞭子抽我，要逼供我招认做了坏事。我的双手逐渐麻木发紫，额头上的汗珠像雨水一样哗哗直流。后来他们从由礼的口里逼供出写信之事，对我吼道：“你们在鹅叫写了一封反动信，你还敢说你们没做坏事？”我这时知道写信之事已经暴露，就承认了，并把写信的内容和经过说了。说完后他们还问有没有作别的事。我说没有，他们才解开我的绑绳，叫我去签名打指模；我双手已被绑吊得发黑，麻木得不能动弹，过了好一会才逐渐的可以动作，然后签了名打了指模。

审讯之后，办理了手续，把我们解押到信丰看守所，行李检查后收去保管，我们几人分别关押到不同的牢房。信丰看守所是一栋砖瓦木板结构的方框围笼式的二层楼房，中间空地有一口水井，专供关押的犯人洗澡和洗衣服用。我被关押在二楼中间的牢房，里面原先已关着三人，其中有一个听说是某造反派组织的成员。

次日清早六点钟，值勤的武装看守人员叫醒犯人，命大家起身，在木板地上坐着，等待放风。大约七点，才开门放风。倒马桶、洗脸或洗澡洗衣服。每人限用一桶水，洗澡、刷牙和洗衣服都用那一桶水，每间牢房只给十分钟的时间。九点十分吃早饭，每人一瓦钵饭连菜，大约四两大米的饭，半小碗的青菜。吃后每人一口盅的饮水。十点又提审我们，但已没有什么其他事可交待了，过了一会儿，又是签名打指模完事。到下午五点才吃晚饭，一日两餐。

过了两天，我们的头被剃光，照了相。这监狱看管得很严，白天不准躺下睡觉，也不准站立起来行走，只能呆呆地坐在木板地上，到晚上九点过后才准躺下睡觉。看管的武装人员经常走到牢房门的小窗口张望，发现你走动或躺下睡觉时，就会立即喝令

你坐正坐好，不听的话，你将会受到严酷的惩罚。有一天晚上八点钟，我躺下睡觉，被武装人员发现，喝令我起来。当时我睡着了，没听见，他就拿来一副手铐，把我的双手靠背紧紧地铐着，直到次日天明，才解开手铐。我的双手被铐得又红又肿，经过一个星期才复原。

在江西信丰看守所关押了一个多月，一九六七年七月初旬，连平县公安局来人用专车把我们解押回连平看守所。我和振磷分别关押在单独的房间里，被看作是重大嫌疑犯。连平看守所是最近一二年才新建的监狱，一扇大铁门可以进汽车，牢房的四周砌有高大的石墙，并且安装着铁丝网。牢房也是石砌的钢筋水泥的平房。关押我的那间牢房大约有三米宽四米长，前后有一个高的小铁窗，牢门的中间开有一个四平方公寸的小窗口，是用来传饭递水，或察看犯人的。

押回连平看守所的第二天，吃过早饭后，连平公安局开始审讯我们。我第一个被提审。审讯的是一个满脸疙瘩的局长，旁边有一个记录员。他问我姓名和犯了什么罪？我说我没有犯罪。他横着脸，敲着桌子说：“你们写信给台湾国民党，企图与之挂勾搭线，是一个反革命组织，怎么说没有罪？”

我说：“我们被逼流浪到江西做工，在信丰是写了一封信给台湾国民党，诉说我们受到的歧视和迫害，表达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并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犯罪。”

“三人成团，四人成伙。你们凑合了一伙人，写反动信，与台湾国民党联系。与人民为敌，这不是集团组织吗？”局长大声训斥说：“既然是团伙，就必定有组织，有纲领，有名称，你要老实交代这些问题，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政策你是清楚的。”

我说：“我们就是因为受迫害而产生的一点思想感情问题，哪有什么组织纲领呢？其他什么问题也没有，你们可以去调查。”

“你们组织一帮地富子弟跑出来，何止只是做工这么简单吗？”局长说着还叫随从拿出一副脚镣，掷落在地板上，“叮当！”一声，说：“看你交代不交代？看来不给点苦头你尝尝，你是不会坦白交代的了。”

我把被迫离乡的情况以及到连平法院进行控诉的过程述说了一遍。我说：“春节时南甫凑由礼他们外出做工时，我曾劝告过，叫他不要拉上太多人，要去就我们俩人去，以免影响大。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看看我们是不是为了生活而做工，看看我们有没有做过什么别的坏事？”

审了一个上午，没有审出什么名堂，将我所讲的都记录了，签名画押。另外给我几张白纸和一支圆珠笔，叫我写交代材料。下午我把被迫离乡的原因及外出做工的经过写了一遍，也把在信丰虎山公社鹅叫大队写信的内容及环境情况写了，递了上去。

过了两天，我弟及南甫也被抓来了。他们分别审讯，南甫带着一副脚镣回牢房。我的心里感到十分的悲痛。弟弟是被我连累的，是我害了他。现在家中的父母及他的老婆子女不知会怎样，家破人亡也未可知。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

几天后，又被提审。局长说：“你们的同案犯都已经交代了，你还想企图顽强抵赖过关吗？”

我说：“他们既然交代了，你们就去问他们，我没犯别的什么，叫我如何交代呢？难道叫我捏造些来交代吗？”

“问题是有的，而且很严重，你就是避重就轻，不愿交代。你这样是过不了关的。”局长逼着我。

我说：“天上没有雨，你逼死雷公也没有。我确实没犯别的什么事，叫我交代什么呢？怎交代得出来呢？”

局长说：“你还有思想包袱没放下，你要相信我们党，相信人民政府，放下思想包袱。现在再给你时间，回去好好反省考虑你的问题，再作交代。”说完就叫我回牢房去，又给我纸笔，叫我

再作交代。

一个多月后，南甫的脚镣被解开了，我弟弟与振磷的弟弟及余铭发三人被释放回家去了。我与振磷及南甫、由礼四人仍然关押在连平看守所里。

狱中生活与被判徒刑

话说这连平看守所处在坑角落里，山高皇帝远，对犯人的管理虐待外面没法知道。犯人一个星期才放一次风，洗一次脸和澡；监房内的臭虫、虱子成堆；一天两餐，每餐只有二两米的烂饭，钵面上有五六块小指大的萝卜干，没有油。国家原规定给犯人每天是八两米的，也有一定的伙食费，但却不知哪里去了？犯人到这里后，只要关上一月半月，身体就会很快衰弱，体重快速减少，并且会患水肿病和神经衰弱病，致使头晕眼花孱弱不堪。有一个陂头公社的劳动模范，四十多岁，被关了三个多月就被虐待致死。

有一天上午九点钟吃早饭，我很快地把二两米的烂饭吃完，见还没送水，便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后来送水的厨工来了，敲了两下门，我醒来，拿着小瓦钵走到门口去装水，但他已转身走了。我大声叫他，他也不理，我很气愤，就把小瓦钵丢在门外水泥地上打碎了。我因此被铐上铁脚镣，一个半月才解开。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没有洗澡，也没衣服洗，身上都发臭味。

九月一天晚上，我身上患风疹，手脚甚至全身都长起一块块的疙瘩，痒得厉害，万分痛苦难受，却得不到医治。无奈之中，我只有将手和四肢及身体靠床缘的木板上，用力磨擦以止痒，直磨到皮肤破损发热，全身轮流摩擦，才终于止住了风疹的发作，身上所起的疙瘩也慢慢的消散了。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夕，我的身体已经衰弱得很厉害，放风走路都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眼花十分严重。有一天，我跌倒在地，头晕得很厉害，起身站立感到天旋地转。所长看见我的身体如此衰弱，可能会死去，就请来一个医生。医生给我打了两支葡萄糖针水，又给了一些维生素药粒。打针吃药后我觉得好了一些。入

监时还有二三元钱被管着，就请所长给我买瓶补脑汁，他给我买了一瓶维灵补汁，吃了之后又感到好了些。

六八年过旧历，年三十日晚餐时，连平看守所给每个犯人二两肥猪肉，三两米饭，算是过年。所长送饭来给我们时，自家已吃喝得脑满肠肥，一脸通红，而我们却连饭都吃不饱。

二月下旬，公安局叫我出去在逮捕证上签名，我没细看就签了名。三月初，连平法院提审我，问我说：“你们写信给台湾国民党，是以你为首写的吗？”我说：“信不是我要写的，是严振磷及陈柱他们要求我写的。我当时不赞同他们写信，说没有什么作用的，但由于家人受冲击受逼害很厉害，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之下，我才答应草写这封信的。信是由严振磷抄正邮寄的。所以不是我为首。”法院将我的回答作了记录，并叫我签了名。

三月中旬的一天清早，公安局将我和振磷叫出监房，又叫由礼和南甫收拾带齐他们的行李物件，把我们押到看守所门口，两个武装的公安人员把我们押上一辆军用的吉普车，送往大湖公社。大约八点多钟到达，安置在公社的一间空房里休息，接着给我们每个人一钵饭吃。九点，振磷的弟弟跃磷与他的母亲来探望他，送了些鸡蛋和糯米糕给他，他也分一些给我们几个吃。他母亲哭着说：“听说今天是对你们进行宣判，你是会被判劳改的，以后我可能就见不到你啦。”振磷也流泪了。

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脸青白如纸，走路头晕眼花，眼冒金星看不清，听觉也模模糊糊，像是做梦一样。我们被押到公社大会堂的讲台上，讲台下坐满了学生和一些社员群众。我们被喝令跪着，面向群众，并给我们四个人带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黑牌。我们背后站立着我弟弟、振磷弟弟、余铭发及曾治平之子曾灵振，他们是被叫来陪审的。

大会开始后，各大队派代表上台检举揭发和批判我们。先是塘背大队的民兵营长上来检举揭发严振磷等所谓“反革命”行为，

后是我生产队的冬发之子曾治恩上台来批判我。他说我回家后不服从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教育，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走自发的资本主义道路，不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以致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连平法院宣读了我们的判决书：

查以严振磷为首的企图挂勾搭线现行反革命集团，从一九六五年以来经常纠集一班地富子女在一起，散播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一九六六年竟然私刻公章，组织一伙人以做工为名，外逃从事反革命活动，企图逃港逃苏。在江西信丰期间写信与台湾国民党联系，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

正当这伙反革命分子进行猖狂活动的时候，为我广大的革命群众所检举揭发，我公安机关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将其缉拿归案。

现查明并判决如下：

严振磷：家庭出身地主，初中毕业文化，系大湖公社塘背大队人。其思想反动，主动提出写信给台湾国民党，企图与敌特机关挂勾搭线，进行反革命活动，是该组织的为首分子。现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曾石荣：家庭出身富农，大学毕业文化，系大湖公社民主大队人。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和仇视，执笔写信给台湾国民党，发泄不满言论，是该组织的首要分子。现判处其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曾南甫：家庭出身地主，高中文化，系大湖公社湖东大队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积极参与该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是该组织的骨干分子。现判处其管制三年。

严由礼：家庭出身地主，小学文化，系大湖公社塘背大队

人。其思想反动，积极参加该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是该组织的积极分子。现判处其管制三年。

大会宣判后，我们被押回公社的那间房间，叫我们在判决书上签名。签名后我感到从此前程更加黑暗渺茫，让父母失望伤心，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无以报答，不禁痛哭流泪。

正午一点时分，公安人员押送我和严振磷到忠信公安分局。因没车，就叫我们走路到忠信，两个武装人员在后押送。当我们走出公社大门口时，我大侄女走到我身前，将几个熟鸡蛋塞进我的衣袋里，刚塞进三四个，被押送的公安人员喝住了。她才十三岁，没胆识，就不敢将其余的几个再给我，转身就走了。后来我刑满后回家听母亲说当时是她想到来探望我的，但被弟弟劝阻没有来，故就将煮熟的八个鸡蛋给小孙女拿来送给，孩子年纪小，只敢在路边胡乱塞给我。

因为身体十分衰弱，走路踉踉跄跄的。从大潮到忠信只有十七公里路，可我们却走到下午六点半钟才走到忠信街。这时已经天黑，街上虽然有灯光，我却看不见任何东西，原来我因为缺乏营养而患上夜盲病。我叫振磷牵着我的手走进公安分局的拘留所。

次日，我们被带到忠信车站，乘搭班车到连平。在连平看守所，检查物件时，我看见振磷有三十多元钱，我却没分文，就叫振磷给我三元钱买药吃，他就给我了。我将三元钱交给所长，叫他再给我买瓶维灵补汁来吃，他也答应给我买。我们两人又在连平看守所的牢房里熬了一个多月，直到四月中旬，我们才被送往英德劳改场。

送进劳改农场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连平县看守所将我和振磷解押去英德劳改农场。当天的清晨六点钟我们被叫出来，取出入监时被扣押的物件，两人共带上一副手铐，解押到连平汽车站，乘搭连平至广州的客班车。到达广州后，押送人员将我们寄押在广州黄华看守所里住宿。那里关押的犯人很多，一个大房间就关着十多个犯人。两天之后才将我们解押到广州火车站去乘搭火车前往英德。火车出站后不久，列车上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播喇叭高分贝播音：“全体乘客肃立，现在向毛主席作早请示！”接着便大声朗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语录，算是作了早请示的仪式了。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城乡都搞起“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强迫人民像念经拜佛一样去礼拜毛泽东。

九时左右，列车开始卖早餐，押送人员为每人买了一份饭菜吃。十二点，列车到达英德河头站，我们下车转乘矿山的小火车到达英德劳改农场总场，总场和入监队都在坑口咀。这英德劳改农场总共有十八个大队，分为四个分场，是全省最大的劳改场。押送人员到总场为我们办理了入监手续后，把我们送进劳改场的入监队。

队长见我们穿的衣服很脏很臭，还发现我们身上有虱子，就叫人立即给我们剃光头，发给我们两套黑布秋衣，叫我们去洗澡换衣服并洗干净那些脏衣服。然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被子、蚊帐和席，还有一张小的矮木凳子，给我们安排好床位。

入监队是犯人进入劳改场时，接受劳动思想改造、学习劳改场的纪律的地方。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整理好被铺后，洗脸刷牙，接着就排队进行“早请示晚汇报”的三呼万岁宗教仪式。然

后分小组围成一个圆圈坐着，由当局指定的值星员（即小组长）带领读“毛主席著作，”读读“老三篇”或“老五篇”，有时集中学习唱《劳改队歌》：“劳改队规十八条，全体犯人要遵守：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违抗怠慢；不准……”

我们刚进这入监队时，犯人才二十多个，过了三四天，广州送来一批四五十个犯人。没过几天，广州部队又送来一批二十多个军人犯，多数是政治犯，其中有的是从越南战场遣送回来的，有普通士兵，也有当官做指导员的。据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因为闹情绪弄坏《毛主席语录》而被判刑的。

学习了队规纪律之后，接着开展进行认罪服法教育，集中听队长讲解之后，分小组进行学习讨论，每个犯人都要发言谈自己对所犯罪过的认识，然后小组对你的认识进行鉴定评议。我们小组有一个名叫朱友伦的，是台山人。他的家庭出身是富农，由于写信给香港的亲戚而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罪名，判刑七年。他在小组讨论发言时公开不认罪服法，他说：“我只是写了一封信给香港的亲戚，说了几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这算是犯了什么罪呢？我真不明白。”后来小组对他进行评议鉴定时，不但对他进行批斗，小组里有一二个假装积极改造的犯人还对他进行毒打。小组的值星员张楚武把朱友伦拉到中间来站立，他不但口头上批判朱友伦不认罪服法，说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还对朱友伦大打出手，用拳头往朱的心胸部位打。另有一位广州来的流氓犯孙小权也跟着对朱毒打。我怒不敢言。轮到我检查自己的时候，只好表面上说几句是自己犯了罪，要认罪服法改造思想。小组对我评议鉴定时，也有一二个人批判我，但没有毒打我，算是过了关。在这次认罪服法的教育中，各小组都有一二个犯人公开不认罪服法的，也在小组会上受到了批斗和毒打。还有一二个揪到大会来批斗的，也受到假装积极改造的犯人的毒打。

经过一个多月的入监学习教育后，劳改场当局就将这一期入

监的犯人分配到各分场各大队去。我被分配到红星分场一大队，严振磷被分到三大队。英德劳改农场主要是利用犯人的无偿劳动来生产稻米和茶叶，出口换取外汇。对外是用“英德茶场”的名称。

红星分场有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又有二个或三个中队。我所在的大队只有二个中队，一中队关押的主要是政治犯，只有少量的刑事犯。我和一班军人犯被分配到一中队，我们到时只有一百个左右的犯人。当时一中队的指导员³姓孟，四十来岁，镶着几只金牙，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说话声音很大，很有条理，是一个温和派的人物，主张对犯人进行说理教育，不主张打骂。

一中队负责生产水稻和蔬菜及饲养畜牧业，二中队负责生产茶叶。我们被分成两个小组，编入在大田组里，有武装人员看押劳动。我所在的小组有十二个人，值星员还是张楚武，朱友伦也仍在我们小组，还有因写日记而被判刑的赵明辉及几个军人犯。我经过在入监队的一个多月的调养后，身体有了很大的康复，不再头晕眼花了，但体力还是不及以前在外时的水平。故在劳动时总是慢悠悠的，不愿卖大力气。到了七月，进入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中队当局就要求田组的犯人每人每天完成收割五分田的稻苗、并把割下的稻苗担到附近的打谷场上去的任务。我对这不以为然，照样还是慢悠悠地收割，一连两天没完成任务。晚上在学习会上受到孟指导员的批评，并叫我在小组学习会上进行检讨。我在检讨时说自己因身体衰弱没能力完成任务，受到小组一些犯人的批判，说我消极怠工，抗拒劳动改造。但由于孟指导员指示不要搞武斗，故当时没人动手打我。我受到批判后，次日仍然没有完成任务，晚上指导员又在中队犯人的学习会上点名道姓地批评我，说我这大学生不愿积极改造，抗拒改造。他说：“明天若

³ 指导员：中共当局在部队设立的一种由党领导的制度，连级设指导员，营级设教导员，团级以上设政委。

再不完成任务，就会在大会上批斗你！”于是第四天我下了很大的力气，艰辛地完成了收割五分稻苗的任务，就没有受到批斗。

八月时我们中队又从总场送来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个是和平县合水公社的老贫农，六十多岁，名叫黄善佑。他是因为去年到县城时买了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塑像，因为路途远，手里拿着不方便，于是买了二只花带子绑着塑像的脖子，用竹棍子挑着回家，却没想到这样会惹来横祸：在回家的路上遇上红卫兵串联，发现他绑着毛塑像的颈子摇摇晃晃，于是说他心怀恶意，有意的将毛主席绑吊死。就把他抓进了监狱，判了六年的徒刑。

九月又送进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个龙门县某公社的社员，名叫罗其瑞。他家庭出身地主，但他的老婆却出身贫农，他老婆买了一幅毛泽东的画像贴在房间的墙壁上。因经常补衣服，将用过的针插在画像上，无意中把针插在画像毛的眼睛上。没想到遇着红卫兵和造反派来抄家，发现他家将针插在毛泽东的眼睛上，就说他心怀阶级仇恨，企图弄瞎毛主席的眼睛。于是把他捉去坐牢，后来判了六年的徒刑。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全国各地的派性斗争激烈，到处都搞武斗。虽然中共中央发布了七三和七二四布告，禁止武斗，但是禁而不止，而且越斗越严重。劳改的干部也分成两派，一派是温和的保守派，例如一大队一中队的孟指导员和古队长等，他们对犯人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主张不打骂犯人和对犯人不虐待。古队长对犯人（特别是政治犯）很和善，他带队劳动时从来不要求犯人完成多少任务，只是坐在远远的树林下看书或是找些政治犯来谈谈话。另一派则是激进的造反派，他们对犯人的态度很恶劣，动不动就打骂和虐待，要犯人每天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完不成就惩罚或是扣饭食或者进行批斗，还在斗争会上让一些流氓犯去打人。其中以湖南的王队长为代表人物，他个子生得矮小，塌鼻梁小眼睛，为人凶恶残暴，人们在背

后都称他为湖南辣椒王，或叫辣椒仔。犯人们都怕他恨他。十月时候，他在派性斗争中占了上风，把温和的古队长整回了梅县老家，他补上了管教队长。孟指导员也被整到学习班里去了，换了一个姓刘的指导员，也是个残酷人物。这时候辣椒王可神气啦，每天晚上主持中队犯人的学习会，不是骂这个就是揍那个，开口是阶级斗争，闭口也是阶级斗争，还纵容积极的犯人上台打被批斗的犯人。有一次我在铲田基时抓到一个田鸡（青蛙），放在衣服里准备带回监房烧熟来吃，被他发觉，不但田鸡被他丢了，那天晚上还被他拖出来斗争了一场。在斗争批判中，被罚坐喷气机，要我伸直双手，向前弯着腰，不许动弹半点，动了就大巴掌打我，甚至用拳头。

白医生自言自语骂奸雄

十月初，从广州又送来一批新犯人，其中有一位六十多岁的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姓白，在香港做过二三十年的医生，人们都称他为白医生。他在香港退休后回到广州故居居住。他也是一个天主教教徒，退休后仍然信奉天主教。一九六六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后，红卫兵曾多次冲击他家，捉他去游街批斗。后来抄他的家，发现他有香港的外汇，就说是特务经费，把他打成特务分子，送进黄华监狱。一九六八年判他十年徒刑，并于九月将他送到英德劳改场，十月初分配到红星分场一大队一中队进行劳动改造。

在一大队一中队时，他装病拒绝劳动，就被关进一间禁闭室，每餐只给三两米饭。他在禁闭室一个多月，依然不愿出来劳动。辣椒仔王队长当上管教队长后，看见他不愿劳动，就把他拖出禁闭室，拉到蔬菜组，给他一张木板小凳，叫他坐着拔杂草。白医生无可奈何，只有坐在小凳上应付地拔几颗草，有时就坐着发呆。王队长安排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叫雷振庭的犯人，专门去监视他，观察他的行为表现。雷犯与他在一起拔草，跟他说话，他都不理不睬。雷见他如此古怪，也不再问他，就离他远些，观察他的表现。一连几天隐约地听见这位白医生在自言自语，便偷偷靠近他，侧耳细耳，听见他说：“我在香港行医二三十年，救死护伤，却没想到回到祖国大陆居住，竟被说成是特务，被判刑十年。特务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说我犯了特务罪，是天大的冤枉啊！我爱我们的祖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祖国现在却变成恐怖与黑暗的大地。过去共产党说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如今共产党实行的白色恐怖已超过国民党一百倍一千倍。说国民党的监

狱无人道，我没有亲身经历，而今共产党的监狱的惨无人道，我却亲临其境，也深受其害。他们吹捧毛泽东如何伟大，把他说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简直是颠倒黑白。谁不知毛泽东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呢？他杀害了几千万的无辜的中国人民，饿死了几千万的农民，致使中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六亿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农奴。他是大罪人，他才是真正的罪犯，他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啊！我只是个医生，救死扶伤几十年，何罪之有？说我犯了特务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雷振庭经多次仔细的听清楚之后，便将白医生的言行表现，一五一十的向王队长作了汇报。王队长听后十分震怒，大发雷霆的骂道：“这个白老头王八蛋！竟敢如此恶毒谩骂我们的伟大领袖，今晚非将他斗垮斗臭不可！”他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将白老头处死。于是吃过晚饭后，他立即到监狱来，召集值星员会议，布置今晚斗争白老头的事宜，叫雷振庭上台检举揭发白医生的言行，叫值星员上台狠批猛斗白老头。

晚上七点时分，一中队全体犯人集中在黑板报前的场地上，灯光明亮，王队长主持批判斗争白老头的大会。王队长首先读了两条毛主席的语录：“一、被推翻了的阶级和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二、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有乱说乱动，就给予制裁。”他接着对犯人说：“我们今晚开个斗争批判大会，批判斗争反动的特务分子白××。这个白老头犯了特务罪，死不认罪服法，抗拒劳动改造。他来到劳改场后不愿劳动，受到禁闭，后被派去种菜组拔草，他不认真做拔草的劳动，天天只坐在那里自言自语的谩骂共产党和毛主席，语言十分恶毒。今晚我们就开个斗争批判大会，非把这个白老头斗垮斗臭不可！现在就白老头拉出来，大家来揭发批斗他。”

王队长说后，一些犯人像应声虫一样大声喝叫：“白老头站

出来！”几个值星员上前去把白医生拉到讲台前，喝令他低头站立好。犯人雷振庭走上台前进行检举揭发，他用手压低白医生的头，然后把他听到白医生在菜地拔草时，天天自言自语怎样恶毒谩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说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讲完后问白医生：“你是不是这样说的？”白医生回答说：“是的！我每天都是这样自言自语说的。”雷犯又问白医生：“你为什么要这样谩骂共产党和毛主席？”白医生说：“我不是骂他们，我说的只是事实！”雷犯打了白医生两巴掌，说：“真是反动透顶！”就走了下去。

接着，一个值星员犯人走上去批斗白医生，将白的言论批判了一番之后，问白医生：“你犯了罪，共产党只是将你判刑改造，还没有把你杀掉，不将你消灭。这不是人道主义吗？”白医生说：“这是慢性的消灭，比死更难受，毫无人道主义可言。”这个值星员也打了他两个耳光。

台下的许多政治犯，看见白医生如此勇敢顽强，敢于直言不讳，都被感动，从内心中对白医生表示称赞和敬意。

接着又有一二个犯人走上去批斗白医生，他们不但大骂白医生，还用拳头打，用脚踢。白医生被打得倒在地上，晕过去了。

结束时王队长表扬了那几个上台检举揭发和敢于批斗白医生的犯人，要全体犯人向他们学习，积极靠拢政府。然后叫了几个值星员将白医生抬回禁闭室，将他继续禁闭。不久又将他调离红星茶场一大队，据说是调到韶关罗家渡劳改场去了，那是关押重刑犯的场所。

遭诬陷控诉潘队长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泽东指示全国各地建立“五七”干校，要将大批的被整出来的干部下放劳动。十一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英德劳改茶场中的三个分场空出来建立省一级的“五七干校”，将这三个分场并入红星分场，将那儿的犯人的一半调到红星分场，其余的一半调往罗家渡或其他劳改场。红星分场第二大队则改建为军队的“五七干校”。这时红星茶场成了英德劳改场的总部，一大队则将原来的油房仓库改为监房，一下子来了三四百犯人，一大队的犯人由原来的三百多增至七百多人。大队规模由两个中队变成三个中队，增加一个建筑中队。这个新设立的建筑中队专门从事爆石、烧砖和到原二大队去为部队的“五七干校”建筑房屋，以便给下放劳动的军官及其家属居住。

十二月，大批的省市机关干部和各大专院校的教授下放到英德“五七干校”劳动，据说著名的粤剧演员红线女也被放到坑口咀茶场劳动。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和赵明辉等一批政治犯三十多人被调去四大队。这四大队关押的是各种刑事犯，分为三个中队，其中一二中队种植生产茶叶，三中队则种植水稻和蔬菜。我调在三中队，赵明辉等调在二中队。这四大队的生活环境比一大队差：一大队的厨房在监内，犯人放工后喝开水比较方便；洗澡也方便，有一条小河沟从监内流过，犯人放工回来后可以随时去冲凉洗澡。而四大队则厨房在监外，犯人只有在吃饭时才能打上一口盅开水，其余时间想打开水喝也没有；它也没有河沟通进监内，故犯人洗澡洗衣服要在外面的河沟里洗。四大队的三个中队的房屋是三栋平房，三栋监房排成品字形，一二中队的监房在两侧，前边是大

监铁门，后边是三中队的监房，中间是泥坪场地。每个中队的监房前都安装了黑板报场地，用以宣传教育犯人。三排监房后边则是高高的围墙电网，两角头还设高高的岗哨。

我到三中队后被编入大田二组。我们组有一个叫侯荒吕的犯人，长得蛇头鼠眼，颈上满是汗斑，腰有点弓。他四十多岁，是个诈骗盗窃犯，现是第三次被判刑劳改。编床位时，侯犯编睡在我的侧边，每人只有 0.8 米宽的床位，犯人与犯人之间睡时靠得很近。侯犯为人奸狡，他白天劳动很正常，也很卖力；但在晚上睡觉时他却装病，口里不停地叫喊“哎哟！哎哟！”的叫喊，说是胃痛。同犯叫他去医务室看病拿药吃，他不肯去。我见他一连几天晚上都这样吵着，影响了休息睡眠，就对他说：“你有病就去医务室看看嘛，怎么你又不去看病请假，却每天晚上睡觉时就叫痛，影响和妨碍了旁边人的睡眠呢？”侯犯说：“我有病叫苦关你什么事？要你来管么？”我说：“你有没有病当然是你自己的事，但你这样叫喊却妨碍了旁边人的休息睡眠，怎么与我无关呢？”他不听我的劝告，继续叫苦。他的行为也激起了旁边犯人的不满，对他说：“侯荒吕，你别这么野蛮好不好？你白天劳动没病，晚上睡觉却装病，大叫大喊的影响同犯们的安宁，你这样说得过去吗？你若真的有病，我们立即带你去医务室检查，若没有病你就别装了！”经几个同犯说他，他不敢再叫喊了，却对我怀恨在心。

在一星期日的休息日里，下午三点多钟，姓潘的管教队长走进中队的监房来，叫我们大田组的犯人到监外小河沟去洗澡，我就拿着毛巾和准备换的衣服，跟着一起排队出去。走到小河沟里，洗了澡，将换下来的衣服拿来洗。衣服还没洗干净，小组便叫集合回去。我急忙将衣服草草拧干，待我跑上去跟着小组集合时，误迟了几分钟。这时侯荒吕乘机对我进行报复，说：“他是想企图逃跑的！”潘队长接着说：“你是不是想逃跑呀？”我解释说：

“我是因为洗几件衣服误迟了几分钟，哪里会想逃跑呢？”侯大声对潘队长说：“他是有意拖延时间，想待我们走后就逃跑！”我当时极为气愤，大声骂他说：“你这个诈骗犯，胡说八道想来陷害我吗？”潘队长见我气急败坏大声骂人，认为我违纪反而强辩，就大声对我吼道：“你就是想逃跑！不然，怎么叫集合回监房你却迟迟的不上来呢？回监房去再跟你算账。”回到监房，待我把衣服晾晒后，潘队长就叫了值星员把我用绳索套住脖子绑在黑板前的柱子边，吃晚饭时也没给我解开，一个同犯将分得的饭菜递到我手中，我勉强地咽下一点。

晚饭后不久，潘队长召集众人来批斗我，他首先让侯荒吕检举揭发我在外面洗澡后企图乘机逃跑，我拒不承认。接着又有一二个犯人来揭发批斗我。后来有一个也是从一大队调来的犯人叫徐树德，走上来检举揭发我，说我在一大队就有逃跑的意图，说我经常观察围墙电网，来到四大队也是这样。还说我在一大队时与一个逃港犯李海关系很密切，说不定想逃去香港。我拒不承认他对我的指控。徐犯见我抗拒，举起拳头就往我的胸口猛击一拳。我被击倒在地上，晕倒过去。潘队长叫人用冷水把我泼醒，命人解开绑绳，接着给我带上一副特制的土脚镣，这是用碾米机的钢磨芯做的硬直脚镣，重四十多市斤（二十多公斤）。带上这副脚镣后是走不动的，要用绳子绑着，行走时，用手提拉起来一下，才可走一步路。

有些同情我的犯人帮我找来一条绳子，又给我一张小木凳，叫我绑好站在磨芯的下面，这样就可拉动一下走一步路。同犯们还告诉我，说一年前也有一姓曾的犯人，叫曾爵仁，也被潘队长带上这一副特制的脚镣，被逼得上吊自杀死了。他们劝告我千万别像曾爵仁那样去寻短见。

带脚镣后，不用出去劳动，每餐只给二两米的稀粥吃。为了表示对这种不人道的处分表示抗议，我第二天开始绝食两天，把

不吃的那小钵稀粥放在大队监房的大门口，让进出的犯人和大队的其他干部看。我艰难地写了一份上诉书，控诉潘队长对我进行无理的残酷迫害。我的控诉书是这样写的：

四大队的上级领导、军代表：

我是一个政治犯，来到四大队进行劳动改造，现在无中生有地被诬陷为“企图逃跑”，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星期日下午，潘队长带我们三中队大田组犯人出去监外的小河沟洗澡，由于我换了衣服要洗，集合时迟误了几分钟。潘队长听信诈骗犯侯荒吕的话，说我有意拖延时间上来集合，企图逃跑。这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诬陷。我没有离开洗澡位置半步，大家在一起洗澡，只因洗衣服耽搁了几分钟上来，怎么说得上是企图逃跑呢？

潘队长听信一个三次劳改的诈骗犯的话，是非不分，又不让我申辩，当时把我捆绑起来，晚上还对我进行斗争，逼我供认。当我不承认时，就让犯人打我，还给我带上副特制（碾米机磨芯做的）的脚镣，重四十多斤，带着不能行动。这是法西斯式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行为。对此我表示极大的义愤和抗议，并在此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诉，控诉潘队长对我的野蛮迫害。

请上级领导进行调查，制止潘队长对犯人的无理迫害。

此致

敬礼！

三中队犯人：曾石荣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诉

我的这份控诉书亲手交给了派驻四大队的军代表，他看后交到三中队的王指导员手中，王指导员读后又交回给潘队长，并叫潘队长将这份申诉书写在中队的黑板报上，让犯人看。他们的思

想意图怎样？我不得而知。但许多犯人看后都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并赞扬我的勇气。这个潘队长三十多岁，青白的脸，说起话来嘻皮笑脸的，但对犯人却心狠手辣，什么手段都用得出，可谓人面兽心。他害死了犯人曾爵仁，现在又想把我害死。

我带着这副特制的沉重脚镣，度过了十八天，脚都带肿了。第十八天正值大队领导和各中队指导员到各监房来检查，还有军代表。当他们走进三中队监房时，我正在床上躺着，看见他们走来，我立即起身坐在床沿边。一中队的曾指导员带头走到我面前，问我怎么带着这么重的脚镣。我感到一阵心酸，声泪俱下地诉说潘队长对我的迫害，并请曾指导员看我的脚的水肿情况，其他几个领导及军代表也走前来观看。他们看后说：“这件事我们回去再作研究，你暂时安心休息吧！”

到晚上七点，王指导员来主持全中队犯人的学习，正值下雨，故学习在监房进行，犯人都坐在下层床上。王指导员说：“现在先让曾石荣出来检讨反省他所犯的错误，然后给他开脚镣。”我走出去，将我洗澡的经过及侯荒吕对我的诬陷过程说了一遍。指导员听后问犯人说：“大家对曾石荣的反省检讨有什么意见吗？”侯荒吕和几个同流合污的犯人大声说：“他根本就不是作检讨反省，而是把责任推给潘队长，不能给他开脚镣！”王指导员说：“曾石荣的检查虽然态度上有问题，但他已经带了这么久了，我看还是给他除掉这副脚镣！只有这样对他的思想改造才有利。”他说后叫了两个值星员，给我解开了那副脚镣。

过了几天，姓郭的军代表走来找我谈话，问了我现在的情况，说他知道我是被诬陷的，故叫王指导员给我解开脚镣，他安慰我安心改造，说我以后可以按期释放回家的。他并且说他们将把那些诬陷我的材料烧掉。我对他的善心表示了感谢。

在这四大队三中队有个管生产的罗队长，是个黑脸神，对犯人的劳动任务下得特别重，例如铲茶草每人每天要完成 400 米（2

米宽)的任务，完不成就要于中午加班。插秧每人规定一天五分地，完不成也得加班。中队的犯人多数是刑事犯，愿做奴隶的较多，故他们做工肯卖力，以搏得队长对他的好感。在大田组里只有我和郭显棠经常完不成任务，也不把任务放在眼里，总是慢慢地做，被一些犯人和队长说成是磨洋工。故我们几乎每天都被罚加班，但我们俩人都怕加班加点，在加班时我们也照样慢慢做，加班后仍然没有完成任务。若多次没完成任务，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我被批斗得特别多，也特别严重，因为潘队长要报复我，加上侯荒吕与我同小组，也要报复我。我在小组中经常被批斗，罚跪，侯犯则用巴掌打我，潘队长不但不制止，还发笑。

有一个星期日休息，下午一个犯人发现他被偷的一条短袜晒在监房的后边。他将这条短袜拿回监房，大声的叫喊说：“这条短袜是谁的，掉落在外边，请前来认领。”他由监房的那头叫喊到这头。这时候荒吕出来认领说：“这条短袜是我的。”那犯人说：“真的是你的吗？别认错呀！”侯犯说：“真的是我的，没有认错，是我昨天晒在外边的。”那个犯人见姓侯的认了，于是二三个人把他按倒，拳脚交加猛打，打得他叫苦连天。我看见侯犯挨打，也走上前去，奋力出拳，猛打侯犯，报了一箭之仇。

这件事被潘队长知道后，他没有批评其他人，只批评我，说我对侯犯进行报复。后来每逢我被批斗时，潘队长更加放纵侯犯对我进行报复，让他使足了劲打我。

这三中队的犯人由于生活条件差，每当收花生或收蕃薯时，犯人就像饿虎一样，背着队长大吃生花生和蕃薯，甚至带着泥往嘴里塞。我原本不吃生花生的，但由于生活在那环境里，也饿鬼一样跟着吃生花和生蕃薯。在四大队的那段日子里真是苦难重重，不堪回首。

“一打三反”运动

一九七〇年三月，没想到我和赵明辉、支宗凯等一批政治犯又调回红星茶场一大队一中队。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可以摆脱那个时刻都在整治我的潘队长的魔掌。

那时一大队和一中队的许多领导都换了人，一中队的孟指导员已经调走，换了一个姓刘的。刘指导员据说是紫金县人，讲一口客家话，三十七八岁，三角形的脸，两颧骨突出，长着一副深嵌的眼睛。他说话声音不大，心肠十分狠毒。我仍然编在大田组，有一次出工劳动，先去工具房拿工具。我由于偷吃了一条生玉米而拉肚子，报告之后，被允许在工具房侧边的厕所大便，因为有些痢疾，屙了十来分钟还没拉干净。刘指导员叫了二声，我还没出来，他就拿起一条竹条，走进厕所把我拉出来，用竹条子狠狠的把我抽打一顿，把我的大腿及腰背打起几条血浪，紫蓝色，半个月后才散去。

不久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一打三反”运动，即：大力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派别斗争，反对抢夺国家物资和反对盗窃国家财物。九月，红星劳改场决定开展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在犯人中进行。刘指导员在会上宣布说：“上级决定在犯人中进行‘一打三反’运动，要对犯人进行严格的管理。从明天开始，每个队长上班要拿着棍棒，有谁不听管教或违犯队规的，立即使用棍棒打，决不手软。凡有盗窃行为或是有反革命言论行为的，要进行残酷的斗争，和严厉的打击。”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一中队的犯人集中在黑板报前的场地上，刘指导员、王队长和彭队长都来了。王队长主持学习会，他在会上宣布把特务分子郑炳生抽出来斗争，他说：“郑炳生是美蒋特

务分子，在劳改场中不但不好好改造，还在拉帮结派，散播不满言论，故要对他进行狠批狠斗。”说完就立即把郑炳先拖出来，喝令跪下。“你平时叫我为湖南辣椒王，说我对犯人心狠手辣，煽动犯人对领导的不满情绪，还说恨死我王队长，恨不得把我杀掉。你还在犯人中拉帮结派，对一些犯人进行打击报复。你承不承认这些事实？”王队长问郑炳生。郑说：“说你王队长是湖南辣椒王，是说过，很多犯人都是这样称呼你的。拉帮结派之事是没有的，只是与一些同乡的犯人亲近些，谈不上拉帮结派。”上去揭发的犯人说：“他在进行狡辩。”王队长首先抡起手上的棍棒，对郑进行毒打，刘指导员和彭队长也跟着毒打郑炳生。他们打后，接着有三四个积极投靠的犯人跟着对郑进行拳打脚踢。郑炳生被打倒在地上，额头出血，晕倒过去，王队长还说他装死。后来叫来一个犯人医生来看，经打了两针，包扎了伤口，敷了药，把他送回宿舍。

第三天晚上再度开斗争大会，被批斗的是被分配到油房打油的犯人梅国华。说梅国华在油房打油期间，不但自己偷吃花生和花生油，还偷了一些油给其他犯人。一二个犯人上去检举揭发，梅国华只承认自己偷吃，不承认偷了给别的犯人。王队长见之不认，便抡起手中的棍棒，对梅国华大打出手，刘指导员和彭队长也跟着轮番对梅进行毒打，而且打他的腰部和胸部，打得他在地面上翻滚。接着又有二三帮凶的犯人上去，对梅国华再度狠命踢打，可怜的梅国华不再动弹，昏迷过去。散会后，刘指导员叫人把梅抬回宿舍。半夜过后，梅国华醒来叫痛，要叫医生。睡在他侧边的同犯走去犯人医务室，把犯人医生李传广叫来。这个没良心的军犯医生走到梅国华的床前，随便摸了一下，便说梅是装死的，置之不理，走向医务室。待到清晨六点钟起床，睡在侧边的犯人发现梅国华死了，身体已经冰冷。值星员立即出去报告。刘指导员走来看，证实是死了，叫了三四个犯人把他的尸体抬到外边的

小山丘上埋了。后来打电报给梅国华的家人，说是他畏罪自杀死的，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梅国华的死给上级领导敲响了警钟，一些领导反省了对犯人使用的残暴手段，指示要有所收敛，接下来对犯人的批斗方式也有所改变，队长不再亲自下手用棍棒打犯人。例如批斗在油房打油的犯人蔡利兼时，王队长就组织一个专门小组，由一个强奸幼女犯王长延为组长，配上几个帮凶，指示将蔡捆绑手脚、吊到梁上，用鞭子抽，还灌狗屎，逼蔡利兼供认偷了多少油给谁？

在这次运动中，我也受了斗争。我是因为受一个汕头来的姓郑的犯人诱骗，说了毛泽东的坏话而被斗争的。姓郑的小子假装跟我亲近，在我面前首先说毛泽东干了那些坏事，诱导我说出对毛的不满，他然后去向王队长汇报。在斗争我时，郑犯上台来检举揭发我，说我在他面前说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千百万知识分子打进十八层地狱；还说在毛泽东的统治下，农民成了农奴，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王队长问我是否这样说了。我说：“是他首先对我说毛泽东的坏话的，我才跟着说了几句的。”队长叫一个叫谢泼滔的犯人帮凶，下死劲把我的双手绑得很紧，让我跪在地上，持续批斗我。我的双手麻木发紫，额头上的汗珠像雨淋一样往下滴。后来我晕倒在地上，王队长才叫人解开绑绳，把我抬进监房宿舍。过了许久，我慢慢的苏醒过来，神经失了常，口里学着狗吠，“汪！汪！汪！”地叫了几声，我心里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却无控制能力。接着大声说：“你们这些走狗爪牙，你们知道我会制造原子弹吗？待我制造出原子弹后，把你们全部炸死去！”我又起身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四脚趴走，跑出宿舍。二三个值星员看见我神态失常，跟着跑出宿舍。我爬到监房外的场地上，站立起身子，快速跑往二中队监房侧面的墙壁，像要撞墙，但到达那墙壁时我却伸出双手顶撑着墙壁，没有把身体撞伤。几个值星员把我拉回宿舍，叫我休息睡觉，我

才慢慢地静下来睡了。

次日早上开工，我睡觉不起来，王队长叫人把我拖起身。值星员将我昨晚的表现情况向队长及指导员作了汇报。刘指导员叫人拉我跟着大田组出工，出到监房外，我躺在地上不起来。刘指导员叫解放军拉来军犬，让军犬走到我身体前嗅来嗅去，想吓我。我依然不起身，刘指导员又叫人把我拉起，并推着我跟在大队的后边去工地。当日带队的是一个年青的小队长，他拿着一条小竹鞭来抽打我，推赶我跟着大队走。到了工地，各个犯人铲草劳动，我则躺倒在草地上。小队长又拿鞭子来抽打我，叫我劳动。抽打了一阵，见我不起，便由我躺在那草地上睡觉。到中午收工的时候，队长叫人把我拉起，跟着大队回到监房。经过一段时间前后，我的神经才渐渐的恢复正常。

生命如草芥

在这劳改场，人的生命如草芥，不知有多少犯人成了冤魂狱鬼。犯人在劳改场变成了奴隶，受到奴役和折磨。有的无端被打成残废，也有的默默无辜地死去。除上述的梅国华和曾爵仁被打死之外，这里再举几个我亲眼看到的例子。

一九七一年秋的某一天，大田组在解放军的武装监视下劳动，做铲草积肥工作。王队长规定每名犯人一天要铲草积肥一千市斤，上午五百斤，下午五百斤。每个犯人配给一把锄头和一担粪箕。为了完成任务，王队长把我们几个磨洋工的犯人与一些积极的犯人搭配为一个协作小组，让王犯监督我劳动。那天是到地名叫桃源坝的一个地段做铲草积肥。到达之后，插好边界旗，犯人不得超越旗界，若越过旗界则视为逃跑论处，武装人员可以开枪射击。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犯人自行选择一些长草密又厚的田基或水沟来铲草，但不得远离旗界。那天上午，有一个叫周树宝的犯人与郑明汉等三人为一协作小组，周铲草较慢，故由他负责把小组铲脱的草皮挑去过秤登记。他们选择了一块与旗界接近的草地。界旗只有四支，分别插在四个角头。看管的武装解放军站在离开犯人四五百米的小山岗上，居高临下严密监看。上午十点左右，一名小组的犯人正卖力着挑着草皮去过秤，周树宝抬起一担草皮过了秤，接着回头快步再去挑另一担草皮时，解放军在远处看去，看见他像是逃跑似的离开边界，立即开枪射击，接连两枪，把周树宝击倒在田基边。他的一条大腿中了三颗子弹，打了三个大窟洞；另一条大腿打了两个窟洞，鲜血直流。原来这枪是连珠弹枪，开一枪就连发五粒子弹，故开了两枪就打中五粒子弹，可算是弹无虚发了。

队长听见枪声走来看，发现周树宝被打伤，叫人立即把周抬往医院急救，同时叫所有的犯人集合收工。经医生检查，其中一条大腿有两粒子弹打中了大腿骨，把那条大腿截了肢。二个月后，三十多岁的周树宝支撑着拐杖回来，可怜他成了残废人，不能劳动，当局就安排他看管监房宿舍。

我所在的一中队有个犯人称王培光，原是广州市培正华侨中学的退休老教师，六十多岁，是个老儒夫老学究。据说他是在文革初期因为写标语，把“毛主席万岁！”写成“毛主席无岁！”被说他有意图污蔑毛主席，被判刑六年。来到劳改场一中队，队长见他年老，安排他与另一老犯人王贵顺一起去放牛。每天他们都早出晚归去放牛。冬天到了，有一天下午，俩人把牛群赶到大头岭的一片木薯地去吃草，见木薯已经成熟，长得肥肥的木薯露出地面。他们每餐只吃四两米饭，没有别的食物补充，总是感到肚饿，特别是在冬天，身体孱弱的人终日感到饥肠辘辘。于是俩人悄悄商议挖了薯放到火堆里去烩炙。烤熟后每人吃一条大木薯，甜香无比，吃饱后赶牛收工回来。回来后打了晚饭，觉得很饱，没有吃饭，把饭放在一边。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晚，不用开会学习，于是俩人觉得有些困，便洗了脚，早早地睡觉了。次日早上起床时，见他们两个人已经死在床上，尸体都已冷硬了。刘指导员见他们死了，也不追查原因，叫几个犯人把两具尸体用马车拉到监外的小山坡去草草埋了。之后打电报给他们的家人，说他们是患急病死亡的。

犯人在劳改场劳动，政府规定每月发给二元钱人民币，给他们买牙膏或肥皂等零用。劳改场规定每月给犯人买一次东西，有钱的人可登记选买一些用品和食物，如牙膏、肥皂和糖果、饼干之类的食物。有风湿关节炎的犯人，也可写申请报告买风湿跌打酒来喝。一中队大田组有个犯人称彭世荣，二十七八，他写了一个申请报告给王队长说他患风湿关节炎，申请买风湿跌打药酒。

经王队长批准，并给他买回一支半斤装的“冯了胜跌打酒”。星期六晚休息不学习，吃过晚饭后，各小组领回本小组的犯人所登记购买的物品，分发下来。因劳改场每人每餐只吃四两大米饭，没有其他食物补充，人人都经常在饥饿边缘。故每逢发放购买的東西食物的那天晚上，犯人便坐在自己的床位上，像饿鬼一样狼吞虎咽吃买回的食物。钱多的买上二三斤饼食，钱少的则买上半斤或一斤的饼干，肚子饿的就当晚把全部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彭世荣很久没喝酒，嘴馋得紧，他本没风湿病，但为了喝酒，他写了报告买药酒喝。那天晚上他登记买回了一支半斤装的跌打酒，一斤饼干，像是饥虎见到肉，猛吃猛喝，把半斤“冯了胜跌打药酒”喝得尽干，一斤饼干也吃完了。他喝得醉醺醺的，便在床上睡了。岂知这“冯了胜跌打药酒”是一种烈酒，酒性药性都极强，服量写明为一次 20-30 毫升。而彭世荣却把半斤 300 毫升的跌打酒一下子喝完。故睡到天亮时，他就一命呜呼上了西天。

当犯人向队部报告时，刘指导员走来看了一下，发现彭世荣的内裤遗有精液湿了，就说彭因为手淫而死。又叫二三个犯人用马车运到监外的小山坡去埋了。

统治者们草菅人命，劳改场如此多的冤魂狱鬼，有谁去追究呢？在那个年代，人命不值钱，死者的家属几乎少有追究狱方责任的，即便来查询，也是不了了之。

反虐待冒险越狱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政权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却于一九七二年二月来华访问。他的来访，除了中共表示欢迎之外，广大的人民都认为是一次愚蠢的举动，是出卖美国人民和自由世界人民利益的，是向独裁专制政权低头哈腰的表现。这时我们一中队的王队长就趾高气扬的对我们犯人说：“今天的报纸你们都看了，现在美帝的总统都走来北京，向我们投降谈判来了。你们不改造好自己，是没有前途出路的，只有死路一条。”中共借尼克松的来华访问，进行大肆宣传，为自己脸上贴金，对人民变本加厉地进行愚弄，事实上国家当时已经频于贫困停滞的绝境。

这时王队长对犯人的压榨有增无减。他每天都规定犯人要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对大田组的犯人更加严厉，不完成任务就扣饭菜来惩罚。一九七二年九月的某一天，大田组在小铁路边挖一条沟施茶肥。早上七点多钟来到工地，王队长宣布说：“今天每个人的任务是挖沟填埋基本肥，每人二百米，规格是 $0.4 \times 0.4 \times 0.4$ 平方米。完不成任务的，在中午和晚上都扣饭菜，完成百分之几就吃百分之几的饭菜。将扣下的饭菜奖给你们本组织超额完成的犯人，由各组值星员执行。”对于每次王队长规定的任务，犯人们都有对付的办法：有能力的拼命去完成；有关系的，利用验收的犯人值星员，弄虚作假地蒙混过关；而我不会搞关系，不敢弄虚作假，又不愿拼命干，故总是完不成任务。对于王队长如此肆无忌惮的压榨犯人的行为，我感到十分的愤慨。我想：“这四两米的饭菜是犯人的养命饭，给扣掉了，如何生存呢？”于是我作了思想准备，早上不愿多干活，留点精力，待九点钟担来早饭吃后

立即找机会逃跑。我注意观察了地理位置，知道小铁路边的花园种了很多的树木，逃跑是看不见的。

吃过早饭后，我报告值星员，假说去树林处大便。走到密林处，快速穿过密林，走出茶园，跑往大头岭的山路上。待我走后不久，饭后集合开工，不见我，值星员到处寻找不着，向队长报告，说我逃跑了。队长立即叫解放军武装人员带上军犬，到处搜寻，找不到踪影，于是叫各组犯人集合收工。

我走到大头岭，那里有一些农舍人家。我怕人发现，就钻进甘蔗地里，肚饿了，折断两条甘蔗吃了。后又走到番薯地里，挖了两条不大的蕃薯吃了。待到下午三点左右，我走出甘蔗地，观看了地形，不敢往有人家和屋的地方走，选择往北边的大山方向去。走在半途中，遇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他的肩上扛着一条林松木，手里拿着一把刀，看见我身上穿的是劳改场的服装，沿着山坡路往大山走去，断定我是逃跑的劳改犯。他叫住我，问我到哪里？我说上山去。他放下松木，叫我跟他回大队去，我不敢不从。他叫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叫我往大头岭大队部走去。走到大队部，他拿来一条绳索，把我绑在一间房子里，然后打电话给红星劳改场。他原来是大头岭大队的一名民兵营长，劳改场与该大队订有合约，大队捉到一个逃跑的劳改犯，劳改场给予一定的金钱奖励。

下午五点，曾大队长坐着一辆吉普车来到大头岭大队部，问明了情况，把我解押回一大队一中队。他没有打我，只问了我为什么逃跑？我说是因为王队长虐待逼迫才冒险逃跑的。回到一中队，他解开我的绑绳，叫我吃了晚饭。我以为当晚会开斗争大会来斗我，却没想那晚平静无事。

过了几天，王队长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批斗小组，叫值星员王长延犯人为组长，配备了几名帮凶打手，对我进行逼供。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召开了批斗会，他们要逼我供出逃跑的目的企图，因

为他们听从王队长的指示，认定我逃跑是另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的。而我从准备逃跑至被捉回，一直都说是因为王队长规定要我们犯人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完不成就扣饭菜，还要受斗争，我对这种虐待不满，故就冒险逃跑。他们斥责我把逃跑的责任推给王队长。批斗的地点被移到监内的犯人厨房内，一条粗牛绳把我的双手捆绑住，正准备把我吊到厨房内的梁上。恰好这时新升任一大队做教导员的孟教导员（即原一中队的孟指导员）因事走到犯人厨房，看见王犯等几个人正准备对我行刑，便问他们为什么要绑吊我。他们说：“是王队长叫我们处置他的，他竟然把逃跑的责任推到王队长的身上，不愿交代他逃跑的真正不可告人的原因。如果不绑吊他，他是不会交代的。”孟教导员对他们说：“批斗他是可以的，但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更不能搞逼供信。把他的绳索解开吧！叫他坐着交代就是了。”孟教导员又对我说：“你就好好的把问题交代清楚吧！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实事求是的说就是了。”孟教导员走后，王犯几个人围着我坐着，叫我交代，我重复说了一遍。他们觉得这样没意义，便解散回监房去了。晚上王犯把情况告诉王队长，王队长知道后也不再说什么了。

又过了大约十来天左右，王队长陪同一个一大队姓冯的司法股长来审问我，审讯在犯人医务室进行。冯股长首先问了我的姓名及何时开始劳改的？接着他问我：“你为什么要逃跑？”我就将王队长如何逼迫我们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完不成就扣饭菜，还要受斗争之事说了。我说：“我已服刑五年，只剩二年，是不想逃跑的。但是我受不了王队长的压迫和虐待，故才冒险。士可杀不可辱，王队长如此欺压我们，我宁丢掉性命，也不愿受他这样欺压。”冯股长说：“你是犯人，我们既可以杀你，也可以压迫你！”我说：“你们是共产党人，你们都知道马列主义有这样的一句名言：‘压迫越重，反抗就越大’，难道你们不懂得这条道理吗？你们不讲人道，犯人的内心会信服你们吗？”他们无言可答。

冯股长又问我：“你逃到大头岭后沿着上山的道路走，准备去哪里？”我回答说：“我无家可归，没地方可去，准备到深山里去做野人，像白毛女那样。你们说旧社会把一个农村姑娘变成了鬼，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你们却把我这样的一个大毕业生变成了鬼。”

冯股长说：“政府是希望把你们犯罪的人改造好的，我们某些干部在某些做法上可能有些不妥，但是可以改进。希望你以后安心改造，争取如期释放。”冯股长说后，将他对我的问话作了记录让我签字，并打了指模，便走了。从此再没人来提问我，也没有受到批斗，也没有受到加刑处罚。

十月，劳改场当局向在押的犯人传达毛泽东和周总理对关押犯人的批示：“对关押的犯人不许虐待，如今后再有发生，允许控诉。”要犯人进行讨论。我在讨论中发言说：“在这之前，我们犯人是受到过各种虐待的，对于那样残酷的法西斯式的行为，应该受到追究。”我的发言立即受到值星员王犯的批驳，他说我指桑骂槐，借题发挥骂政府。而刘指导员也支持王犯对我进行批评，说我借机会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刑满出狱再离乡

由于我在劳改场不积极劳动，又对当局虐待犯人不满意，王队长和刘指导员认为我表现不好，故一直都把我放在大田组里看管劳动。他们曾经把我放到过采茶组和杀虫组，但只有一二个月的时间。一九七三年冬，我的一件棉衣破烂了，要求刘指导员给我发件新棉衣，希望出监之后能继续穿。因为我家里很穷，出监之后是没钱买棉衣防寒的。而刘指导员却给我换来一件更破旧的棉衣，并且是补了又补的。我真想把它扔掉，但这粤北的冬天是很寒冷的，自己又没有其他的防寒衣服，故只得拿来穿着过冬。

一九七四年春节，我还有几个月就要出狱，故写了一封信给家弟，叫他寄一套衣服给我出监后穿。他当时回信说：“因为家里有六个孩子，生活困难，只给你邮寄一件旧的我穿的青年装，并寄上二元钱及一包糯米油炸果给你。”我知道兄弟生活困难，也不敢再要求什么了。当时与我同监的有一位声称是原广东师院的姓刘的青年政治教师，见我家里寄有食物，主动与我接近，说我快出监了，他送一套新衣服给我，是他入监前穿的。我见他如此关心我，便将家弟寄来的那点食物与他共享。到了四月二日，上级通知将到期犯人提前一个月到新成立的设在四大队的出监队去。那天早上出工之前，一中队几个到期的犯人都被叫留下往出监队，唯独不叫我。待我跟大田组的犯人出到监狱大门口时，刘指导员才叫我留下，回去收拾行李到门口集中去出监队。我急忙到保管仓里拿出被保管的旧衣物，收拾了被帐，把那件破旧棉衣丢了。走到监狱门口，刘指导员叫我把行李袋打开，翻出那套姓刘的给我的新衣服，问是否那刘某给的？我说是。他就把那套新衣服拿走，叫我与其他几个到期的犯人一起去出监队。

新成立的出监队设在四大队监房的侧边，原来是个工具房。我们到了那里，虽然住在监外，但吃饭还是与四大队的犯人同一个厨房，吃同样的饭菜。我们每天也去参加采茶的劳动，只是没有规定完成多少劳动任务就是了。

有一天早上，出监队的朱指导员拿来一封家信给我，家弟在信中对我说：“父亲已于一九七三年去世，当时我怕你伤心影响改造，故没告诉你。”我看后悲痛地大哭。朱指导员为人较好，安慰我，叫我节哀，并叫我不要上工劳动。我留在宿舍里，睡在床上，想到父亲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现在竟然不能再见他一面，痛哭了半天，眼泪都哭干了。后来我对朱指导员说：“我父亲已去世，兄弟分了家，母亲年老跟弟弟吃饭，我已无家可归，要求期满后留在劳改场就业，不再回家去。”朱指导员当时四十多岁，为人诚实，同情我，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过了十来天，他却出差去了，并且一直没回来。后来我找一个姓王的年轻队长再提出这个要求，可是他却说待朱指导员回来再说。五月中旬过后，场部已通知遣送我们回家了，朱指导员还没回来，我又向小王队长提出留场就业的要求。可是他不敢答应，按时把我送回连平老家。

那天，小王队长送我们几个刑满释放人到韶关，住了一晚。第二天，小王队长让其他几个人自行回去。他怕我不回家去，就亲自把我送到连平公安局，并住了一晚。次日一早他与连平公安局的人员一起，在办公室安慰我回家去，我伤心的对他们哭诉说：“我兄弟已分家，父亲已去世，母亲年老跟弟弟吃饭，我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已是无家可归了，叫我回去怎样生活啊。”连平公安局的人员对我说：“现在是农历五月了，生产队已有早禾割，你回去可以分到粮食。你回去安心劳动是可以生活的。”我继续流着泪说：“我回家去，家里没有锅、没有厨具，连一个碗筷都没有，如何生活呢？不如让我回劳改场去就业吧？”

连平公安局的人员说：“劳改场都已把你送回来了，怎么可

能让你在那里就业呢？你一定要回家去，现我再向领导请示一下，看能否给你一点钱，回去买些厨具之类的东西。”小王队长见他说后就走了，我待了一会，连平公安局人员回来对我说：“我已请示了领导，现在我们除给你车旅费外，再给你十六元钱。回去买些厨具，买把锄头，好好劳动。我们会打电话给你大队，叫你生产队分给你粮食，你就安心回去吧！”公安局已经给我买好了回大湖的车票，对我说：“这车票给你，你回到大湖，先到大湖派出所报到，然后回家去。”我领了钱，拿了车票，就走路到连平车站去搭车。

下午二点时分，我乘车回到大湖，去大湖派出所报了到，又到街上买了一碗便饭吃了。天下着毛毛小雨，我提着一小袋的行李，踏着沉重的步伐，慢慢的走路回家去。走到我家祖屋的对面小火坑口，看见这小火坑口的山咀里建起了几间新泥砖屋，我心里问：“我离家时，这里是没屋的，如今是谁人在这建了房屋呢？”当我走近那屋前时，碰见了我家生产队的会计火灵，他问了我几句，我问他：“这座屋是谁人建的？”他说是他与冬发几家人建的，因为他们几家与汪丑家还闹意见，故搬来这里建房居住。

我走到家门口，看见老母亲正在喂着小孙女吃粥。我提着小行李袋，含着眼泪叫了一声“老妈！”母亲抬起头，看见我回来，立即放开小孙女，也含着眼泪说：“寅儿，你终于回来了！”她接下我的小行李，叫我到家弟的伙房的饭桌前坐下，倒了一碗白开水给我喝。我问：“哥哥、弟弟他们去了哪里？”她说：“他们刚上工去了。”接着母亲向我说明家里现在的情况。她伤心地说：“去年你父亲有病屙血，我叫你弟弟买药给他治病，可你弟弟却说你父亲活着受苦，不如让他病逝去好。我看你弟真是丧失天良啊！他若肯买点药为你父治病，你父亲是不会这样早死的。他死时还叫你，还想见你呢！”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更悲痛万分。

我说：“弟弟当时没写信告诉我，直至上个月他才写信告诉

我，说是以免让伤心影响思想改造。”

接着母亲又说：“你嫂嫂在六八年因被抄了家没粮食，吃野菜多了，患了水肿病没钱医，死去了。可怜生下六七个孩子，没了娘，由你哥一个人来负担供养，真是艰难啊！现在那个最大的儿子明光已在三角被人招入门为婿了；第二的女儿才十七八岁也被迫跟人结婚去了。第三和第四的儿子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已经没书读，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还有三个小的，”母亲指着走到跟前的三个孩子说：“这三个就是你哥的孩子，一个男的两个女的。由于生活困难、没吃没穿，你看他们长得像条毛毛虫那样，怪可怜的。他们长年穿的是破烂衣服，吃的是杂粮薯片饭，又没菜送，多可怜啊！我每天都给他们衬衣服，又要给你弟喂小孩理家务，真是做不得那么多啊！”我听着母亲说着，又看见小侄们穿着如此褴褛的衣服，骨瘦如柴的样子，感到阵阵的凄凉悲痛。我没买回糖果和饼给这些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和羞愧。

黄昏时候，我哥哥和弟弟上工回来，我问侯了哥哥几句，他因要忙着去理家务，就走开了。他既是爹又是娘，种菜做饭，喂养猪鸡等事都要他理，故没时间我和长谈。弟弟问我为什么不留在劳改场就业而走回家来？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但他说：“你回家来，在生产队里劳动，是很艰难的。你知道生产队已分成对立的两派，不管你靠近哪一方，都会受整的。你回来是很难做人的，我劝你还是回劳改场去找领导，要求他们安排你在那里就业，在那里不会有那么多的是非。”我说：“我再回去不知他们接不接收哩？”弟弟说：“我主张你无论如何都要回劳改场去要求就业，态度要坚决些，他们若不同意，你就赖在那里不走嘛！看他敢把你怎样？”我感到很为难，但弟弟如此劝说，我只好答应过两天乘车回劳改场去。

过了两天，我用公安局给我的十多元钱作路费，重返英德红星茶场。去到场部，找到犯人教育处的曾处长，对他说了我的情

况，提出要求到劳改场安排就业。但是曾处长拒绝了我的要求，说农村来的一律回农村，只有城市户口的才能在劳改场安置就业。被拒绝后我不好意思赖在那里，就到冬瓜铺去搭火车到韶关，再由韶关乘汽车到江西信丰县。在信丰县城的一间小旅店住了一夜，次日由信丰县城乘车到大河公社，准备去黄泥坑生产队去找我当年在大河林场做工时认识曾屋生产队的曾队长。因为当年他曾留我在他生产队落户，而现在我就想去看看能否到那儿去落户。

当日中午我到了大河公社，肚子饿了，走到饭店买饭吃。饭店人员看到我穿的一件旧青年装的背后留印着“劳”的字样没洗干净，报告了公社派出所。我立即被拘留了，并送到信丰县公安局审理。信丰公安局人员认出了我，我就如实地把情况说了。他们立即去电连平县公安局联系，证实我是刚被释放回家而非逃出来的。我被关押了三四天，就被送进赣州收容所。赣州收容所是江西省赣南地区的一间不大的收容所，当时收容的是流浪汉和一些卖淫妇女。广东籍的人不多，要待收容到一批才遣送到韶关收容所。当我被送到韶关收容所时，一个青年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收容档案上写着“反革命犯”时，当场踢了我一脚，骂着我说：“他妈的，反革命释放犯也敢乱跑！”

韶关收容所比较大，收容了全国各地的人员，有流浪汉、小偷犯、逃港犯、卖淫妇女和由外省送来的收容犯，在广东各地收容的外省人也送到这里关押。我在韶关收容所被拘禁了七八天，就与一批收容犯一起乘火车押送到广州沙河收容中心。广州沙河收容中心是广东省甚至是全中国最大的收容所，这里每天有大批成群结队的逃港犯、流浪的知识青年和其他各种人员被收容和被遣送，送出一批又送进一批，很是热闹。那些逃港的或是流浪的绝大多数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抓进收容所，表现很乐观，嘻嘻哈哈的，显出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我在广州收容所被关了三四天，就与一批惠阳地区的收容犯

被用火车送到东莞樟木头收容所。其中有许多是从珠海逃澳被抓回的，没有想到竟然其中有两个是连平大湖落户的知青。在遣送中我与那个三十多岁姓聂的共戴一副手铐。我一问，知道他原来是广州下放来连平大湖公社红星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与爱人到大湖落户已经五年，由于流落到农村生活劳动不习惯，不甘心在农村，曾多次逃往香港澳门。樟木头收容所很大，每天从深圳送来成群结队被抓回的偷渡者，其中最多的是惠阳、东莞和广州一带的人，每天大批人马被送进送出。而连平与和平等山区县逃港的人很少，所以要待十多天才遣送一批。一天有一位收容所的工作人员的半导体收音机坏了，问有没有人会修收音机？我懂得收音机的工作原理，站了出来。那工作人员把我带进大门口的收容检查室，将收音机交给我。他说在调台时会产生沙沙嘈杂声，我反复调试，判断是音量电位器摩擦产生的，就叫拿来工具及棉花、煤油，将电位器拆开，用棉花蘸些煤油，反复洗刷了电位器，嘈杂声就消失了。收音机修好了，那工作人员还没来，我在那房间里等着，看见这房间里堆放着许多从逃港人身上搜下来的饼食、猪油白糖炒米粉，还有各种维生素和蛇咬粉等。我见没人，就偷些来吃。吃得差不多饱了，又偷了几个核桃酥饼和维生素粉放进衣袋里，以便带回监内分给同犯吃。后来那位工作人员走来，见我修好了他的收音机，就带我去食堂吃中午饭。他给我打来一大盘白米饭，一大碟猪肉和菜，让我一个人在那里吃。由于我刚偷吃了许多酥饼和猪油炒米粉，吃不下这大盘的饭菜，吃了一半就偷偷倒掉了，不敢让那工作人员知道。我回到监内后就把偷来的饼和维生素分给了姓聂的几个吃了。

过了十来天，当局把我们连平的四五个人与惠阳来的人一起押送到惠州市收容所，并在那里过夜。那惠州收容所人多面积小，拥挤得很，不但没地睡，站立的地方都很紧，我和连平的几个就在厕所边站了一夜。次日早上当局把我们押送到连平县收容所。

在连平收容所住了三夜，我和姓聂的三个人就被送到大湖派出所。大湖派出所把我关了一夜，第二天把我送回队，大队才把我放回老家。

路线教育与学大寨

七四年八月初的那天，我被收容遣送回到老家时，已经是黄昏时候，弟弟见我被送回来，没话可说。母亲见我回来，虽然伤心，却安慰我说：“寅儿，既然那里不收留你，你就安心在家吧！你以后就与你兄弟分开，一个人生活算了，不要依赖他们，兄弟是没得靠的。你父亲临终前也说过，待你回来后把我与你父亲建的房屋及家中遗留的物件分成三份，给你一份。这事我会跟你兄弟说。”我没话可说，答应母亲。

吃过晚饭后，母亲将我哥和我弟叫到面前，对他们说：“现寅儿已经回来了，也没地方可去了，就让他分开一个人生活吧！家中的房屋和物件，你父亲临终前也说过，待寅儿回来后分成三份。房屋每人就分两间吧，家具看有多少，分开用就算了。你们俩兄弟已经成家，唯独他没成家，应当照顾他一下。”哥哥和弟弟表示同意。

第二天，哥哥帮我在小廊舍里砌小炉灶，他给了我一个小锅，还拿给我十多斤米。弟弟给了我一个小镬煲和几个碗筷，母亲从他家里拿来几斤米及一些盐油。我就这样另起炉灶做饭吃，组成一家。过了几天，湖东的二姊听说我回来并分了家，挑来一担柴并拿来十来斤米及二斤油给我。生产队也分了一百六十斤稻谷给我，我就跟着在生产队上工劳动了。

我回家后每天晚上都陪着母亲，与她闲谈。她给我讲了许多有关生产队的人和事，讲汪丑与火灵及冬发等的为人。母亲说：

“汪丑虽然是个恶棍，但他有时也会同情我家讲些公道话。例如六八年，冬发带大队的人来抄我们家时，竟然指使他们将我和你父亲做好的两副棺材抬去。汪丑看见后立刻对那个带队的臭牙平

说：“这两副棺材是水姊在下寨时买的，你们不能搬走，亚驼发是想给那两个五保户的。”结果算留了下来。七二年冬，生产队在旱塘收锄蕃薯，你父亲跟在后面翻锄收漏的蕃薯地，偶然翻锄到一堆不知是那个社员有意埋下的蕃薯。火灵的弟弟祥秋是个复员退伍军人，他看见你父亲拾到那堆蕃薯，竟然说你父亲偷生产队的蕃薯，不但把蕃薯收了去，还叫队长冬发把你父亲绑在一株松树下。你兄弟也不敢帮你父亲说一句话，让他们绑你父亲。后来汪丑在家听说后走来骂祥秋和冬发，说：“这是某个坏社员有意埋下的蕃薯，是企图收工后来拿取的，说不定是你们自己呢！水姊是无意中翻到那堆蕃薯的，怎么说是他偷的呢？”他说后就走去把你父亲的绑绳解开，冬发等也不敢出声。”

有一天中午收工回来，我在厨房做饭。弟弟回来看见他的二岁的小女在小廊舍里拉了屎，弄脏了袜，正在大声哭喊。母亲则在厨房里炒蚬，放不下手。没想弟弟竟然大动肝火骂母亲：“你这个老不死的做什么来？孙女拉了屎都不理！”母亲听见后从厨房里走出来说：“啊！她拉了屎呀？我正在炒几个蚬子给你那几个大的吃呢！”弟弟不但听母亲解释，反而气着走进伙房，把在锅中炒着的蚬全部铲起丢到天井沟里去，大声骂着说：“你这老家伙真没用，人都不及几蚬子重要啦！”母亲见他如此，流着眼泪哭喊着说：“你两个大的孩子去摸了些蚬子回来，叫我炒熟给他们吃，难道就不是为你的儿女吗？只是一时间没有顾及小的拉屎，你回来看见给她换条裤子，洗一洗就是了。为何发那么大的脾气呀！我为你带大了儿女，以后你不需要娘亲了，是吗？别以为你现在动不动就可以骂我！好吧，我就分开一个人生活。”

我在做饭，听见弟弟如此大声骂母亲，母亲委屈地流泪，心里实在过不去，于是大声骂弟弟：“你这个没良心的反骨仔！母亲养大你，又为你带大六个儿女，现在竟然为了一点小事骂她，你还是人吗？你只会把母亲当作家奴来使唤，从来没有好好的对

待她，这样对得住天吗？”我又对母亲说：“老妈，他既然如此待你，你就与他分开，跟我一起吃饭吧？”

母亲对弟弟说：“好吧！从明天起，你将我的粮食分给我，粮食的钱由你负担，另分给我四个母鸡和几个小鸡。我跟寅儿一起生活算了，他也没个家，我要带着他成个家。你的小女孩我会照样给你看管。”

弟弟见我骂了他，又支持母亲与他分开，就跟我翻脸了：“你这个劳改犯竟然来骂我，还叫母亲与我分开。我以前给了你多少支持和帮助呢？你一点也不念及。好吧，母亲要分我就分给她，但你必须将我给你的那件衣服拿还给我，从此我们恩断义绝！”我见他如此说，立即将他寄给我的那件青年装衫丢回给他，他无情我也对他无义了。

有一天下雨没上工，生产队的会计火灵走到我房间，与我谈天，我心平气和的对他说：“我家与你家一向来没仇没冤，以前你们在这边老屋住的时候，你父亲每天都来我家与我父亲坐聊的。但是我却听说，上两年你弟祥秋竟然把我父亲绑在松树下，说他偷生产队的蕃薯。其实那堆蕃薯是某个社员有意埋下的。你弟怎就不分是非，也不讲情理呢？”火灵见我说这件事，没说什么，听后就走了。谁知他回他屋里，竟然跟队长冬发说我对他们有意见，还说我经常到汪丑家去坐聊，与汪丑搞在一起，跟他们作对。

九月中旬，中共连平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在全县进行一次“路线教育”，并且组成了庞大的教育工作团，开赴到各公社和各大队，开展“路线教育”运动。当时我们大队也派来一个工作组，我们生产队则派来一个名叫王文吉的青年队员，住在队长冬发的家里。工作队到来后，发动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这时火灵和冬发就利用这机会，煽动他们那边的人找我麻烦，借势整我。他们向王文吉汇报说我回来后与恶棍汪丑勾结，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说我是阶级敌人，要斗垮我。九月下旬的

一天，公社要召开一次斗争大会，斗争“反攻倒算的阶级敌人。”早上吃过早饭，冬发与火灵带着几个社员走到我家，叫我开门把生产队分给的粮食交回给生产队。我与之论理，冬发不跟我讲理，气势汹汹的拿起一把锄头，将我的房门锁打掉，打开门户，强行将剩下的一百斤稻谷收回到生产队的仓库去。说以后按月秤给我粮食，不去劳动就不给粮食。接着他们叫我立即到大队去开会。

去到大队，许多社员来了，我和一帮“四类分子”被集中起来。叫了几个民兵，押送我们到公社去开斗争会。会场设在大湖中学球场，十点左右，斗争大会开始，斗争三角和大湖的二三个所谓“反攻倒算四类分子。”我和曾汝启等“四类分子”被押到讲台的下边站着，陪着他们被斗争。我和汝启只是点名批判了一下，没有被拉到讲台上去斗争。散会后我无事回到家里，母亲也放下她对我的担心。

没过几天，冬发与火灵向工作队员王文吉反映说：“土霸汪丑霸占了我们老屋面前的那口鱼塘，那是生产队的，应当收回给生产队。”他们怕汪丑，不敢自己出来对汪丑说，只想借工作队的势力把鱼塘收回，他们还说我与汪丑每晚都在一起坐聊，相互勾结，一定说了许多坏话。于是他们叫王文吉把我叫去问话，对我说：“你每天晚上都到汪丑家去聊，都讲些什么？如实交代清楚？”我说：“没有讲什么，只说说吃喝之类的闲话。”他见我不说，竟怒气冲冲猛力朝我脸上打一巴掌，说：“你一点不老实，与汪丑来往这么密切，怎么会没什么说的呢？”我的脸被打得热辣辣的发痛，非常愤慨，但我忍着气对他说：“你怎什竟敢打人呢？”他板起脸孔说：“打你又怎么样？你还有仇报吗？”我说：“没想到你这个工作队员竟然如此野蛮不讲理。”他理直气壮地说：“对你这个阶级敌人就是要压迫，就是要专政，还讲什么理呢？”我忍气吞声不再跟他说什么，在黑夜中走回家中。事后汪丑问我：“他们叫你去问了些什么？”我就把王文吉叫我去问话

的经过告诉了汪丑。过了两天，王文吉去找汪丑说鱼塘的事，要汪丑将鱼塘交回给生产队。汪丑说：“不是我霸占生产队的鱼塘，而是生产队一连两年都丢荒了这口鱼塘不养鱼，我才拾来养鱼的。待我打完鱼后就给回生产队。”王文吉听他这样说，没有表示别的意见。而汪丑却问他：“那天你叫石荣去问什么来？你问他与我讲了些什么话是吗？”王文吉说：“石荣是个反革命犯，你要跟他划清界线，不要跟他来往为好。”汪丑对王文吉说：“我告诉你，那是亚驼发与牛牯火的阴谋，他们一贯以来都在生产队里孤立我，叫生产队的人不与我来往。现在石荣回来跟我有来往了，他们就怀恨，要整石荣，要他也不跟我往来，他们的用心恶毒。我不会听你们那一套的，我与石荣是邻居，坐聊闲谈是常事，有什么可问的呢？”王文吉见汪丑不听教育，他没犯大错，又是贫下中农，奈何他不得，再没说什么就走了。

接着，工作队在农村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要学习大寨人那样开垦梯田。于是各生产队的管教人员就发动和带领社员去开垦荒山，大搞梯田。我们生产队在王文吉的发动带领下，到旱塘岗的山坡上开梯田，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去把一个荒山坡开垦成一片梯田，没种什么东西，做了个样子给人看。那些种上了蕃薯、花生等的地段，由于没人照顾，杂草丛生，产量锐减。

秋收过后，路教队又发动社员大搞秋肥运动，要求每亩稻田秋肥二百担。牛粪、猪粪等加起来不够二百担的，就叫社员铲草皮做肥充数。我们生产队也在王文吉的推动下去割草皮积肥。为了计算工分，将铲的草皮挑到田里过秤，规定一百斤草皮多少工分。由复退军人祥秋负责过秤，王文吉负责登记数字。开始时铲的草皮较薄，后来冬发之女及祥秋的亲属钻空子，把草皮铲得厚些，含大量增大，祥秋照样过秤给其得工分。别的社员看在眼里，把草皮土铲得更厚，祥秋看见也不敢出声，照样过秤给其得分。于是你铲得厚，他铲得更厚，到后来则完全锄泥土去过秤，甚至

有的连石头都挑去过秤得工分。我为了争多点工分不至吃大亏，也把草皮铲厚了许多，但不像那些社员那样拼命为争工分而把石头都挑到田里去。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路教工作队回家过年去了。过了年又在县集中后回到各大队和各生产队。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全面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铲除资本主义尾巴。这时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农村进行限制社员的自由地的工作，规定每人三厘（即 0.3 分）地，经丈量多出来的归回生产队。同时不准另行在荒地种任何作物。我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了十多二十株的木薯，四月下旬冬发和祥秋带着王文吉与几个社员走狗走来，看见我种的木薯生长得很茂盛，说要砍掉走资本主义的尾巴，把木薯锄掉了，并将根都挖起丢到水塘里去了。我哥在屋角的水沟边种了几株绿竹，生长得很茂盛，长出很多竹笋，他们也走去把竹砍掉。我们兄弟看着，任其为所欲为，无可奈何。

四·五运动再逃难

一九七五年六月，下乡的路线教育工作队撤走了，农村稍为平静些，我也较为安心些。一九七六年元旦过后，我们生产队的冬发让位给复退军人祥秋当队长。祥秋也是个共产党员，一向表现“积极”，如今当上了生产队长，显得更神气了，正是脚踏牛屎行官势啊！三月下旬的一天，生产队全体社员都担火土肥去鹅公坑撒禾秧肥。我也用粪箕上了一担火土肥，跟着挑到鹅公坑的田里去。过了咀头河，走到鹅公坑的山坑边，新队长带着一班人带头到了对面较远的坑田去撒秧肥，后面跟着的人则由远到近的排下去撒肥。我也跟着排到一块较后尾的秧田去撒肥，撒了一半，队长祥秋在前边大声叫喊说：“前边还有一块秧田没人撒肥呀！后面的人快挑过来。”跟在我后面的还有人，他们贪近不肯去。祥秋走过来，见我在较近的一块秧田里撒着肥，就拿我来出气，说：“你这个劳改犯也敢不听指挥，远的不去撒，贪近的撒。”我听见他骂我，我也回骂他一句：“你这个阔口鳅，不问情由就乱骂人，我是跟着下来的，也不知道前面没人撒。”他见我顶撞他，就气势汹汹地走前来说：“你这个劳改犯也敢顶嘴骂我，看我打死你！”他下到水田里，捏紧拳头向我打来。我也很气愤，拨开了他的拳头，一掌把他推倒在水田里，并上前用双手把他压在水田里。这时与我在同一块秧田撒肥的与他较亲近的社员把我拉开，拉起祥秋。祥秋起来后，正要再跟我打，他的老婆跑来说：“你不要跟他打，他是会跟你拼命的啦！你就带他到大队去，让大队来处理嘛！”冬发也走来骂我，叫我把送到大队去。我丢下粪箕，让侄儿拿回家，与祥秋到大队部去。

到了大队部，大队干部正在开会。祥秋叫来治保主任，把我

带到一个房间，说我打他贫下中农，要大队处理我。正说着，祥秋的两个兄弟走来，大的叫结春，第二的是火灵。他们走进房间，拿起扫帚柄就打我，被我用手挡开。治保主任叫他们不要打，让大队处理。治保主任拿来一条牛绳，把我的双手挂着脖子绑着，并绑在大队院内的一棵苦楝树下。这时祥秋还没走，他见院子里没人，走前来用拳头打我的胸部，我被绑着避不开，被打了二拳，我立即大声叫喊：“哎哟！祥秋打人啊！”大队负责民政的干部走出来，见祥秋打我，就制止说：“是他打你呢？还是你打他呢？你把人交给大队处理了，怎么还要打人？”祥秋被说，灰溜溜的走回家去了。不一会，大队治保主任与党支部书记商议，决定叫走狗臭牙平和亚仁牯绑着我去游村。他们给我挂上“打贫下中农”的黑牌，从过涧屋游经上下寨，再游至岭背与新塘屋，每到一处人家就逼我大声叫喊：“打贫下中农的！”我本来是被打而还击，却反而被说打人，还要受处罚，天理何在啊！这是怎样黑白颠倒的世界！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北京百万群众上街，借悼念活动表达了要求民主自由的意愿。伟大的四·五运动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受到镇压。各地追查“反革命分子”，上令下达，要求各地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我们大队也召开了社员大会，捉我和右派分子曾汝启去斗争。汝启在被批斗时被臭牙平踢了一脚。这臭牙平是汝启的叔伯兄弟，自土改以来一直充当共产党的爪牙帮凶，在土改中斗死了治平的两个老婆。现在他又不顾兄弟情义，不是大义灭亲，而是无义灭亲，想争取立功。我则在被批斗时被亚驼发打了一巴掌。

我意识到北京天安门的四·五运动是五·四民主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虽然当局镇压了，但是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也说明国内的时势动荡不安，人心思变。我也意识到自己随时都会遭遇到残酷的迫害。母亲日夜为我操心而不安，她希望我能逃过这黑暗的

岁月。正在这时，和平县合水眼坑朱屋的一个青年来家找我哥哥买蕃薯干片，他叫朱亚环，二十三岁，曾多次来家与家兄买薯干片，我母亲认识他。这次他走来，家兄和我都上工去了，母亲与他交谈说起我的事，问他在外是否见到有人家招女婿的？朱亚环对我母亲说：“在惠州博罗地方曾见有一户人家，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子现已有二十岁，是想招一个女婿的。我就给你二儿子做个介绍吧？”母亲听后十分高兴，便叫他为我做介绍，朱亚环满口应承。中午我收工回来，母亲对我说知此事，还说亚环是好人，他对我们家是很同情的。我听母亲的话，也想逃离这灾祸之地。于是在母亲的促使下与朱亚环见了面，并与他商定了何时跟他到惠州博罗去。他约定我过两天到他家去，母亲为我卖鸡蛋卖得六元钱给了我做路费，叫我偷偷地离开家，让我不要挂念她。过了两天，我走到眼坑朱屋，找到朱亚环。他家是贫农，生活很贫困，家中有一个盲眼的娘亲四十多岁，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妹妹。他没有结婚，经常不在生产队劳动而到外地去游荡。我去到他家，他让我在家里住一两天，待他办完一件事后再带我去博罗。第二天晚上，他说他的事还没办好，叫我再待两天。而我在他家住着吃着，看到他家如此贫困，吃的是薯片饭，又没菜送，感到很不安，催促他尽快带我走，但他说：“我的事还得多两天才能办妥，你要去的话，我就将我朋友的姓名地址写给你，你一个人先去找他，我过两天就来。那两位也是姓朱的青年朋友，我曾卖给他们一批木材。现你去到他们家里，就说我有一批木材要卖给他们，过两天就到，你们在他们家等我。”我按照他说的话，于第三天早上搭上和平至惠州的客班车，到了惠州北岸，下了车，根据亚环写给我的路线地址，沿着东江往下游的岸边走，于下午二点时分找到了那两位青年朋友。我对他们说假话：“我与朱亚环放木排到惠州，在惠州卖了一批木材，亚环在那里等收钱，叫我先来你们这里，还剩下一些木材想卖给你们。现我在你们家等他，

他过两天就来。”我说的是假话，但他们很相信，并且对我招待得很好。其中有一户青年的家里是养鸭的，他家里放养着四五只个母鸭，生活上还过得去，每餐都有荷包鸭蛋送饭。我在他们家里待了两天，亚环没有来，这时我怀疑起他来，他可能是欺骗我，不会再来。于是我就对那两位朋友说：“亚环不知怎的，说叫我在你们在这里等两天，现在都过去两天了，还没有来。我明天想去看看他究竟怎样？请你们借给我五元钱，到时再还给你们。”那两位朋友说：“你去看看也好。”就借给我五元钱。我借了钱走到惠州市，断定朱亚环不会再来，就乘搭客轮到广州。到广州后没了车费，就走去天光化工厂找我大姐夫的侄黄金瑞。跟他借了五元钱，乘火车到韶关马坝，去找在南华大队居住的我父亲的堂弟曾祥信。到了南华大队，我先去找到二个在春节时曾来家乡找亲房的青年宗亲，他们招待我住下，第二天才去找堂叔祥信。祥信原在下寨居住，抗日前移居曲江县马坝南华村，现已有三四十年没回过连平大湖。前几年他是南华大队的党支书，现听说已调去马坝鱼苗场当场长去了。那天我去到他家，他不在家，见到堂叔娘，留我在她家吃了一餐中午饭。第三天，我告别了那些宗亲，走到马坝鱼苗场，找到了堂叔祥信。他问了我的名字及我父亲与本家族的情况，但我不敢告诉他我现在的情况和处境，怕他知道后不欢迎。他留我在场里过夜。次日吃过早饭，他上街去了，我走到附近的马坝火车站，见铁路周围有许多小铁块丢弃在地上。我想到自己身上没有钱，就去收拾那些丢弃的小铁块，想去废品收购站卖几个钱。正当我在拾捡那些小铁块时，祥信叔从铁路的那头走过来，看见我拾捡那些小铁块，便问我拾来做什么？我如实地对他说：“我已没有路费回家，想将收拾到的铁块拿去收购站卖几块钱来做路费。”他对我说：“不要拾它，那些铁块铁路局还要的。你跟我回场部宿舍去吧！吃过午饭我会给你路费。”我丢下那些小铁块，跟着祥信叔回到他住的宿舍。他做了午饭给我吃

了，拿给我五元钱作路费，叫我回家乡去。

我拿了钱，拿了自己的小行包，与他告别走到街上。我不敢回家，在街上徘徊了一阵，想到：已无处可容身，不如买本修理收音机的书，到农村的人家去，看能否混日子？于是到书店买了一本书，又到服装店买了一件白布料的夏衣。到车站看了一下交通地图，选择到仁化的农村去。我沿着去仁化煤矿的一条公路走去，从下午二时开始走，路上很少人家，经过了许多荒山野岭，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道走到何处？到了黄昏的时候，才看见一村庄，我看到天即将黑下来，于是就走去借宿。我走到一个大围屋前，向一个老农民借宿，问他说：“老伯，我路过这里。天就要黑了，想到来借宿一夜，可以吗？”话还没讲完，一个青年干部走过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有证明吗？”我说：“我是下乡修理收音机的，没有带证明。”他说：“修什么收音机？怎么没有证明呢？”他说着又叫我把小行包打开让他检查。他打开我的小行挂包，翻了一下，只有几件衣服和一本修理收音机的书，便对我说：“你说下乡修理收音机，不但没有证明，一个电烙铁和一个螺丝刀都没有，怎么修理收音机呢？你可能是逃跑的反革命犯吧？你跟我到大队部去！”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他拿着手电筒把我带到大队部去。

黑夜被逼上梁山

我当时被那个村干部送到他们村的大队部，大队部里只剩下一个大队长还没走，他的房间里点着一盏微弱的煤油灯。青年干部把我带进去，说了我的情况，把我的小行包收了去，说代我保管，明天再给还我。然后就把我关进一间漆黑的房间里。他们走了一阵后，我从门窗往外观看，大队部里没人住，也没有电灯，整个村庄都看不见灯光，到处漆黑一团。我想：“明天他们一定会把我送去公安派出所的，怎么办呢？”我想到逃走。经过一番观察，我发现那门很松动，可以弄脱。于是我把门搬脱，逃出大队部，沿着侧边的马路慢跑逃走。周围一片漆黑，马路也模糊不清，我不知东南西北，只顾沿着马路逃。走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满天乌云骤起，狂风大作，狂风暴雨来临，雷鸣闪电不断。我从闪电的光亮中看到前面的荒地里有一间小茅棚，就走到茅棚里去避雨。狂风暴雨很凶猛，几乎把茅棚推倒，下了一阵才慢慢变小。这时我感到肚子很饿，身子也很累，很想在茅棚里睡一觉。但是这荒山野岭的蚊子特别多，也特别凶，哪里能睡？就是站着也有许多蚊来叮。我站了一阵，看见雷雨渐渐的小了，就离开小茅棚，再沿着马路往前走。走了许久，看见前面有灯光。再往前走，走近灯光处，看见前面写着：“黎市火车上落站。”那时已是深夜十二点，我走进待了一会，看见有一些人陆续走来乘车。不一会，一节南下广州的慢车停了下来，有一些旅客上了车，我没买车票也跟着上了列车。我走上车，上一节车箱里的一个空位上坐下。夜深人静，大多数的旅客都在睡觉。我虽然劳累，但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着：“现在处境如此，到何处去？怎么办啊？难道去投河自杀吗？不可！只有造反死的，哪有饿着等待死的？”我又

想到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人物的故事，其中有许多都是被逼上梁山的。“现在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怎么不向他们学习呢？”我看见列车的行李架上放着许多行李包，大多数的旅客都在黑夜中睡了觉。于是脑海里萌发出：“现在只有去偷才能生存”的念头，就想着如何去偷窃旅客的行李包。列车经过韶关站和马坝站后，我注意观察列车上的旅客的动静，当列车到达乌石上落站停下来时，我迅速从行李架上拿下一手提袋，立即走下了车。下车后我沿着铁路线往前走。走了一个多钟头，天蒙蒙发亮，我打开手提袋看，里面装有二套的确良衣服，还有三十五元钱和几斤粮票及一个海鸥牌手表。这时我感到自己在绝处中逢生了。又继续走了许多路，走到了大坑口上落站，我买了几个大面包吃了，没处可去，又乘搭南下到广州的列车到广州。接着到大沙头客轮站乘坐客船到惠州，在客船上我甜蜜地休息睡觉。到达惠州后又乘搭和平客班车到合水眼坑，当班车经过大湖、绣缎时，我不敢下车回家，还带上口罩怕被人认出。到了眼坑，我没有去找朱亚环，而到张洞坑尾找大姊。在大姊家住了一晚，第二天走到合水公社伞柄厂找到表侄，他知道我的情况，并告诉我：“朱亚环偷他大队的化肥，被大队干部捉住，送到合水公社派出所审查时说是你叫他偷的。我听说就不相信你会叫他做这样的事。但我担心你会被连累，他现在还关押在派出所里，就在我们厂的隔壁呢。我劝你午饭后就离开这里吧！以防不测受冤屈。”我听了表侄的话，才恍然大悟，原来朱亚环说要办的事就是去偷大队的化肥。他被捉住后为了脱身，竟然想嫁祸于我。

表侄招待我吃过午饭，我就走路到和平县城。我已走投无路，只有继续走上梁山的路。于是我又从和平县城乘车到定南、龙南转到韶关。在韶关火车站休息，待到夜晚才乘南下的列车，又重复偷了一次旅客的物品，偷得的是两个腊猪头。在英德的连江口待到天明，拿到街上去卖，卖得十元钱。接着又乘列车北上到黎

市，在那里待到天黑，又乘搭南下的列车。当列车在马坝站停下时，我又迅速偷了一个旅客的一只大行李袋，走下车出了站门。这时天还没光，我提着大行李袋走在街上，在灯光下停下来翻看里面的东西，里面有一张单被和一顶蚊帐，单被里夹有五元钱，还有几件粗布旧衣服。我将五元钱拿了，其余东西想丢掉，但又觉可惜。故就提着在街上走了一阵，天还没光，没处可去，就走回马坝火车站，当我提着大手提袋进到车站候车室坐定时，车站工作人员把我捉住，说我的提袋是刚才扒窃来的，把我带进车站派出所进行审问。一个钟头后，那位乘客到达英德接到通知，返回到达马坝车站。公安人员带他来认领他的行李袋，他看了是他的，并说还有五元钱，公安人员就从我身上搜出五元钱还给了他。他是一个去做工搞副业的社员，对我的扒窃行为很气愤，把我打了两巴掌才走。这时我的内心也感到十分难过，我原本不会偷东西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小偷，我为此感到惭愧和悲伤。这是谁的罪过呢？

到了早上八点多钟，车站派出所审问了我的扒窃行为，记录和整理后，就把我送进韶关市收容所。这次我是被关在收容审理室里，这审理室关押的是在本市行窃的小偷、扒手及卖淫的妇女，其中有几间男室和一间女室。凡是被关进这收容审理室的犯人，都要经过一番审理过程，然后或是给其定罪，或是遣送回乡。这一过程一般都要二三个月或半年。

我在那收容审理室里，经过两次的提审问话后，就在那里关押着等待处理。关押多的那间房间有五六个青年人，都是扒窃犯和小偷犯，其中有三个是下乡的知青，一个是从印尼回来的归侨。他们被关押着都很乐观，或是唱歌，或是谈天说地，也谈论目前的国内形势。说到天安门的四·五运动，大家都说这是五四民主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他们议论说：今年是大灾年，唐山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刘伯温的烧饼歌“山崩、石殉、猪死毛脱”已应

验了，山就是孙中山，石就是蒋介石，猪就是朱德，他们都相继去世了，接下来的便是毛泽东；据说清远某地的农民发现青蛙拿着草棍打群架，在清末宣统三年时也发生过这一现象，这是改朝换代的征兆。

我对他们所说的事，感觉到很新奇。我也跟着他们唱那着知识青年自己创作的歌：“十八年的恩情我怎么能忘？是娘啊把我哺育成长。娘啊娘！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您的身旁？姑娘的爱情我怎么能忘？是姑娘的爱给了我力量。姑娘啊姑娘！什么时候？才能与你同枕共房？”那个从印尼归国华侨教我们唱印尼民歌：“有谁能了解我，有谁能了解我？只有春风啊！春风啊知道我的心伤。”

由于在收容审理室的时间很长，当局经常从关押的犯人中收几个出去劳动做工，去农场种地或是去某建筑工地清理基地，利用廉价的劳动力。那些犯人也乐意出去劳动做工，一方面可以多吃一餐中午饭，另方面则可以乘机逃跑。曾经有过多有犯人在外劳动时逃跑的，有的被捉回来打得半死，也有的没有捉回的。九月初的一天，当局来叫了几个人去公安局搞基建劳动，这时我也有出去劳动并乘机逃跑的思想准备。于是我把偷来的一件白色的确良夏衣送给了被收容关押了半年的原和平中学的右派老师欧阳亮。次日早上我穿上二条涤袜准备出去劳动逃跑，吃过早饭后当局又到门口叫人出去劳动，犯人争先恐后的要去劳动，我也挤到门口，没想到竟然获得同意。我们室的三个人被带到公安局去搞基建挖墙沟。中午当局给我们午饭吃，叫我们不可乱走乱动，饭后就地休息一个钟头。我进入公安局劳动时就注意观察了环境，看到由于搞基建，大门打开没人守门，完全可以逃跑出去。吃过午饭后，我便对另两个同犯说去大便，他们警觉地看着我，我转了一个弯就溜出了大门，跑到大街后又转了几个横折街。一会儿他们报告当局来追，哪能寻见个踪影？

我转了几条小街，然后沿着东南方向的大街走。走到韶关火

车门口，我不敢停留，直沿着铁路往韶关钢铁厂的方向走去。经过钢铁厂，走到山背小站，看见一列南下的火车停在站上，我没买车票就走上了火车。列车于次日三四点钟到达广州站，我乘人多拥挤的机会走出了站门。天还没亮，我就在火车站门外大草坪上躺着休息，待到清晨又乘霸王车到中山七路线找我大姐夫的侄借钱。这次他却不高兴地对我说：“你怎么老是走来跟我借钱呀？我又不欠你钱，现再给你五元钱，以后就不要再来啦！”我感到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老来打扰你。不过我是出于无法的情况下才跟你借一点钱的。”我接着立即去买早餐吃。中午又吃了一元多钱的饭菜，没地方可去，又去火车站草坪休息。下午三四点钟我买了一张一元多钱的到花县的火车票，在候车室待到六点多才上车。到达花县时我没有下车，而是继续乘车到英德。到达英德车站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多，我看见行李架上有一小手提包，就取下那手包急速下车。怎知车站守得严，我的车票是超站的，被留着补买车票。但我没钱，就被送往车站派出所审查。而失物旅客已向车站派出所报了案，说明被扒小手提包内有一套衣服和三斤花生米。派出所人员检查我的小手提包时发现这是报案旅客的失物，于是把小手提包收了去，并断定我是扒手，对我进行审查。当时我如实地说出了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又说自己是想下乡去修理收音机的，由于遗失了钱物，才扒窃别人的东西。清晨八九点钟，英德车站派出所与连平县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证实我是连平县大湖公社的人，于是当日中午就派人把我直接遣送回连平，经过翁源县，当晚在翁源县拘留所待留过夜。那天晚上有一个被拘留的当地人偷偷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毛泽东已经剩下一点气啦！很快就会死的啰。”我当时对他的话不太相信。可是当我被遣送到连平收容所三天后，九月九日的有线广播喇叭真的响起了毛泽东死亡的挽歌。

四人帮垮台与公社瓦解

我被遣送到连平县收容所，过了三天，便传出毛泽东死亡的消息。又过了两天，才把我和另外两名收容犯送回大湖派出所。派出所关押了我二天后把我绑着送回大队，大队治保对我训了话后，放我回家。回家过了三天，大湖公社要在大湖中学礼堂召开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同时要批斗四类分子。三角和大湖某大队各有一名四类分子被捉去受批斗，我也被捉去批斗。首先批斗三角和大湖的那个，说他们听到毛泽东的死亡消息后，在家里杀鸡杀鸭来庆祝，批判他们妄想变天。接着批斗我，大队党支书曾魁阳批判说我乱走乱动不守法，说我穿的的确良衣服是在外偷来的，要求派出所审查我。我被批斗后留在派出所进行审查，王指导员问我是否偷了东西而被送到韶关收容所？我则编造说：“就是这次被捉住送回来的。”他觉得我是从公安局里送回来的，没什么值得再审查了，于是就罚我劳动扫地。中午扫完地后，他还给我一钵饭吃。下午二点时分就放了我回家。

我回到家里，在母亲的安慰下，渐渐安下心，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二十天过后，“四人帮”被抓，全国各地庆祝“四人帮”被打倒。我也对此感到高兴，因为我认识到四人帮是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极左路线对人民特别是对我们这类人的危害更大，它是一条残无人道的法西斯主义的路线。不久后有一件更令我高兴的事：我们生产队复退军人祥秋在当上队长之后，由于表现积极，于八月被大队调去做大队代销店当代销员，但没做上两个月，竟然伪造失窃案，被派出所识破后，解职回到生产队，从此低下头不敢再威风了。我在家生活劳动也再没人来欺负。我于秋收后分得一份口粮，但还超支欠生产队十多元钱。

一九七七年元旦后，生产队改选了队长和队委，冬发挂名为正队长，汪丑的二弟泽林为副队长，我弟弟也被选为生产队委员，参与生产队的事务。冬发和火灵也不敢再兴风作浪了。这时我跟汪丑的二弟泽林商议为生产队搞副业，从事脱产的修理收音机的工作，每月给生产队二十四元钱，生产队记给我三百分工。泽林与火灵等几个队委商议后同意我脱产搞修理工作。于是我于一九七七年二月开始，在绣缎街每逢集市月就到街上去摆摊修理收音机。因为当时当地还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所以很受社员群众欢迎，纷纷把坏了的收音机送来给我修理。可是我刚在绣缎街摆摊二三个集市日，就受到极左路线的走狗爪牙曾冲平的阻挠，说我是四类分子，不许我搞修理工作。我当时不敢对抗他，只好待在家里搞修理，知道我的社员就把坏收音机送到我家，或者请我到他们家里去修理。我搞维修工作是白手起家，只有一把尖咀钳和一把小螺丝刀，没有电烙铁就用小铜头和煤灯，没有电表就用小耳机来检查，没有零配件就收买别人丢弃的烂收音机来拆零件。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也打开了门路，慢慢有了一副家当。

七七年三月初，生产队的会计火灵与汪丑的大儿子亚木在我屋前争吵起来，火灵被亚木打了两下。火灵就气着说：“你这样蛮不讲理，我们跟你们分队！”亚木顶着说：“你分吧，你敢分我们就敢接。”火灵说：“好，我回去跟队长说清楚，马上就分，免得与你们吵架。”火灵回到他屋里，对冬发说：“冬发哥，今天上午汪丑的儿子亚木与我争吵，他动手打了我两下，我没有还手。现在汪丑那两个儿子长大了，以后会跟他们发生更多的争吵打架。我说了与他们分队算了。他们也同意分，你的意见如何？”冬发说：“分队我是没意见，就怕大队不同意来找麻烦。”火灵说：“这个你就不用怕，我们双方同意分的，双方说好，并且跟社员说清楚，若大队有人问，就说我们是分小组作业。”冬发说：“既然如此这样，那就分吧！免得与剃头品一家闹鬼气。”

第二天，火灵走来对我说：“我们决定与汪丑分队，你和你哥赶快决定跟谁共队，以便分土地，分种子和耕牛农具等。”我当时想：“冬发与水灵心术不正，会狗伏人势压整人，不可靠；汪丑则是势利小人，与他没利害关系时就没什么。”于是我劝哥哥与我跟汪丑家族共队，而弟弟则劝我和哥哥与冬发共队，由于我们对冬发与火灵厌憎，故我们两兄弟就决定跟汪丑兄弟共一个队。我把决定告诉火灵后，他便立即与汪丑之弟泽林进行分田地及财产。因为火灵很怕汪丑一家，故在分田地中总是让泽林占便宜，靠近我们这边屋前的水田给了我们组，他们分的则是较远些的水田。分队后我们组的泽林做队长，他立即将全部的旱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生产队只耕种水稻田，他也同意我继续为生产队脱产搞修理工作。我与母亲两人分得六分多旱地，自己种上了花生和大豆，收得大豆二三十斤，花生晒干后九十多斤，比生产队时多十倍。夏收时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也比分队前增产三成，我与母亲就分得四百多斤的稻谷。火灵看见我们生产队把旱地分给了各户耕种，他们也在夏收后把全部的旱地分到了各户，社员们也乐意接收。

在这期间，我们大队也有另外一二个生产队分了队，别的大队也有些生产队搞分队的。这些分队的现象经大队和公社反映到县委，中共连平县委决定再组织路线教育工作队下乡，要把各地分队及分田的风气刹住，把农民拉回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公历九月，我们大队派来一个工作组，我们生产队派了两个工作人员住到汪丑家。路教工作队来后，知道我们生产队和岭背生产队分了队，就办队长学习班，对各个队长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要求他们不要分队，分了的要合并回去。我们生产队被叫去学习的冬发、泽林与火灵表面上答应合并，但却是名义上合，实际上分。工作人员来时就说是分生产作业组，实际上是分生产队。而岭背生产队的队长则顶着工作组人员说：“你们一定要我们合为一个

队的话，我就不当队长，就让你们工作组的人员到来当队长吧！”派来的工作组人员对这感到无奈，就只有闭着一只眼，任由他们去了。

一九七八年，各地出现了更多的分队现象，也有分田包产的。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泽林则分给每个社员三分水田去耕种，由各户人家自己选择种子播种和插秧，由各户管理和收割其余的还有六七分的水田生产队集体耕种管理。这时我弟及其生产组的人对我说：“现在你们生产组又分了三分水田给每个人耕种，剩下的水田不多了，你就不要再给生产队搞副业啦，没有必要再给生产队交副业款嘛！有人送收音机来收理的话，你可在家利用空闲的时间修。”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但我又怕汪丑这个小人不会放过我，他会从各个方面来整我。故我还是继续做脱产修理工作，每月仍旧交钱给生产队。我与母亲分得的六分水田就利用三几天时间并请侄儿们帮忙插秧，到收割时又请他们帮忙，六分地也收得三四担稻谷。我哥哥一家则分得亩半地，收得八九百斤谷。大大地增加了粮食的收入。火灵生产组和别的邻近生产队见我们分田到户没事，各户人又增产增收，于是火灵的生产队也于秋收后把全部的田地分给各户耕种，别的生产队和大队也陆续把田分到户，公余粮则分给各户去负担。这样，各生产队名存实亡，人民公社也已解体，恢复了旧时的单干户耕田制度，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度中自行解脱出来了，成了自由的农民，不再是公社化时农奴了。

当时中共新领导方面也看到了“人民公社”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集体制度是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故就放手任由农民自行分田到户，让公社制度瓦解。他们后来把农民分田单干说成是包产到户，说成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当时来说，中共的新领导层可以说是顺从了民心 and 民意，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七九年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增产和增收，农民们的生活也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官吏欺善怕恶抢民财

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共连平县委再派路线教育工作队下乡，对农村的生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企图整合已经分裂了的生产队，防止公社的瓦解。可是没想到大多数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不听话，整合不了，无可奈何。农历十二月初，农村即将过旧历年。估计过年时农民社员将会大量杀猪过年，于是中共连平县委发布指示：农历过年，各生产队和社员一定要完成上调生猪任务。超额完成的，政府以六成计牌价、四成计市场高价收购或社员自留过年用。没完成上调任务的，一律不准私自宰杀生猪。如有发现，一律没收。

各大队的路线教育工作队为贯彻执行县的指示，召集了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干部开会，宣读和传达县的文件，要求执行。路教工作队人员将于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离开各大队，这时各生产队干部和群众听后都置之不理，他们有猪的都准备杀猪过年。

正在这时，我弟媳介绍了她的姨甥女给我大哥做儿媳妇，并确定于十二月十六日来家进行双方见面相亲。按照地方风俗，相亲后还要猪肉作礼品送给女方的亲属，估计需要十多斤。于是家兄与家弟商量此事，家兄没有养大猪，家弟养有两头大肉猪。弟弟为帮助哥哥能娶上儿媳妇，主动借给哥哥一头大肉猪，并决定于十二月十五夜把肉猪杀掉，除当日食用外，余下的就准备用盐腌着，待到年二十六过门成亲时用。

他们当时没有叫我去商议，商议后也没有告诉我。我若知道他们要杀生猪的话，我一定会劝阻他们回避那风头火势的。他们商量决定后，于农历十二月十四日去清除猪栏粪，将二头大猪放出野外，不料给坏心肠的剃头品汪丑看见，他估计我弟今天晚上

一定会私杀生猪。他心怀叵测，想借刀杀人整我弟。于是当天下午四五点钟时特地走去大队部报告，对大队党支书曾魁阳说我弟今晚准备杀猪，要他们派人来侦查。

那天晚上八点钟我吃过晚饭后，没事就走到下屋汪丑弟弟家坐聊。聊了许久，汪丑之弟提议煮糯米饭做夜宵，汪丑的两个大儿子及其三弟也赞成。于是他们就动手做腊肉糯米饭，我在一旁观看。待做好了糯米饭，我与之一起吃了。吃饱后喝了茶，又聊了一会我才回家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已经深夜十二点钟，腊月天气寒冷，我点着煤油灯。看见书桌上刚修好的一部半导体三段收音机，开着来收听，想看看修的效果如何？刚开着，却听见《美国之音》正在广播。听没五分钟，突然撞进两个人来，一个是大队党支书魁阳，另一个是大队会计罗住。他们拿着手电筒走进我的房间来，说：“吓！你竟敢偷听美国之音！”魁阳仔板着脸孔把收音机拿了去，说：“你收敌台广播，拿去没收！”拿了收音机走出我的房间。后又打着手电东射西照，看看有没有杀猪的痕迹。后来在小廊舍的门口发现一个大木盆有猪血没洗干净，断定我兄弟杀了猪，就立即叫我兄起床，说他杀了猪。我兄起来说没有，他们不相信，走进我兄的伙房去搜查，终于被他们搜出了猪肉。这时我哥对他说情：“因为儿子明天要相亲，要请客又要猪肉回礼给女方，余下的留作年二十六日过门结婚时用。请你们留情放过我吧？”我也帮哥哥说话，可他们就是不信。我又跑到汪丑屋去，把他的二弟和三弟叫了来证实这事，但他们到来后却说不知道这回事，没听我兄说过要结婚之事。这样可没得说了，魁阳便喝令我哥把猪肉担到大队部去。大队会计罗住为人好些，有些同情心，就叫我兄担着猪肉跟着他们走，他们走在前面，任由我兄在后面。我兄见他们不理他，于是在黑夜中把二三十斤的猪肉丢落在茶树头下，再担着猪肉跟着他们走到大队部。过了秤，连猪头还有八十多斤，也没写收据，就叫我兄回家。我哥回家时

将丢下的猪肉拾回，也算解决了明天儿子相亲需要猪肉问题。白白被土匪借风盗抢了八十多斤猪肉。这是善良百姓的血汗啊！

那被收去的八十多斤猪肉后来究竟去了哪里？是否他们几个大队干部私分了也未可知？我的那部收音机被收去后，我曾两次去说理，但那支部书记老说我“收听敌台广播”，拒绝把收音机给我。害得我后来赔了四十五元钱给收音机主人。

后来我听湖东大队鸡公坑屋的忠泰叔说起他在禁杀生猪过年的事情上，他有着另一番境遇。现将其经过记录如下：

曾忠泰当年六十多岁，是湖东大队鸡公坑生产队人，曾参加过游击战，共产党胜利后在家当农民，合作化后当上生产队长，又成了共产党员。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共连平县委通知各公社和各大队，禁止农民过年私杀生猪。各地农民不理当局的禁令，在过年时纷纷杀猪。其中湖东大队鸡公坑生产队的曾忠泰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杀了一头自己养的大猪，被人报告到大队。大队则派民兵营长曾石彬去对忠泰说：“忠泰叔，听说你私杀生猪过年，是吗？”忠泰回答说：“是呀！怎么样？”石彬说：“政府已通知禁止私杀生猪过年，你是知道的。你怎么敢带头私杀生猪呢？”忠泰说：“猪是我养的，我怎么就不能杀来过年呢？”石彬说：“忠泰叔，你是个队长又是个老共产党员，你应该带头遵守政府的法规才是，怎么带头违犯呢？”忠泰听了，挺起腰板说：“是呀！”我是违犯了规定，那是限制老百姓的，我就是不听，怎么样？

石彬应着说：“你既然违法，那就要按规定没收！”

忠泰愤怒地说：“你敢来没收我的猪肉？你石彬若敢收我一两猪肉的话，你的头就要落地！”

石彬看见忠泰的态度如此强硬，知道他是不好惹的，于是放软的对忠泰说：“忠泰叔，不是我要与你过不去，是上级叫我来执行的呀！我若不按上级的规定去做，我是难以交代的。那就这样吧。将你杀的猪随便的拿些担到公社去，我陪你一起去见刘书

记，看他如何处理，好吗？”

忠泰为给石彬面子，就应承说：“好吧！就依你说的去做，但猪肉要过年，才知道剩多少。”他将一个猪头及一些猪肠猪肚，还拿上几条肥肉，装到一担小箩筐里，过了秤，叫石彬看了。他挑着猪肉，叫石彬带头，他跟着走到公社。到了公社，石彬找到刘书记，对刘书记说：“刘书记，忠泰叔私杀生猪过年，现在我叫他将猪肉担来了，你看怎么处理吧？”刘书记说：“你叫他把猪肉担到公社食堂去过秤，放在食堂里，然后叫他到我办公室来。”石彬走去对忠泰说，并带他到食堂，又对食堂负责人交附了刘书记的话，就走了。忠泰将猪肉担到食堂，过了秤，将猪肉丢放在食堂里，与食堂杀的猪肉放在一起，一声不说就担着竹箩去办公室找刘书记。他把箩担放在门口，进去见到刘书记。刘书记认识他，便请他坐下说：“忠泰叔，听说你私杀生猪过年是吗？”忠泰回答说：“是呀！怎么样？”

“你这就不对啦！你是队长，又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该带头遵守政府的法规才是的，怎么反而带头违犯呢？”刘书记和声细气的对忠泰进行教育，希望从思想上让他改变过来。

“你们食堂不是也杀了猪过年吗？怎么我们老百姓就不能杀猪过年呢？”忠泰叔反问刘书记。

“食堂杀的是公共食堂养的伙食猪，你杀的是私人猪，怎么可以相比呢？”刘书记解释说。

“我杀的也是我家食堂养的伙食猪呀！大家都是食堂，有什么不一样呢？”忠泰驳斥说。

“那当然不一样啦！公社食堂是集体的，你家伙房是个人的，这性质就不同。”刘书记滔滔不绝地说着，可是忠泰叔却听得不耐烦，不等他说完，就一手把他拉过来，用一只左手卡住他的头，大声对他说：“刘书记，说来说去还是你有理。现在我不跟你多说，今天如果你敢收我一两猪肉，我就要用这条老命与你拼！你

说你是要财还是要命？”

刘书记当年才三十多岁，他知道忠泰叔是老游击队员，又会拳术，是一个刚强不怕死的汉子。于是求情地说：“忠泰叔，你有话好好的说嘛，怎么动手动脚呢？”

“你说，你是不是要没收我的猪肉？没收的话，那就你死我也死。你若想活的话，你就把猪肉还给我。你说怎么样？”

“你放开手嘛，我叫人把猪肉还给你就是啦！”刘书记为了自己的安危，也顾不得面子和上级的通知了，答应忠泰的要求，因为他知道忠泰是惹不得的。

“好，我就放了你。我不怕你反悔的！”忠泰叔说着，放开了手。接着他跟着刘书记走出办公室，他担上箩筐，跟着刘书记走去食堂。刘书记对食堂负责人说：“你将刚才收的忠泰叔的猪肉给回他吧！”说完便走了。忠泰叔则走进食堂里，拿回了猪头和猪肠肚，又挑选了几块地的上肉，让负责人看了秤，一两也没少，还换了几块好的上等肉，便满脸堆着笑担回家去了。

中年娶妻与慈母逝世

关于我的婚姻问题，母亲一直都很关心，她很希望我早日成家立室，让她放下这个心。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里，母亲的心愿难以实现，她为我的婚姻之事操心了二十多年。

一九七四年我从劳改场回来后，因为政治运动不断，每次政治运动总量要搞到我的头上，没有安宁之日，有哪位姑娘肯嫁给一位没有人身自由及生活毫无保障的人呢？连我自己也无心成家立室。一九七七年后，当局停止了搞政治运动，我的生活稳定了一些，从事了修理收音机的工作，有许多的亲戚朋友同情我，为我介绍婚姻对象。其中先后有三次是介绍我到女家入赘做入门女婿的，我也去了与之见了面，我和女的都有意成婚，但是后来女方的父母叫人到家乡了解我的情况后，知道我是一个“反革命”释放犯，就拒绝了我入门做女婿。

一九七八年秋，一位和平县热水公社八联生产的黄成宝大叔因介绍买卖耕牛之事来到我生产队，我与他相认识。他知道我的情况，后想为我介绍婚姻，目的是想得些介绍费。后来他约我跟亚罗叔去热水及利源相亲，我也去了。在利源见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当时女方说同意，我也有意，可是后来成宝叔说她父母不同意她嫁远，故也告吹了。于是放下那婚姻之事，在家专心修理收音机。十二月中旬的某一天，亚罗叔带着黄成宝大叔和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从和平县附城带来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走到我家，说是介绍那位姑娘与我谈婚。我正在房间里修收音机，见他们来了，便放下工作迎接，招待他们在房间里坐下喝茶。黄大叔说明来意，说这个女的父亲是他的老相识老朋友，女的有意向嫁到远的地方。他又向女方介绍我家庭及情况，但他只说了我现在的情

况，而没有说我的历史情况。我见那姑娘五官端正，中等身材，行动举止也算大方得体，心中也有了几分中意之心。但女方是否愿意与我这样的人成婚，我心里还是怀疑的。我当时留他们几个在家住宿，并杀了鸡买了酒招待他们。次日我送他们到绣缎街乘车回和平县城。去到绣缎街等候客班车时，黄大叔叫我给他们三个人介绍费和车旅费，我按要求给了。他又对那位也是姓黄的姑娘说：“我已带你看过他本人和家庭情况了，你有没有意就由你自己决定了。你同意或是不同意，就对曾同志说清楚吧，免得误人思念。”黄姑娘说：“我是有意与他成亲，但还要他跟我到家里去，让他给我父母及兄弟看过，若父母及兄弟同意，我便跟他结婚成亲。”

我听她说后，便跟他们三人一起乘车到和平城，亚罗叔自己回家去了。到了县城，我按惯例买了酒肉与他们一起到黄姑娘家去。她家住在附城公社丰道大队十门庭屋，距县城有六七里路，我们走了一个钟头才到她家。到达她家时已是下午五点时候，见到了她的父母，黄大叔向他们作了介绍。她父母当年六十多岁，为人和善，见了我很高兴，热情地招待了我和成宝大叔，那位姑娘是邻近朱屋的，已回去了。那天晚上黄姑娘的父母及她的兄长问了我现在的家庭情况及生活情况，却没有追问我的身世及家庭成分。我也没有向他们说明自己的经历和家庭的历史。他们一家人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意见和要求，只表示同意这门婚事。次日我告别了他们，回到自己家里继续我的修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一九七九年元旦前两天，我为了尽快谈成这门婚事，又买了些礼物到黄姑娘家。去到后，她父母就催促她与我登记结婚。我真没想到这门婚事如此顺心。她父母比较开明，不讲聘金和聘礼。按照他们乡村的风俗，一是要聘金，二是要嫁妆酒席钱的；但她父母却不讲这些，就叫女儿立即去大队写证明与我结婚。黄姑娘也听父母的话，去大队写了证明，于第二天吃

过中午饭，便与我一起乘车到绣缎，并到公社民政部门去登记领了结婚证。当我带着黄姑娘回到家吃过晚饭后，不怀好心的汪丑之弟泽林却走到我房间，当着黄姑娘的面追我交欠生产队的副业款，要我尽快交清。我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破坏我的婚事，但他的意图失败了，黄姑娘不理睬他。

我们同居了二三天后，黄姑娘就回娘家去了。一个月后春节，她又一个人走来与我同居了几天，对我说她父母决定于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为我们办理婚嫁之事，到时要我送五六十斤猪肉及几瓶酒给她娘家分发给她的亲属。她父亲说不做酒不请客了，只请十多二十个亲属姐妹送她出嫁。她要我在家里也要准备些酒菜来迎接他们，还要请车去迎接他们。

那时我虽然从事修理工作两年，生活稳定些，分了些田地，收入增加了一些，但是我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存款，还欠生产队副业款几十元，所以要结婚办喜事，困难重重。我当时又不愿意去请求兄弟姊妹及亲戚的帮助，只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没想到当时有许多热心人听说我要结婚，就主动来帮助我。其中有上耕塘的亚松叔听说我要办结婚喜事，特地走来对我说他侄儿有一头大猪可以赔给我，待后有钱时再付钱给他。另外，当时请车接送嫁的人有困难，客班车很少，中拖又请不到，我就跟兄弟商量，叫他们去请下寨的亲房兄弟子侄及上下耕塘的青年来帮忙，组成十多二十部单车队伍，到和平县附城丰道大队十门庭屋去迎接新娘及送嫁的亲人。我在家里请人准备了八九席的酒菜，不请大客，只为送嫁的亲属及来帮忙的人和一些至亲的亲戚朋友来喝酒喜庆。那天算是我人生中一件最大的喜事，母亲见到我结婚成亲，特别高兴。她对我襟娘表嫂他们说：“我对寅儿的婚事一直都很操心，还担心见不到他成家之日，今天他正式结婚了，我一生的心愿也实现了，我再也用不着为他操心了。”

一九七九年春，火灵那个生产组已将全部的田地及生产队的

耕牛农具分到各户耕种，但我们组的汪丑兄弟却心怀叵测，不愿将全部的水田分到各户，目的是要控制我，要我既要交钱给生产队，又要自己耕种部分土地。我于农历二月下旬正式结婚后，汪丑心里很不舒服，十分妒忌。农历三月他就来逼我交副业款，我说：“因结婚用了钱，暂时没了钱，请宽后些日子吧？”而他竟然不讲一点情面，凶狠地朝我胸部打我一拳，扬言要收缴我的修理工具。我当时没有还手打他，忍让了他。后来他受到坪塘的石检叔和倒流水的娘忠叔的责备，不敢那么嚣张了。

七九年农历前六月初旬的一天，我收打了十多斤大豆放在屋前的晒场里，叫母亲看望。上午她还好好的，中午吃饭时我还蒸了鸡蛋给她送饭，她也吃了一碗白米饭。下午我太太跟着生产组的人上工去了，我在家修理收音机。三点，我走出大门看见母亲呆呆地坐在大门的石墩上，晒场上走来很多鸡。我便对母亲说：

“老妈，你怎么呆呆地坐着不看晒着的黄大豆呢？你看一大群的鸡走去吃哩！”她抬起头看着我，昏头错脑地对我说：“怎么？你晒了黄豆呀？”我说：“是啊！”她小声地说：“哎哟！我却不记得了。”我见她头脑不清，便扶她回房间去休息，她却说想去大便。我就扶她到弟弟的火灰屋去，在外等候了一阵。她解完手，我扶她回房间去休息，还倒了一碗开水并拌上白糖，让她喝了，然后扶她躺在木床上。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寅儿，你已经成了家，很快就要做爸爸了，现在我可放心啦，你就让我在这安静地跟你父亲去吧！”我见她这样，就安慰她说：“老妈，你在床上安心休息一下，我立刻到绣缎医院去叫医生来给你看病。”她说：“好儿子，不用啦！我没病，我是老了，要跟你父亲做伴去的啰。”我没有听她说，立即跟侄儿家借了一部单车，跑到绣缎卫生院，叫了姓黄的医生出诊到我家。黄医生来到后，我叫他给母亲诊病探脉，探知她的脉搏已经很微弱，黄医生给她打了葡萄糖及强心针，说：“你母亲已年老，可能要归寿了。”我再叫喊母亲时，她已经

不会说话了。我付了医药费，送走了黄医生后，已经黄昏，兄弟及我妻子等都已收工回来了。我弟还要给母亲灌吃牛黄丸，我阻止他，认为该让她休息，但他不听我的话，坚持要灌药抢救，可药还没灌进，母亲就被药塞住断了气。一家子孙看见，放声大哭起来，我则更加悲痛流泪。

第二天我们通知了两位姊妹及鲁岭的表兄弟，又请上下耕塘的子叔及下寨的亲房帮助料理丧事。第三天上午就按照传统的旧风俗仪式，送母亲入土安葬了。她去世时享年七十九岁。

母亲去世后，心怀叵测的汪丑兄弟看到我妻子身上已怀孕五六个月，就打起将全部水田及耕牛农具分到户的算盘。他们想到：此时不分，再待二个月后，我妻子生下孩子，又要多分一份田及财产给我家。于是他们决定将全部剩下的水田及耕牛农具等在夏收前完全分给各户，夏收后由各户自行耕种。我看出他们的意图，但我不与之计较，不在乎一亩几分的田地。故此我同意他们早分，并且劝侄儿们也同意分。分的时候我只分得两人的田和财产。夏收后生产组也进行了结算，清理了生产组的账目，各得其所。从此生产队瓦解了，我不再受农奴制的束缚，也不受汪丑那势利小人的气了。我自由地耕种分得的土地，又兼做修理工作，过上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平反冤假错案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新的领导层批判了“两个凡是”，开始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自从中共建国统治大陆以来二三十年，由于不断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造成了数以亿计的冤假错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斗“地主”运动中枉杀了数百万人，被戴“四类”分子帽子的有二千多万人；五七年“反右”运动造成百万的“右派分子”；还有“反右倾”运动，社教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等，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加不计其数。如此庞大数量的冤假错案，要说完全彻底平反，谈何容易？

我从一九七八年就开始申诉我的冤假案。七九年连平县成立了一个公安政治原统的平反小组，开始平反被判了刑的冤假错案。当时我高中时的坏同学周企球混进了公安部门，他被派去参加县的平反小组。当审理我的案件时，他出来作梗，说我写信给台湾国民党是事实证据，信中所说的话是反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于是复查后下结论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维持原判。”他们根本就没有调查研究我们当时写信是在被迫害的环境条件下，才写信表达我们对当局的倒行逆施的反抗思想情绪。这只是思想言论问题，对国家对社会没有造成任何的危害，有什么罪呢？由于当时的极左思想路线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大地阻碍了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进行。

一九八一年胡耀邦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担任了国务院总理，他们是比较开明的领导，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连平县在上级的指示下撤销了原成立的平反小组，重新成立了中共连平县落实政策小组，由政法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和纪委书记组成。规定各单位各部门的冤假错案由各单位各部门进

行平反，然后上报县落实政策小组讨论通过。同时规定：凡有行政和刑事的重处分案件，必须先进行刑事方面的平反后，才交由行政部门进行平反，再经县落实政策小组讨论通过。

我的案件是双重案件，故须先经法院平反后，才交教育行政部门平反，改正错误的行政处分。我经过多次上诉上访，几经周折，连平法院才于一九八五年冬重新审理复查，并且还受到一些阻碍。一九八六年二月下旬我到法院直接找院长查问我的冤案为什么得不到平反？我问他：“我们大队的右派曾汝启于一九七六年也因写信给台湾国民党而被判刑十年，现在你们法院都已为他作了平反；怎么我同样的案件就至今不平反呢？”他说：“曾汝启是由于被错划右派而造成他不满而写那信的。”我说：“你说汝启是由于环境所迫所造成，那我被错误处理回家，在文革期间被逼逃难，家庭被抄家，难道这不是当时的政治迫害造成的吗？”院长听后说：“曾汝启有他的单位证明他是被错划为右派造成他对现实不满，你却没有证明证实你当时被抄家，造成你的不满情绪。你若能写上这样的一份证明材料，我们就可以立即为你的案件平反。”我说：“你既然说要这样的一份证明材料，我就回去写证明材料给你。”于是我告别院长，立即回家乡去找人写证明材料。

回到家乡，我找到冬发之子曾治恩，他与我同一个生产队，对我家当时被抄的情况最清楚，他又是当时的大队的团干部。我找他谈了我的冤案，要他写一份我当时被逼离家出外及家中被抄家的证明材料给我。他给我写了，签上名字，我又将这份证明材料拿去给大队盖印确认情况属实，给予证明。然后我又乘车到连平，找到法院院长，亲自将这份证明材料交给他。不久连平法院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为我们的这一案件作出再审判决。现将其再审判决抄录如下：

连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连法刑监（1986）第 02 号

申诉人：（原审被告）严振磷，男，当年二十四岁，初中文化，职业农，本县大湖区塘背乡人。

申诉人：（原审被告）曾石荣，又名曾永荣，男，当年二十八岁，大学文化，本县绣缎区民主乡人。

原审被告：曾南甫，男，当年二十八岁，高中文化，职业农，本县大湖区湖东乡人。

原审被告：严由礼，男，当年三十岁，初小文化，职业农，本县大湖区塘背乡人。

上列申诉人因挂勾搭线，企图逃港反革命集团一案，现以其出身地富家庭，受到“文化革命”运动的冲击，只得逃到江西省做工求生，写了一封信给台湾国民党，述说他们的受苦之情，被判刑而感到委屈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

本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再审查明：

申诉人于一九六七年在江西省信丰等地搞副业期间，自行收听敌台，向国民党的敌特机关投寄信件，主动与敌特机关挂勾搭线，要求给予编号和经济援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但鉴于申诉人的原家庭出身的株连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的特定条件，虽然挂勾信中有一般的反动词句，虚构了一些并不存在的事实和组织情况，对现实发泄了不满情绪，但查无反革命组织纲领。其伪刻印章是犯罪行为，但与挂勾信件是从属关系，且只限于外出搞副业。本院认为：申诉人的行为，情节较轻，可不定罪刑。原审被告严由礼虽然在场参与了上述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曾南甫与挂勾信无关。

为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68 年度）第 007 号刑字判决；

二、改判对申诉人严振磷、曾石荣不追究刑事责任；改判对原审被告严由礼、曾南甫宣告无罪。

如不服判决，应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写出上诉状一式二份，上诉于惠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连平县人民法院

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

对于连平法院的改判，我认为是不彻底的，还认为我们犯有多少的罪，只是不追究刑事责任。我本想提出上诉，但教育局负责搞落实政策的陈老师却劝我不要上诉，以便他抓紧时间落实政策行政对我的错误处分，尽快争取在九月一日开始前复职到学校去当教师。我听他劝告，没有提出上诉。于是法院就把对我的平反改判书发到教育局，教育局负责落实政策的陈老师很快地便将原教育局对我的错误处分作出了改正，并报县落实政策小组讨论，恢复我的教师职务，工龄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开始连续计算。

教育局恢复了我的教师职务后，原本说把我安置到忠信中学去教物理的，但由于当时政风日趋腐败，升学、安置工作等都要送礼。我当时没有送礼，故就把我安置到大湖的一间较差的中学去任教。

接着我又对我父亲的冤案提出申诉。连平法院对我父亲的案件也作了复查审查，并于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作出再判决书。现也将其再审判决书抄录如下：

连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连法审监（1998）第 05 号

申诉人（原审被告之子）：曾石荣，住大湖林业中学

原审被告：曾水娣（已故），男，当年五十五岁，本县绣缎乡民主村人，因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服刑期间表现不好和煽动群众闹事案，先后被本院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九五五年十月二日判处加刑一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判处管制二年。申诉人以被人诬害的冤案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现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

本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再审查明：

原审认定被告人一九五〇年缴交公粮时掺泥沙，打击村干部和一九五三年买来大米二十斤榨粉丝出售，破坏粮食统购统销和一九六一年九月被告曾相林商议扫祖坟，被告提议捐款，亲自发动群众，并亲自动手挖开他人的祖坟，造成他人祖坟七座被毁，而引起纠纷。经查，上列情况属实，被告本人亦供认在案。

本院认为：被告缴公粮掺沙，买米榨粉丝出售等，数量不大，情节显著轻微，不购成犯罪。一九五五年加刑一年的刑罚，是由原判前罪引起的。煽动群众闹事案，被告负有直接的责任，扰乱了社会治安，构成了犯罪，原判正确。为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1954 年度）第 143 号和（1955 年度）第 100 号的刑事判决；宣告被告无罪。

二、维持本院（1961 年度）第 387 号刑事判决。

连平县人民法院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

一九八七年曾治平与廖习成一九五一年的“反革命集团”案，连平法院也为其作了平反，宣告为枉杀案，枉杀了九人。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平反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但这只是数以亿计冤假错案的海洋中的一滴，而更大量的在土改中和在镇反中被枉杀和被定为四类分子的冤假错案，却还没有获得平反昭雪，更没有得到任何的赔偿。其中我们村在土改时被杀的曾学求等，还有被逼至死的曾保伦等，他们根本就没有获得平反昭雪。就是在平反了的案件中，当局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赔偿。一九八八年六月，连平县法院只给我父亲赔偿八十元人民币；给曾治平和廖习成等被枉杀的人的家属每户七百元人民币；我和曾慈彬等被判了刑而现在复了职有单位的就没有赔偿了。这就是中共的所谓的平反冤假错案，只是一句没有价值的空话，像一阵风吹过一样就算完结了，也达到其安抚人心的目的了。

不正之风与六四运动

回忆一下八九年六四运动前国内的政治风气：自从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中共坚持一党专制，缺乏民主监督机制，人民群众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因此政治腐败的官僚的贪污受贿行为日趋严重。贪官们从最初收取酒肉，发展到收取金钱红包甚至重金。各个部门都各行其道，大开后门进行受贿。就业、升学、安置工作、落实政策、毕业文凭、评职称和升官升职等都要走后门送礼物，造成了严重的政治腐败风气。例如：就业规定要指标，你送了礼就可以得到就业指标。升学有入围分数线，原定录取一百人的，他的入围分数线就定一百二十人，这时你若送了礼，你就可得录取；若不送礼，就会落选。安置工作也是这样，我经政府平反复职，原打算安置我到忠信中学去教物理的，忠信中学是一所比较好的老牌的中学，生活环境和生活待遇都比较好，但由于我没有送礼，就被调换了，把我安置到大湖的一所很差的中学去教学。落实政策也是这样，我知道我们家乡有几个原本只代课几个月，又无档案材料的代课教师，他们应该没有复职可言，但是后来送了大礼，获得了恢复公职的待遇。毕业文凭也可以作假，有钱就可买到国家承认的大专函授毕业文凭；许多官员原本的文化水平低，没有学历，但也升官，就利用金钱买大专文凭，再用重金买官爵。这些事例屡见不鲜。

一九八四年广东省下达一个文件，大意是为了照顾知识分子，而有条件的将他们的配偶或子女的户口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而解决他们夫妻分居和子女分居的问题。其规定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工作十五年以上，大学专科毕业二十年以上，中专毕业二十五年以上。但当时的官僚们一窝蜂似的抢着搞自己的家

属子女的农转非，有权的用权，没权的就用钱。结果将本来不符合条件的大量的基层干部和非知识分子的家属，从农村的农业户口转为城镇的非农业户口，改吃国家粮。后来又钻空子用职权或用金钱买就业指标，把他们的家属安置到各个部门，成为国家的干部或国营单位的职工。

对于职称的评定，当局更是弄虚作假，不公平不合理。一九八七年秋，教育行政部门下达文件，为中小学教师评定职称。文件规定了一些条条框框，但是文件到了地方官僚们的手中就变了样，他们可以弄虚作假，可把不符合条件的写成符合条件，又可把原本符合条件的写成不符合条件。这时许多教师闻风而动，有的送钱给校长拉关系，校长则利用本身的职权为自己谋利益。上级规定各间中学的高级教师和一级教师的名额，规定各小学高级教师的名额。各中小学校的校长首先是为自己谋取高职称，然后才为自己的亲信或是送了礼的人谋高职称。因为中共搞什么工作都实行黑箱作业，表格由基层领导审批上报，他作什么指示你是不知道的，不会给你见面。当时我们中学的校长何某是中专毕业，按条件他是不符合中学一级教师资格的，但他是校长，他把他自己上提为一级中学教师，写上好的评语，却在我的审批表上写上不好的评语上报。后来他就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而我与他同龄的大学本科毕业却被评为中学二级教师。还有与我初中同班的几个同学，当年考不上高中，后来当了小学教师，现在当了小学校长，也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相当于中学一级教师。对比之下，我考上了高中，又读了大学，竟不如一个初中毕业生，这是什么制度呢？为什么他们读的书少，反而可以获得高的职称呢？

当时不但办理个人的事要送礼才能办成，就是办理单位的公事也得送礼才可办成。一九八七年我所在学校校长说因缺乏办学经费要到省的某部门弄点钱，学校送了几百元钱的礼物给了某首长，才批拨给我们学校四千元钱，到达县老区办后又被截去二千

元，我们学校只得到二千元钱。

一九八八年暑假，由于我对学校对家乡一些领导不满，决定调离家乡，家乡再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当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经济发展迅速，教育也大发展，缺乏教师，我就顺应需要而顺利地办理了调离手续。八月底，我带着家眷，请车搬齐所有的家具物件，到了东莞某一中学任教。九月开学时，我担任高一级的两个班和高二级的两个班的物理教学，并兼任高一班的班主任。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物价飞涨，各种民怨四起。就在这时候，北京的学首先起来示威游行，高喊着：“反对腐败，打倒官倒，要求民主！”的口号。但是由于当时的李鹏政府反对学生的正当要求，激发起学生和民众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并发展到绝食抗议，掀起了全国的民主浪潮。六月四日，邓小平调集数十万大军开进北京城，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群众进行大屠杀。当日的早上，我走到课室，看见黑板上写着：“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学生们垂头丧气，有的哭喊着对我说：“老师，北京的大学生都遭到屠杀了，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当时也感到难过，但我安慰他们说：“虽然这次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和屠杀，但是民主的火种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民主之火是扑不灭的！希望你们不要悲观失望，要鼓起勇气，振作起精神搞好学习；同时希望你们认识和记住这一历史事件，继承和发扬这这一伟大的爱国民主精神。我们国家的未来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六四大屠杀保住了中共的独裁专制统治，也保住了各级官僚的官位，从此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了。

欺骗与掠夺

俗语说：“六十六学不足”，说的没有错。2000 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被中共欺骗了半世了，到头来还重新上当受骗，犯下大错，把儿子送入公安局设立的狼穴，差点儿断送了生命。现将事情的经过详情记录如下：

我的一个大儿子从小聪明活泼，读小学时的学习成绩各科都 80 分以上，在班里名列十名之内，并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但到了初中，由于班主任教育不得法，动不动就处罚违规的学生，激发了他的强烈的叛逆心理，致使他放弃了学习。对这我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对他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教育，让他跟着一些调皮学生混了一段时间，无法挽回，学无所成。2000 年他才十八岁，无业在家交了几个本地的坏朋友，同着与之吃喝玩乐了几回。那几个坏朋友唆使他偷家里的钱，他就顺从地偷了我家里二千多元钱去跟那几个坏朋友去鬼混。后来他妈妈发现他偷了钱告诉我，待他回家后我打了他几下，追问他偷了这么多钱哪里去了？他说除了吃喝之外还给了某人 500 元买什么药去了。

当时我同一位在人口普查时认识的派出所工作人员商议，想叫派出所捉儿子去拘留几天，以警戒他，让他以后不敢再重犯。那位姓何的指导员说这是“好主意”。可是当他派人把我儿子捉到派出所之后，他们却用刑具恐吓他，逼着他招供有没有吸毒？他年纪轻，感到害怕，被逼供认吸了毒。何指导员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儿子吸毒已半年多了，若继续下去就没命啰！”我听了之后不太相信地说：“怎么？他吸毒半年多了？可他在家时我们没发现他有吸毒的行为呀。”何指导员说：“真的是吸了毒啊！这是他供认的，他同那几个坏朋友一起吸的。老曾，你相信我吧。”经他这

么一说，我相信了他的话。他接着说要送去戒毒所戒毒，不然就会断送生命。我问他是否要钱？他说不要钱的，是政府设立为解救青少年服务的。我听信了他的话，认为既然不要钱，送去戒毒，让儿子改邪归正也好。于是就同意了。那时是三月中旬的星期五下午，五点过后我与太太走到派出所看望儿子，他们已经把他送到公安分局，说决定明天早上把他送去大朗戒毒所。我们要送几件衣服及一些生活用品给他，他们叫我们明天早上七点钟跟他们一起到分局去。星期六早上我们与之到了分局，见到了儿子，问他是否吸了毒，可是他却不敢对我们说什么，拿了我们送的物品就走了。

过了几天，儿子在戒毒所打来电话，叫我去探望他。我于星期五带了二三百元钱去看他。到了之后，看见有很多人在那里等候探监，并且要排队交钱才能看望被扣押的亲人。这里关着的人，有戒毒的，也有被拘留的，还有劳教的。我走去窗口一问，负责收钱的人说：“戒毒的人员要交五千五百元，拘留和劳教的要交二百元钱。”我说我没有带那么多的钱，他说：“一千元钱有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回去，下次带够钱才来。”我听了，被吓了一跳，怎么探监见面就要一千元钱呢？这不是绑架勒索吗？

我回来后走去派出所，问那位何指导员：“你对我说戒毒不要钱的，怎么我去探望儿子时，却说要交五千五百元钱呢？”他说：“是呀！你不去见你儿子就不用钱；你若要见，他们就要跟你索取伙食费和戒毒费的。我劝你不要去见他，由他在那里便是了。”我说：“这不是等于绑架人质进行勒索吗？这与绑匪的行径有什么不同呢？我真想不到你们会这样来坑害人，我被你们欺骗了，上了大当！”我气愤地说，何指导员低下头不做声。

不几天，儿子又从戒毒所打电话回来，说：“爸你怎么不来探望我啊？”我说：“我上星期五去了戒毒所探望你，但去到之

后却说要交五千五百元钱才能与你见面，家里哪有这么多的钱呀！”他说：“没那么多钱，你就带一千元钱来嘛，我求你来看望我一下吧！”我听见儿子用要哭的调子恳求我，感到心酸，于是答应带上一千元钱去探望他。

星期三早上我乘车到大朗，又乘七元钱的摩托车去到戒毒所。已是九点多钟，我排队交了一千元钱，又要交二十元钱的探望费，写了收据才去戒毒所大院门口等候。时间到了，交齐了五千五百元钱的就进入里面的大院，可到大食堂见面吃饭；我只交一千元钱的，只能隔着玻璃窗与儿子见面。玻璃窗只钻有几个像手指头这么大的小孔让你说话，说话小声就听不清楚。我隔着玻璃窗看见儿子穿着戒毒衣服，我安慰他安心戒毒。他叫我给他三百元钱，我责怪他为什么还要用这么多的钱，他说这里的人都这样，没有钱会被人欺负。我终于还是给了他钱。戒毒所不接收亲属从家里或外面买来的食物和用品，里面的人想得到额外的用品和食物，只能到戒毒所设立的小卖部交钱写单子，由小卖部人员送到戒毒人员手中。小卖部的物品比外面街市上的物品贵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明显是盘剥戒毒人员和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的钱财。

在这窗口中见面的时间只有十分钟，讲话又听不清。设立这样的探监方式，其目的是为了索取更多的钱财。

我本打算不再去探望儿子，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打电话来说：“爸爸，我恳求你来救救我吧！请你跟别人或跟学校借五千元钱来给我交齐伙食费和戒毒费，不然的话我是受不了那折磨啦。”我听他说话很凄惨，于是答应去学校借钱。跟学校借了五千元人民币，第二天再次去到大朗戒毒所。交了四千伍百元钱，其中收据上写着戒毒费四千四百元，服装费一百元，上次探望交了一千元，共是五千五百元钱。还要交二十元的探视费，才得到戒毒所大院门口等候。当待到开门接见时，所里一个管教走出来对我说：“这次你不能与儿子见面，因为你儿子违犯了监规，被送

到禁闭室单独关押去了。你下星期再来吧！”他说了这几句就走了，我只好带着重重的疑虑返回家里。

一星期后，我再次去戒毒所探望儿子，又要交二十元钱的接见费，才可到里面的大食堂见他。这次见到了他，并在大食堂与他吃了一顿饭。这食堂专门设立有供接见用的饭菜，还有各种香烟，有鸡、鱼、肉各种菜色，但很贵，一碟鸡要三十元，一碟青菜二十元。我看见儿子的一只手脉上划着几条凸起的大伤疤。我问他：“你的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疤痕呢？”他说：“因为你没有交戒毒费，他们就把我放到最差的监房去强迫劳动，劳动任务很重，我完不成就要加班到晚上十二点钟，再完不成就对我重罚，给我带脚铐。你看我的脚都被铐肿了，还留下一条条的伤痕。我受不了，便用碎玻璃割脉自杀，被他们发现了才获救。现在伤口好了就留下这些伤疤了。”我仔细地看了他手上和脚上的伤疤，心里感到阵阵的酸痛。我万万没想到当局竟然会用如此恶毒的手段进行敲诈勒索，比土匪和法西斯的手段还残酷。我这时深深感到对不起儿子，悔不当初，不应该把他送进这吃人的狼穴来，是我傻，害了他。

据儿子说，没交齐钱的外地人被迫自杀致死的很多。就是没有给折磨死，也得在这里做苦役一年以上，待刮够了钱才能放出去。

见过儿子之后，我带着悲痛的心情回到家后，又走去派出所找到何指导员，对他说：“我听信了你，我的儿子差点给你害死啦！”他问：“你的儿子现在怎样的？”我说：“由于我没交齐五千五百元钱的戒毒费，他们就强迫他劳动，完不成任务就加班到深夜十二点，再不完成就绑打吊起或带脚镣惩罚，逼得他忍受不了，割手脉自杀，幸而被发现及时救了。这不是绑架勒索的法西斯手段吗？”他听了后说，“到法院去控告他们吧！”于是我在家里写了控诉书，控诉当局对我儿子的迫害。现将控诉书记录如下：

东莞市人民法院：

我是一位退休了的人民教师，现向你们控诉大朗戒毒所当局对我儿子曾钵峰的逼害。

我儿子是个刚满 18 岁的青年学生，由于受一些坏朋友的唆使，偷了我家二千多元钱。本想送去派出所拘禁几天警戒他一下的，但派出所人说他吸了毒，我相信了他们，同意把他送大朗戒毒所戒毒。我不知当局要五千五百元钱，家里又没有钱，故没及时送上钱。想不到当局竟然强迫他日夜加班劳动，完不成任务就绑打吊或带脚镣处罚，逼得他忍受不了而割手脉自杀，幸而被发现及时救了。

当我跟学校借来五千元钱送到戒毒所时，儿子已经被逼出事。戒毒所本来是政府设立为解救失足青少年服务的，应该以教育和帮助为手段，让他们认识毒品的危害，从而摆脱毒品的危害。但是当局却把戒毒所当作掠夺金钱的场地，并且采用法西斯的残酷手段进行敲诈勒索。这是什么行为呢？这与绑匪扣押人质进行勒索有什么两样？

我是一位人民的教师，本想把儿子教育好，但现在却反而把他害了，我心里感到多么悲痛啊！故此特向你院提出控诉，控诉大朗戒毒有关人员迫害我儿子致自杀的行为。请你们依法查处。为盼！

控诉人：某中学退休教师：曾石荣

2000 年四月某日

我将控诉书亲自交到戒毒所内设立的法庭代表处。他们接收了我的投诉后，又把控告书转送戒毒所领导。一个星期后戒毒所决定某日接见我和太太，所长与主任及队长在其院内的一间办公

室约见我和太太，并且把我儿子也叫了来。所长对我儿子发生的事作了辩解，说是我儿子表现不好，不守纪律，才处罚他。我说对青少年应以教育为主，你们怎么可以用那残酷的法西斯手段呢？他们只说工作做得不够，以后改正。就这样就算是对我投诉的处理答复。

此后我见儿子没事，也没有再去追究他被迫害之事。经过半年时间，我总共花费了八九千元钱，这是被欺骗被掠夺了的血汗钱。半年后儿子出来对我们说他根本就没有吸毒，当时是被逼供认的。我后悔自己太傻，六十多岁了还听信那伙土匪党，把儿子送入虎穴，让儿子受到如此大的伤害，留下了心灵和身体的伤疤。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最后赋诗一首，作为本书的结尾。

抱负

十六寒窗求功名，
哪知暴君效秦王？
焚书坑儒超万倍，
家破人亡甚悲伤。
冤魂遍野万民恨，
民不聊生谁不怨？
书生奋起千钧笔，
唤醒大众讨罪行。

附录一

连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连法刑监（1986）第 02 号

申诉人（原审被告入）：严振磷，男，当年二十四岁，初中文化，职业农，本县大湖区塘背乡人。

申诉人（原审被告入）：曾石荣，又名曾永荣，男，当年二十八岁，大学文化，本县绣缎民主乡人。

原审被告入：曾南甫，男，当年二十八岁，高中文化，职业农，本县大湖区湖东乡人。

原审被告入：严由礼，男，当年三十岁，初小文化，职业农，本县大湖区塘背乡人。

上列申诉人因挂勾搭线，企图逃港反革命集团一案，现以其出身地富家庭。受到“文化革命运动”的冲击，只得逃到江西省做工求生，写了一封给台湾国民党的信，述说他们的受苦之情，被判刑而感到委屈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

本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再审查明：

申诉人于一九六七年在江西省信丰等地搞副业期间，自行收听敌台，向国民党的敌特机关投寄信件，主动与敌特机关挂勾搭线，要求给予编号和经济援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严重的违犯犯罪行为。但鉴于申诉人的原家庭出身的株连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的特定条件，虽然挂勾信中有一般的反动词句，虚构一些并不存在的事实和组织情况，对现实发泄了不满情绪。但查无反革命组织纲领，其伪刻印章是犯罪行为，但与挂勾信件是从

属关系，且只限于外出搞副业。本院认为：申诉人的行为，情节较轻，可不定罪科刑，原审被告严由礼虽然在场参与了上述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曾南甫与挂勾信无关。为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68年度）第007号刑字判决；

二、改判对申诉人严振磷、曾石荣不追究刑事责任；改判对原审被告严由礼、曾南甫宣告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接到判决书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写出上诉状一式二份，上诉于惠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连平县人民法院

审判长：谢佛滔

审判员：吴松桂

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

附录 2

广东省连平县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连法审监（1988）第 05 号

申诉人（原审被告之子）：曾石荣，住太湖林业中学

原审被告：曾水娣（已故），男，当年五十五岁，本县绣缎乡民主村人，因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服刑期间表现不好和煽动群众闹事案，先后被本院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九五五年十月二日判处加刑一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判处管制二年。申诉人以被人诬害的冤案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现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

本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再审查明：

原审认定被告人一九五〇年缴交公粮时掺泥沙，打击村干部和一九五三年买来大米二十斤榨粉丝出售，破坏粮食统购统销和一九六一年九月被告瑟曾相林商议扫祖坟，被告提议捐款，亲自动员群众，并亲自动手挖开他人的祖坟，造成他人祖坟七座被毁，而引起纠纷。经查，上列情况属实，被告本人亦供认在案。

本院认为：被告缴公粮掺沙，买米榨粉丝出售等，数量不大，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一九五五年加刑一年的刑罚，是由原判前罪引起的。煽动群众闹事案，被告负有直接的责任，扰乱了社会治安，构成了犯罪，原判正确。为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1954 年度）第 143 号和（1955 年度）第 100 号的刑事判决；宣告被告无罪。

二、维持本院（1961 年度）第 387 号刑事判决。

连平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审判长：谢佛滔

审判员：吴松桂、

审判员：罗寿南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

赤海漂零记

黑色文库 第十四集

作者/曾石荣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廖天琪

封面设计/ 古原

华盛顿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 作者 曾石荣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或转载文字与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In the Red Ocean I Remember

By Zeng Shirong

Black Series Volume 14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6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17-4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U.S. \$ 15.00

中国农民的哀歌

赤海漂零记

曾石荣 著

作者简介

曾石荣1938年出生于广东省九连山区的连平县大湖乡。家庭世代务农，父母都是勤恳的农户。由于家道衰落，父亲开始经营米粉丝的零售买卖，颇为成功，因而遭族内邻里之嫉。五十年代，他家被划为富农。作者青少年时期经历了血腥的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亲见乡亲和老师被无辜打死枪毙，农村浩劫随着三面红旗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更形升级。作者从广东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却需外出打工，颠沛流离。由于写信给台湾的国民党，诉说个人受到的迫害和歧视，被判刑七年。在狱中苦病交加，曾经一度神经失常。越狱逃跑，又被抓回。刑满出狱后，发觉家乡已无立锥之地，要求重返劳改队去就业，亦不被接受。他再度流落到看守所，甚至当过小偷。1978年的平反潮给了他一线生机，1986年终于得到“平反”，并当了一所中学的物理教师。现已退休，居中国。

黑色文库 第十四集
劳改基金会

In the Red Ocean I Remember
By Zeng Shirong
Black Series, Volume 14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6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17-4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15.00

